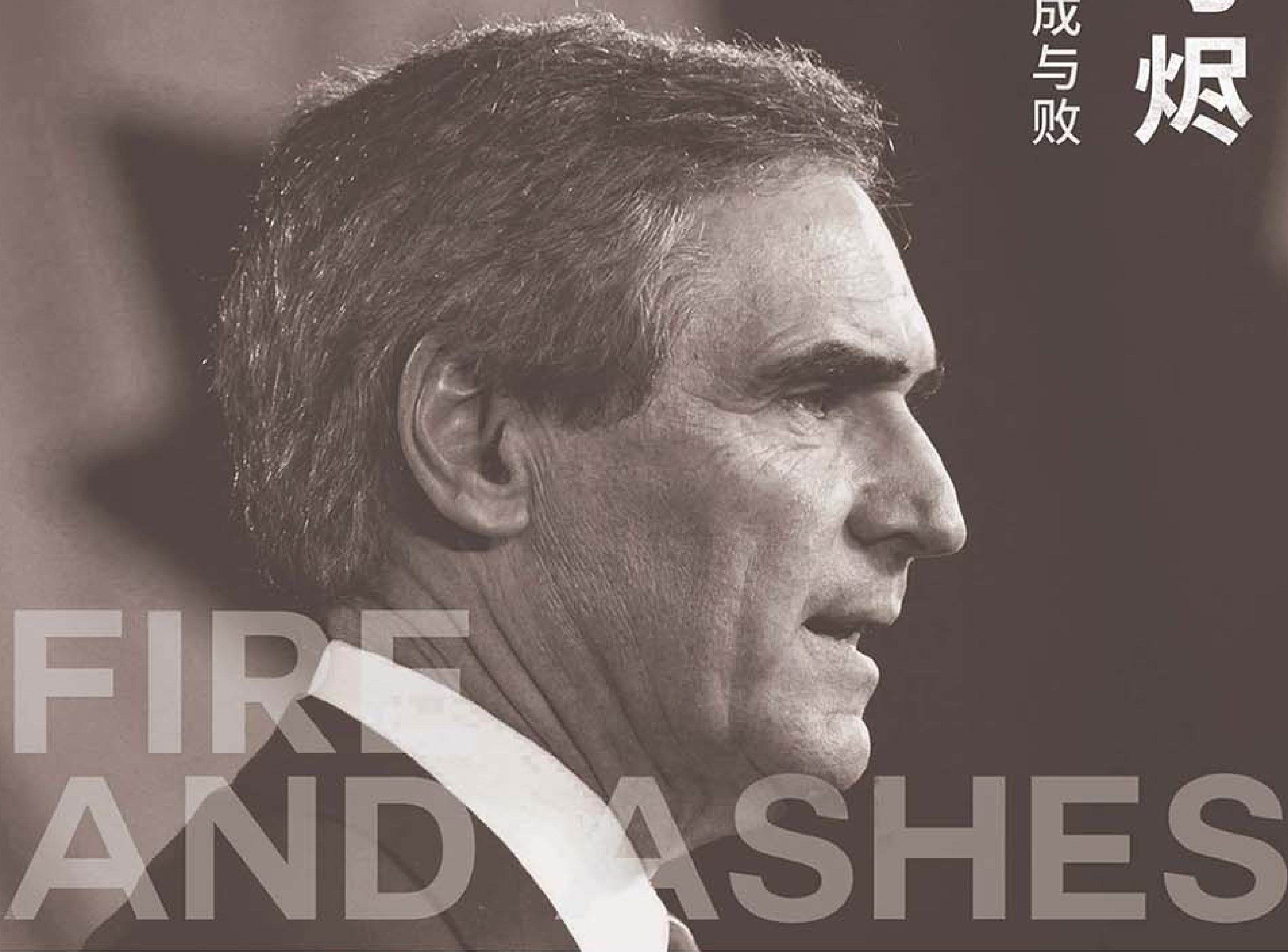


前加拿大自由党党魁　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之一
汉娜·阿伦特奖、乔治·奥威尔奖获得者

叶礼庭讲述 ———

一个政坛局外人的
从政冒险史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
民主反思录

从学者到总理候选人，这条路究竟有多险阻？

学识渊博的名校教授
~~清谈误国，不懂政事~~

远离党争的新鲜面孔
~~空降部队，缺乏威信~~

视野开阔的世界公民
~~匆匆过客，难以信任~~

版权信息

书名:火与烬：政治中的成与败

作者:[加]叶礼庭

译者:黄天磊

ISBN:9787511733689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谨以此书献给巧兰，

纪念布拉德·戴维斯、迈克尔·格里斯多夫与马里奥·拉格

导读：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王前[注]

2014年3月，笔者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参加关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的研讨会。来自欧美的专家在为期两天半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伯林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伯林创建并担任首任院长的学院里，与会学者大多对伯林关于启蒙的研究颇有意见，有的炮火之猛烈让我这个也研究点儿伯林的外来者很是吃惊：如果搞不清状况，你会疑惑正在被讨论的这位哲学家是否还有讨论的价值。

记得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后一个多小时，我才赶到会场，因不想在别人发言时闯进去打扰，于是就上了二楼，站在走廊跟座席之间光线很暗的过道上听。没多久，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走了过来，他打开门正要进去。我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正是伯林传记的作者叶礼庭吗？简短的寒暄后他先进去了，我也就尾随而入，坐在二楼的座位上继续听。这天叶礼庭有主题发言，他反驳了时任牛津大学齐切利社会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德隆（Jeremy Waldron）对伯林的严厉批判。沃尔德隆主要批评伯林忘记了立宪启蒙主义的重要性，具体内容就不在此赘述了。[注]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位伯林晚辈中唯一曾在政坛居高位、跟加拿大总理宝座擦肩而过的学者真是能言善辩，对当今法哲学重镇执牛耳者沃尔德隆反驳起来毫不客气，似乎成了场内为伯林辩护的最强音。遗憾那天他参加完会议就离开了，我没有机会请教。一晃三年过去，因缘凑泊，这次有机会阅读他的三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读完惊

讶地发现自己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以前只是仔细读过他那本伯林传记——那是本难得的关于哲学家的传记佳作——其他的除了访谈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次通读三本书有许多新的发现，尤其对他深入兵荒马乱的纷争之地，了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真相的努力肃然起敬：他是位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血缘与归属》《火与烬》和《战士的荣耀》各有特色，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三部曲。《血缘与归属》谈新民族主义，《火与烬》写从政的经历，可以说是对他的从政经历的一部总结，而《战士的荣耀》则是一部谈论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若干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评论集，他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部落，超越我们的民族、家庭、熟人网络的道德义务”。三本合在一起正好反映了叶礼庭这些年来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关心的问题。

从整体上来看，叶礼庭谈论民族主义这个问题有个特点，就是他不像某些理论家那样坐而论道，而是深入冲突的现场，亲自了解冲突各方的观点和立场，使自己掌握第一手证据，对问题具有发言权，从而使自身的论述具有极强的现场感，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推衍。换而言之，作者虽不乏理论家的素养，但并不是学院派理论家的论证风格，而是以充满临场感的报告为论述的前提和基础，让我们这些没有到过现场，没有掌握冲突的第一手资料的读者也能获得一副眼镜，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背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

在论述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从人权等普世价值出发进行的政治和军事干预时，作者也以明晰的笔调揭示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两难，一种美好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悖论，令人想起作者熟悉的伯林的著名论断：各种价值观未必是能够共存的，人类追求的有意义的价值观之间往往会产生冲突，真、善、美往往不能兼得。处理那些复杂的民族冲突等问题时，需要有高度的现实感和政治智慧，否则结果只可能是半吊子的仁义和道德理想的幻灭而已。换而言之，叶礼庭揭示

了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很多悖论，身处那些悖论之中，我们会发现也许永远找不出一个简单的答案。

我想先来谈一下给我很大震撼的《血缘与归属》。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中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到北爱尔兰。通过这些旅程，叶礼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关于当今新民族主义的灰色甚至是血腥的画卷，为我们讲述了世界各地的新民族主义倾向是如何导致冲突，甚至残酷战争的。比如，说到克罗地亚跟塞尔维亚的冲突，我们这些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外国人，除了看报纸电视上的报道，实在搞不清楚他们究竟为何从原来和睦相处的邻居，昼夜之间就变成你死我活的敌人，给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的《政治的概念》又提供了一个绝佳样本。叶礼庭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冲突地区进行实际调查，就是想要搞清楚双方冲突的根源。许多时候死亡如影随形，光凭这点就令人对这位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另眼相看。随着调查进一步深入，我们这些遥远的东方人也就渐渐明白冲突的起因和问题的复杂性了，远非一句塞尔维亚人对异族进行种族清洗就可以解释完毕的。

我当时是从西方的媒体上得知塞尔维亚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后来才知道在他们的历史记忆中还有其他事件，比如“二战”时期克罗地亚的民族独立组织乌斯塔沙(Ustashe)曾加入轴心国阵营，残杀过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等异族，最后被铁托击溃。作者到底是历史学出身，对事件的历史背景、来龙去脉做了很细致的调查，所以他能够对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做出比较独立的判断，对当年西方政府几乎一边倒的措施也能提出批评。他还去了铁托故居，为的是了解这位作为南斯拉夫象征的政治家在处理该国民族问题中起到的作用。原来铁托并不是塞尔维亚人，而是克罗地亚人。作为克族人的他，在建立了南斯拉夫之后，并没有真正处理好历史上发生过的民族矛盾，而是通过遮蔽和向前看的方法来处理这个很敏感的问题。这种方法在铁托那样的铁腕人物在世时可以起作用，一旦他去世，原来被掩盖起来的问题就渐渐露

出水面，后继者既然没有前任那样的权威，掌控不了局面，再加上立场偏颇，终于酿成一场巨大冲突，使原来和平相处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从生活在一个国家里的邻居变成势不两立的敌人。一些老人甚至说“二战”时候都没有杀得那么凶，这也让我们见识了新民族主义的巨大破坏性和残酷性。作者还采访了当过铁托副总统的一位老政治家，他俩关于历史和现状的对话也极有意思，读来饶有兴味。

作者写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民族矛盾的那一章也很吸引人，因为这里面有他自己的寻根旅程。叶礼庭的《伯林传》出来后，我读过一些人对作者的访谈，里面他谈到自己的家族。他的曾祖父是沙皇时代的内务大臣，参与过沙皇时代的排犹决策，而他的祖父则是沙皇时代末期的一位教育大臣，“十月革命”后举家流亡，最后定居加拿大。在去乌克兰采访的旅途中，他参拜了曾祖父母的墓地，见到了了解自己家族情况的年长的乌克兰人，虽非叶落归根，但这颇有回乡意味的旅途让作者感慨万千。毕竟他是流亡者的后代，所以他对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尖锐民族矛盾有跟纯粹局外人不一样的视角和感受。作者在采访黑海舰队时所了解到的情况真是极好地体现了原属一个大国的若干民族在国家解体后面临的困境：你的忠诚对象究竟是谁？书里面提到住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到俄罗斯去竟然要护照，原先非常平常的国内旅行一变为国际旅行，身份认同也变得尴尬起来了。

叶礼庭在美国完成学业后到英国寻求发展，不但为英国广播公司（BBC）做过不少精彩节目，而且为伯林那样在整个西方都极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写了颇受称赞的传记，英国可以说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但即便他熟知英国，在调查北爱尔兰问题时还是对英国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自己被英国的世界主义给“骗”了——英国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传统的。联想到脱欧公投，我们也就能理解英国独特的民族主义了：英国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完全变成世界主义式的，它虽然没有狭隘的岛国根性，但还是有很强的自我意识。这些“发现”都是作者

的功劳：帮助我们打开视界，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观念，对这个世界获得新的认知。

如果说叶礼庭的传记对象伯林是20世纪对民族主义最有见解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三本书中最厚的这本《血缘与归属》则给我们提供了新民族主义的各种范例。它们的本质都很相似，只不过是换了时代和环境，上演的剧本没有本质的差异。伯林在谈到民族主义时，既肯定了其积极的一面，也分析和批判了其残酷暴力的一面。伯林说19世纪的思想大家们几乎没有一个重视民族主义的影响力，大多认为随着时代的进步，民族主义会逐渐式微，所以那些大家几乎都没有预料到民族主义在20世纪的勃然兴起，甚至主导了很多政治运动。不管左翼、右翼，如果没有跟民族主义联合在一起，可能都无法取得胜利。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叶礼庭的这本书几乎是在为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提供一连串有意思的解释和注脚。伯林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因本书作者的叙述而变得更加丰富，更加有立体感了。

伯林在思考自己的犹太民族与阿拉伯人的冲突时，虽然并非完全没有萨义德（Edward W. Said）所批评的袒护以色列的一面，但他还是提出了双方应该妥协的建议，他对以色列政府的过激政策也提出过尖锐批评。巴以冲突里有的特征，你都可以在叶礼庭所记录的六次旅程里找到类似的对应。那么，究竟有没有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准则呢？透过叶礼庭深入冲突现场的考察，我们虽然被那些鲜血和暴力震撼，但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让本来深陷民族冲突的各方和平相处的原则。当然，这绝不是喊几句世界主义的口号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需要倾听各自的声音，通过理性的对话来寻找一条共生的道路，否则只会是无止境的、没有意思的冲突罢了。叶礼庭对比了公民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笔者也倾向于认同公民民族主义，因为既然这个世界上的国家都已几乎不可能是由单纯的同一个民族组成的，那么公民民族主义也就是唯一的选择了，这点跟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的宪法爱国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家都说自己是绝对的正义，都不准备妥

协，那么冤冤相报何时了？在这点上笔者认为已故的卓越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对巴以问题的剖析完全可以用在巴尔干民族主义冲突上面。

在读完沾有血腥味和戾气的《血缘与归属》之后读《火与烬》，会觉得很有趣味——对曾败选加拿大总理的作者来说，这样说也许有点失礼。这本书是叶礼庭在近耳顺之年投入政坛的从政记录，对我们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有不少帮助。笔者很喜欢看BBC转播的英国下院的论战，原以为欧美的议会大概都是差不多，哪里知道在作者的笔下，加拿大的议会运作并不精彩，有意思的演讲讨论也不多，纳税人也不是很关心自己国家议会的运转情况，跟英联邦的龙头老大西敏寺大本钟下的议员们比起来似乎差远了。其中最有意思的还是叶礼庭写他如何从政坛菜鸟逐步迅速进入角色，临危受命成为加拿大最大在野党——自由党——的党魁，并进而挑战当时的哈珀总理，却终因是空降政治家和若干失言导致落败的过程。从作者坦诚的叙述里我们可以发现，他在英美等国工作30年左右，然后应忧心自由党前途的若干政治家的热烈恳求回国从政，这本身就给他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因为在选举中对手始终可以拿这点来攻击他，而事实上加拿大的保守党正是这样做的，这让叶礼庭有口莫辩。毕竟作者大半生都在媒体和学界工作，做的是职业知识人而非职业政治家，要完成从学人到政治家的转身，时间还是太短了(虽然如今也有从房地产大亨摇身一变，成为总统的活生生的例子，那毕竟是罕见的，不可当作常有的事情）。他在选举过程中的失败经历正好说明他是政坛的菜鸟，跟那些年纪轻轻就在政坛打滚的职业政治家当然无法相提并论。不过他从谈政治的学人、战地记者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教授转到政治家的行业，从书桌上的“空论”到身体力行，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丰富而宝贵的经验，这也是这本书特别有价值的地方。

读完此书，可以发现他为我们考察当今西方民主社会面临的各种棘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佳的样本。我们一般都不太熟悉加拿大的政治

文化，它的国土那么辽阔，却似乎一直生活在南边那个超级大国的阴影之下。通过作者这位前自由党党魁的描述，我们会发现不管是英国脱欧公投还是特朗普上台，引起这些巨变的要素在加拿大这个民主制度运转基本上算是很成功的大国也存在，比如移民问题，比如政策如何反映民意，等等。在去年美国的大选中，建制派精英饱受攻击，主张美国第一的民粹主义占了上风，这当然是跟美国国内存在的现实问题分不开的。叶礼庭本人是作为“空降兵”突然闯入加拿大政界的典型精英，当然会遭遇巨大障碍。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跟选民打交道，让他们认识你、接受你，实在是很不简单的事情，需要接地气，自己去摸索，再多的政治理论也帮不了什么忙。这些修行的经历在书里都有很详细的描述，让你觉得要当一名合格的政治家实在不容易。当然，跟美国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在叶礼庭落选后没几年，自由党又重新执政，当今总理贾斯廷·特鲁多（Justin Trudeau）正是叶礼庭年轻时助选过的前总理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的儿子，而这位加拿大“官二代”的从政阅历并不比叶礼庭丰富到哪里去，看来毕竟还是因为拥有父辈的人脉，加上更“接地气”吧。

《战士的荣耀》作为一本评论集，是叶礼庭对包括新民族主义在内的当今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一个汇总，里面也有很多令我们读后深思的内容。如果说《血缘与归属》是以报道为主，这本书则是他对那些问题较为理论化的探讨。作者在此书中讨论的问题主要有：电视在这个时代的作用、微小的差异如何导致民族冲突、红十字会在现代社会里的使命和局限，以及转型社会和民族冲突地区的和解问题。在讨论为何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这样差异极小的民族会发生激烈冲突时，叶礼庭引用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做了梳理，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再有，讨论和解问题的《我们想要从中醒来的噩梦》也写得非常有深度，反映了他所思考问题的复杂性。很多问题一经他的阐述，我们就可以知道真的很不简单，远非采用“理客中”的态度就能处理好的。比如这篇文章里讲到和解中如何处理真相问题。我们知道南非有真相委员会，其在南非的国家和解和社会转型过

程中发挥了举世瞩目的重要作用，战后西德对历史的反省也颇受称赞，但如果看一看内部情况，其实并不简单，每一个进步都伴随着巨大的努力，有时是迫于外界压力。叶礼庭最后总结道：“和解建立在互相道歉的基础上，承认历史不是命运，承认历史不应受到谴责；也不应谴责文化或传统——历史必须谴责的只是特定个体。和解的最后一个维度（即哀悼死者）在于对和平的热望必须战胜复仇的渴望。除非和解尊重仇恨背后的情感，除非和解让曾陷入战争的共同体学会共同悼念死者的仪式，以之取代包含的对逝者的敬意，否则它不会有反抗仇恨的机会。和解必须触及死亡民主的共享遗产，告诉人们所有终结于杀戮的争斗都毫无作用，想要报复那些不再存在的人的所有努力都是无止境的徒劳。因为杀戮不会让死者复活，这是最基本的一项确定性。这是一种可以共享的遗产，当它得以共享的时候，一个人从梦中醒来时或许才会获得这种深刻的认知。”这是在观察了新民族主义冲突的现场，对历史上和当代的种族冲突进行深刻思考后得出的答案，这样的答案对我们思考自己的历史也是有启示的。每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都会面临各种复杂的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读完这三部著作，笔者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为了写作伯林传记，跟着伯林在伦敦坐巴士的那个四十岁左右的俄裔加拿大学人。叶礼庭写作的《伯林传》给20世纪留下了一份极有意思的记录，他在自己正值壮年的一段时期跟伯林的人生产生了交集，他所尊敬的这位哲学家思考的很多20世纪最重要的问题自然也给了他不少影响。细心的读者肯定能够发现，那些思考也不时出现在这三部著作里。叶礼庭的从政生涯虽然没有结出硕果，但他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恰恰相反，这三本书是一位不满足于坐而论道，有付诸行动的勇气的知识人的人生记录和理论反思，在这个价值观有错位的时代里提供了很清醒的判断，对我们理解时代和政治大有裨益。

在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托尼·朱特的友人、合写《思虑20世纪》的耶鲁大学斯奈德教授说，那些曾经被坚信的重要的现代性价值观如今却被怀疑，西方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黑暗的保守主义时期。从上面的叙述和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叶礼庭跟他景仰的伯林一样，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启蒙之子，虽然对现代性价值观不无批判，但他们都是捍卫现代性价值观根本原则的学人。依笔者的推测，对这个新保守主义时代他们肯定不会是赞成者，相反会是严厉的批评者(或许会被某些同胞骂为“白左”也说不定）。之所以这样说，倒不是因为他们是顽固地捍卫启蒙等现代性原理的教条主义者，而是基于他们对历史的锐利洞察和学理上的深刻见解。那些启蒙时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现代性价值观，固然在这两三百年里经历了很多批判，尤其是在被称为“极端世纪”的20世纪上半叶，启蒙运动以来的重要价值观遭遇过远比今日更为深刻的危机。虽然历史并未因为福山的那本名扬天下的著作而终结，现代性的根本原理毕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现在的我们也无须因为一场令人大跌眼镜的总统选举就对整个现代性价值体系产生深刻的动摇。

笔者在写这篇导读的时候，看英国的《卫报》等媒体报道说如今担任位于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校长的叶礼庭正在进行一场保卫大学的战斗。作为行动的知识人，他正在捍卫学术自由，在写他人生的新篇章，而此时他已入古稀之年。我们当然无法说作为政治家的叶礼庭获得了大成功，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败选后在电视上用英语和法语发表败选感言时的落寞眼光。据说西塞罗很喜欢说不应该根据成就来评价一个人，而是应该根据他为了某个目标而做的奋斗来判断，用这句话来评价叶礼庭，也许非常合适。在民粹主义再度沉渣泛起的年代里，叶礼庭的思索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当然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方——事实上自从柏拉图以降，也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家做得到——但是他的观察和思考一定会刺激我们思考那些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的“真问题”。我相信各位读者读完他的这些著作后，大概会有类似的感触，也会有看问题的新视野和新眼光吧。

1. 王前，日本东京大学教养学部东亚教养教育创新组织特任副教授，专攻政治哲学与思想史，在日本出版《中国是如何阅读西方思想的？》、《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合著）、《现代中国与市民社会》（合著）等多本著作，另在《知识分子论丛》、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思想》等学术类杂志发表若干论文、随笔。
2. 关于叶礼庭具体的发言内容，可参见笔者发表在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的《思想》第二十六期上的文章。

致谢

如果没有一支为你倾其所有的团队，你在政界必然无处可走。我如今能走到这里，要感谢的正是这支从开始的陌生人到最后变为挚友的队伍。如果我遗漏了你们中的任何人，请原谅。

艾尔弗雷德·阿普斯（Alfred Apps）、丹·布罗克（Dan Brock）和伊恩·戴维（Ian Davey）把我引入了政界的大门。参议员戴维·史密斯（David Smith）与他热情活泼的助理珍·哈特利（Jen Hartley）曾在我参选党领袖时帮助我动员议会党团的支持。前总理保罗·马丁（Paul Martin）与让·克雷蒂安（Jean Chrétien）曾给过我不少建议，也包括一些我应该听从却最终没有听从的建议。比尔·格雷厄姆（Bill Graham）曾在2006年出色地领导了自由党一整年。曾在皮埃尔·特鲁多（Pierre Trudeau）政府出任内阁部长的马克·拉隆德（Marc Lalonde）与唐纳德·S. 麦克唐纳（Donald S. Macdonald）两位，与罗伯特和埃莉诺·卡普兰（Robert and Elinor Caplan），以及戴维和佩妮·科莱尼特（David and Penny Collenette）一样，曾将他们的宝贵经验传授于我。我所到之处，似乎总能看到阿德里安·麦克唐纳（Adrian McDonald）、卡罗莱娜·加洛（Carolina Gallo）与南希·科尔达姆（Nancy Coldham）的身影，戴维·莱特（David Wright）和拉里·赫尔曼（Larry Herman）也是如此。在我参选党领袖期间，萨钦·阿加沃尔（Sachin Aggarwal）、亚历克西斯·莱文（Alexis Levine）、马克·坂本（Mark Sakamoto）与莱斯利·丘奇（Leslie Church）是我那支由律师和学生组成的辅选团队中的核心成员；米尔顿·陈（Milton Chan）是当时众多“数据猿”中的一位，汤姆·埃里森（Tom Allison）则是一位幕后的决策者（*eminence grice*）。贝丝·希斯菲尔德（Beth Hirshfeld）负责管理我的拉票队伍。宝拉·维奥

拉（Paula Viola）去上法学院之前，也曾和我们一起四处奔波。马克·查理福克斯（Marc Chalifoux）曾在2006年担任我的私人助理。除了为我们筹款外，埃尔维奥和马尔琳·德尔赞托（Elvio and Marlene DelZotto）还处处维护我们、为我们着想。亚伯·施瓦兹（Abe Schwartz）曾为2006年的党代会组织了一支摄影队伍，我们也从此成为了朋友。任劳任怨的玛丽·凯瑟（Mary Kancer）是我在怡陶碧谷湖滨（Etobicoke-Lakeshore）的选区助理；阿尔芒·柯南特（Armand Conant）曾是我的官方代理人；杰米·马洛尼（Jamie Maloney）曾是我的选区协会主席。我仿佛还能听见他的母亲，玛丽恩·马洛尼（Marion Maloney），在我耳边强烈敦促我招募更多女性加入我的辅选队伍。凯西·科特里斯（Kathy Kotris）、安妮塔·朱厄尔（Annetta Jewell）、娜塔莎·布朗夫曼（Natasha Bronfman）、吉尔·费尔布拉泽（Jill Fairbrother）、马蒂·卢维斯（Marti Rowse）与康妮·米卡莱夫（Connie Micaleff）曾是我在怡陶碧谷湖滨的团队主心骨。我与省议员劳雷尔·布顿（Laurel Broten）共同负责这一选区。杰夫·基欧（Jeff Kehoe）曾驾驶飞机载着我们在安大略省（Ontario）南部穿越暴风雨，也曾数次在深夜里把我们送到全国各地的小型机场参加活动。保罗·泽德（Paul Zed）炫目的驾驶技术曾让我在新不伦瑞克省（New Brunswick）的路上吓得不轻。史蒂夫·麦加奈德（Steve Megannety）正是那个对我说“我希望党能变回原来的样子”的“标语男”；凯文·陈（Kevin Chan）放弃了在枢密院办公室（Privy Council Office）前途光明的工作，来为我做政策研究；亚当·戈登堡（Adam Goldenberg）负责为我撰写演讲稿，而我还曾自作聪明地想在上面做修改。彼得·多诺洛（Peter Donolo）曾任我的办公室主任，和帕特·索尔巴拉（Pat Sorbara）、希瑟·恰森（Heather Chiasson）以及让——马克·富尼耶（Jean-Marc Fournier）一起，从2009年开始管理我的办公室。帕特里克·帕里佐（Patrick Parisot）也曾将他丰富的内政外交经验带到我的党领袖办公室；萨拉·韦尔奇（Sarah Welch）让我们的工作得以井井有条；杰里米·布罗德赫斯特（Jeremy Broadhurst）在处理众议院各项事务时沉着冷

静，魅力非凡；布赖恩·博亨尼基（Brian Bohunicky）与迈克尔·麦克奈尔（Michael McNair）为我草拟了用于2011年大选的政纲；凯西·安塔罗（Casey Antolak）、丹·兰格（Dan Langer）、戴夫·里奇（Dave Ritchie）与吉姆·宾布利特（Jim Pimblett）和我一起在竞选期间遍访各地；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不断对我说，“你的梦想正在实现”。马克·根德隆（Marc Gendron）、歌西娅·莱德辛斯卡（Gosia Radaczynska）与乔丹·欧文斯（Jordan Owens）负责管理我们的社交媒体团队。理查德·马克斯密（Richard Maksymetz）是我们在西部的组织人，他从没能真正戒烟；马特·斯蒂克尼（Matt Stickney）从不会忘了忙里偷闲；麦克·欧沙纳西（Mike O'Shaugnessy）在竞选时逐渐精通了怎么在人群里像鸭子似的倒着走路。

特雷弗·哈里森（Trevor Harrison）、克里斯蒂安·普罗文扎诺（Christian Provenzano）与里欧·刘易斯（Rheal Lewis）三人曾在我任党的副领袖时尽心辅佐我，与我一同渡过了2007年12月的乔克里弗核设施（Chalk River Nuclear Facility）危机。

生活在斯托诺韦（Stornoway）的两年半时间里，乔希·德拉赫（Josh Drache）、艾克斯比·卡斯特拉（Expie Casteura）与杰里·珀蒂（Jerry Petit）每天都会在家欢迎我们回来，让那座房子成了我们当时最好的庇护所。简·肯尼迪（Jane Kennedy）细心体贴地照顾巧兰和我的生活起居。斯科特·麦考德（Scott McCord）总是可以让我们以最快速度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党的执行主任伊恩·麦凯（Ian McKay），他让党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维持正常运转。

警卫官凯文·维克斯（Kevin Vickers）总会在我忘记的时候提醒我，众议院是一个高尚的地方；议长彼得·米利肯（Peter Milliken）则勇敢地站出来捍卫议会的权威。党的众议院立法活动主任理查德·瓦克

德（Richard Wackid）生前也曾深深热爱在众议院的工作，但他不幸在与卢伽雷氏症（Lou Gehrig’s disease）勇敢的搏斗中离我们而去。

2006年至2011年间，每周三与参众两院自由党议员在党团会议上的会面都让我感到收获满满，而每次与他们一起在各自的选区工作，也让我从现实政治里学到了许多。此外，我也想在此感谢所有在我的领导下参加了2011年大选的候选人们。

奥利佛·杜切尼奥（Oliver Duchesneau）、布丽吉特·勒高（Brigitte Legault）、罗伯特·阿塞林（Robert Asselin）、保罗·瑞安（Paul Ryan）、马克——安德烈·布兰查德（Marc-André Blanchard）、雷蒙德·加诺（Raymond Garneau）、让-马克·福尼尔（Jean-Marc Fournier）与吕西安娜·罗毕拉（Lucienne Robillard）尽其所能让我理解了魁北克省的政治形势；同时，德怀特·邓肯（Dwight Duncan）、唐·盖伊（Don Guy）与艾琳·卡罗尔（Aileen Carroll）则加深了我对安大略省情况的了解。如果没有玛丽·麦克劳克林（Mary Mclaughlin），我们在伦敦与安大略的访问就不可能成行。安大略省省长达尔顿·麦坚迪（Dalton McGuinty）曾对我说：“在政界，只有两个问题值得一问：你准备好赢了吗？还有，你做好输的准备了吗？”魁北克省省长让·查尔斯特（Jean Charest）告诉我，政治中最关键的一个词就是“坚持不懈（*la pérseverance*），叶礼庭先生，坚持不懈”。在纽芬兰省，保罗·安特尔（Paul Antle）不仅把我的团队安顿妥当，还让我在他家楼下的沙发上休息；在新斯科舍省，吉姆和莎伦·戴维斯（Jim and Sharon Davis）用他们自身启迪人心的故事让我们懂得了什么叫作勇气：吉姆的儿子保罗在阿富汗服役时不幸去世。在萨斯喀彻温省，理查森和麦钱特两家人（the Richardson and Merchant families）从始至终都支持着我。在阿尔伯塔省，格兰特·米切尔（Grant Mitchell）、琼·布拉萨（Joan Bourassa）和达丽尔·福里德汉德勒（Daryl Fridhandler）的努力让我们得以在当地拥有坚固的选民基础；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基思和玛丽·简·米切尔（Keith and Mary Jane Mitchell）总是会对我们表示慰

问，而戈登和基尔比·吉普森（Gordon and Kilby Gibson）和他们的女儿们也时常给予我们建议和灵感。戴维和布伦达·麦克莱恩（David and Brenda McLean）对我们既慷慨又热情。贾庭德和罗茜·赖（Jatinder and Rosie Rai）对不列颠哥伦比亚低陆平原上的所有社群而言都是出色的导师。

保守党的庄文浩（Michael Chong）、新民主党的彼得·斯托弗（Peter Stoffer）以及魁北克集团（Bloc Québécois）的吉勒斯·都赛佩（Gilles Duceppe）亲身证明，在众议院不同党派间的以礼相待是可能的。

《新闻》（*La Presse*）报社的安德烈·普拉特（André Pratte）、《多伦多之星》（*Toronto Star*）报社的苏珊·德拉古（Susan Delacourt）、《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的迈克尔·瓦尔皮（Michael Valpy）和加拿大电视网有限公司（CTV）的克雷格·奥利弗（Craig Oliver）向我们证明，记者也能坚守对你的信心，永远不会背叛你。迈克尔·莱文（Michael Levine）曾告诫过我当下所做之事的危险，可我却辜负了他的一片良苦用心。

败选的那天晚上，在所有人都已离开了现场后，克里斯·布雷特（Chris Bredt）与杰米·卡梅伦（Jamie Cameron）仍在身边陪伴着我们。柯尔斯滕·沃尔格伦（Kirsten Walgren）与罗布·里门（Rob Riemen）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让我们得以在阿姆斯特丹休息了一阵子，而伯纳德·海汀克（Bernard Haitink）与西蒙·拉特尔（Simon Rattle）则给予了我们最好的鼓舞。

从政的五年里，李博（Bob Rae）既是我的对手，也是我的朋友。他在我出任党领袖时曾忠心耿耿地为我效力，后来他在出任临时党领袖时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罗布·普里查德（Rob Prichard）、约翰·弗雷泽（John Fraser）、戴维·内勒（David Naylor）和贾尼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的帮助让我得以在败选后找到一份难能可贵的工作。戴维·埃尔伍德（David Ellwood）、艾丽丝·博纳特（Iris Bohnet）和阿瑟·阿普尔鲍姆（Arthur Applbaum），还有许多其他的同事则对我回到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继续执教表示欢迎。

2012年，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法学院院长邀请我在J. 罗伯茨纪念讲堂（J. Roberts Memorial Lecture）上做了一场以“在法律与政治上的资格”（Standing in Law and Politics）为题的演讲。布伦丹·奥利里（Brendan O’Leary）对这场演讲所提的建议让我获益良多。同年，彼得·弗洛伦斯（Peter Florence）邀请我去海伊文学节（Hay Festival）的雷蒙德·威廉斯讲堂（Raymond Williams Lecture），做了一场关于政治与文学的讲座。另外，受斯坦福大学人文中心（The Humanities Center at Stanford University）的邀请，我在该校的主席讲堂（Presidential Lecture）做了一场以“敌人和对手：政治中的政党偏见”（Enemies and Adversaries： Partisanship in Politics）为主题的发言。2013年，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tionality，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埃德娜·乌尔曼——马加利特讲堂（Edna UIlmann-Margalit Lecture）上，我以“政治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Politics）为题做了一场讲座。回到肯尼迪学院，在我所开设的代码为DPI 205的“责任与代议”（Responsibility and Representation）课堂上，我的学生们让我明白了这本书应该怎么写。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李纳克尔学院（Linacre College）的邀请，让我有幸在2013年6月登上坦纳讲堂（Tanner Lecture）围绕责任与代议发表演讲。

AP瓦特代理公司（AP Watt）的德雷克·约翰斯（Derek Johns）在他人尚未发现时便看到了本书的价值。哈佛大学出版社（Harvard University Press）的伊恩·马尔科姆（Ian Malcolm）与加拿大兰登书屋

（Random House Canada）的保罗·汤顿（Paul Taunton）和德雷克一样眼光锐利，他们的编辑让本书以更好的品质呈现在读者眼前。

我的弟弟安德鲁·伊格纳季耶夫（Andrew Ignatieff）对我当初从政的决定曾有异议，但当我真正踏入政界后，他便始终支持着我，帮助我渡过了每一次的难关。

这本书也为了纪念以下三位同事而写：布拉德·戴维斯（Brad Davis）是一位年轻的律师，2006年时曾在我的辅选团队工作，后不幸罹患癌症去世；迈克尔·格里斯多夫（Michael Griesdorf）曾与我一起在2006年挨家挨户地与民众接触，后于2008年去逝；马里奥·拉格（Mario Laguë）曾在我的办公室任通讯部主任，于2010年8月不幸死于一场车祸。我为他们所有人哀悼。

我要特别将这本《火与烬》献给一位自始至终陪我一路走来的亲人——我的夫人，苏巧兰（Zsuzsanna Zsohar）。

第一章 狂妄

2004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三位与我素未谋面的男士特地到访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邀请我和夫人苏巧兰共进晚餐。他们便是后来被我们戏称为“黑衣人”的艾尔弗雷德·阿普斯、丹·布罗克和伊恩·戴维三人。我们约好在查尔斯酒店见面，酒店旁便是我教授人权和国际政治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来自多伦多的律师艾尔弗雷德·阿普斯看上去似是三人的领队，健谈的他在吞云吐雾间几乎主导了饭桌上所有的谈话，他面前盛着红酒的高脚杯很快就见了底。一旁的丹·布罗克来自蒙特利尔，外表儒雅，英语流利，在多伦多经营着一家大型律所。另一边眼窝深陷、眉毛粗浓的是伊恩·戴维，他既是作家也是导演，他的父亲正是当年使自由党在全国大选中数次胜选、人称“造雨人”的参议员基思·戴维（Keith Davey）。待寥寥一两杯琼浆下肚，阿普斯便直奔主题，问我是否考虑回加拿大代表自由党参选。

当时，执掌加拿大政权的仍是自由党。我于是问他们，是不是时任总理保罗·马丁（Paul Martin）派他们来的。他们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我便知并非如此。看来三位“黑衣人”自行提议让我回国参选，是准备要在党内另起炉灶，他们直白地告诉我，如此提议的目的便是要让我有朝一日出任总理。丹·布罗克说，自由党“正走向自我毁灭”，如果再不及时出现一名新的领袖，党在下次大选中几乎必败无疑。他们会组成一个团队，许多年轻人会拥护我。他们还向我承诺，一旦我答应他们的提议，便会助我在两年后的选举里赢得一席之地。我是否应该至少考虑下他们的提议?

他们的提议让我着实吃了一惊。我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个完完全全的加拿大人，但我毕竟已经背井离乡三十余年，这期间我在剑桥大

学国王学院做过研究员，也在英国做过自由撰稿人，如今在哈佛担任教授。诚然，我曾在皮埃尔·特鲁多1968年的辅选团队里工作过，一生也都在观察着各路的政治家，但为什么会有人仅凭我的政治写作能力就认定我够格成为一名政治家呢？我是一个为思想而生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从辩谈中汲取或简单或复杂的快乐的知识分子。我一向十分崇敬那些弃笔从政的知识分子——秘鲁的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捷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和墨西哥的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但我也知道，他们中许多人的政治生涯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况且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与他们相提并论。注

“黑衣人”的提议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我也全然不知他们是否真能兑现承诺。当晚酒足饭饱后，他们准备启程返回多伦多时，我只是告诉他们我会予以考虑。

走出查尔斯酒店，我和巧兰沿着查尔斯河岸，沐浴着秋夜的静谧步行回家。我们在美国的生活很幸福。工作上，我既有令人称奇的学生，也有赫赫有名的同事；生活上，即便身处异乡，我和巧兰在美国的生活也很安逸舒适。既然如此，是什么动摇了我在此系泊的游子之心——是迟来的爱国精神？是单纯的政治野心？还是为了找回那份被长期压抑的存在感？面对这个荒唐的想法，我本应一笑置之，可当时的我却一丝笑意也没有。我以为自己是谁？

这本《火与烬》所要讲述的，便是我为什么——在不久之后，罔顾一些好友的异议，答应了“黑衣人”的提议——的故事。它记录了我从初识政治的残酷开始，一步步朝着这个地球上疆域最为辽阔的民主国家的权力巅峰攀登的经历。我想通过这本书展现的是，一个原本明智的人是如何因为一个梦想让自己的生活天翻地覆的过程，说得不客气些，就是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是如何无助地向内心的狂妄屈服的过程。

比起为我自己作传，这本书更是一本反思过往的回忆录。我希望能借自己的故事来去芜存菁地探讨政治，探讨以政治为业、为生活方式的一般特性。我曾将这种生活方式践行到极致，即便是期间最为黑暗的时刻，如今想来仍让我缅怀万分。我知道在一个人头攒动的礼堂里面对4000位民众演讲还能游刃有余地——至少我觉得还能——掌控全局的感受。我也知道和一群对我怀有敌意的民众交谈，还要看着他们写满了冷漠和怀疑的脸庞是什么感受。从上千名与我们共同奋斗的同事那里，我体会到了忠心耿耿，而从少数居心叵测的人那里，我尝到了背叛的痛楚。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但也有时候，我不得不无助地目睹局面一步步走向失控。曾经，每每想到自己或许能为人民谋福祉便会欣喜若狂，而如今，我只能背负着自己再也无法有所作为的遗憾。总而言之，我曾那样活过，曾为吸取的教训付出代价，也曾在飞蛾扑火般追求权力的路上，亲眼看着最后的希望化为灰烬。

灰烬，虽然只是不起眼的残渣，却也有独特的用处。我的父母过去常从壁炉里铲出余烬，撒到我家西墙边的玫瑰地上。我的父母已离世许久，但每到夏天，当他们的玫瑰绽放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相信，正是因为我仍从壁炉里铲出余烬撒到玫瑰地上，这份美丽才成为可能。

我希望自己政治生涯里的余烬，也能被撒到别人家的苗圃里。如果你和我一样，儿时会在上学路上自言自语地发表演讲，会憧憬各种各样的政治荣耀，并且长大成人后选择亲身践行儿时的理想，那我希望我在这五年里学到的东西能够给你一些启发。任何和我一样热爱政治的人，都会想要鼓舞他人为自己的理想而活，并且希望他们能在正式投入政治的疆场前，做了比我更充足的准备。我希望他们不仅能明白、能体会到成功的甜蜜，也能尝一尝失败的苦涩，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学会不惧成败。

这本书是为了高歌政治与政治家而写的。这段经历让我重拾对政治家群体的敬意，也让我心中对公民力量的信念再次复兴。如果你觉得这些话从一个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的人嘴里说出来，听上去有些奇怪甚至虚伪的话，那我必须告诉你，失败也有其独特的价值。这段对我而言并不顺利的经历却让我收获了赞美这种生活的权利。

当今的民主政治确实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弊病——我会在之后详述——多到让人们很容易忘记民主理想所蕴含的真理，就是这样一种反复被考验的信念：任何普通人，无论男女，都拥有选择让谁来以他们的名义治理社会的权利，而那些被选为治理者的人，都能带着正义与怜悯之心展开治理。任何书写民主政治的文字都势必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即如何在毫不留情地批判现实政治的同时，坚守对民主理念的信仰。这一信念伴我同行至今，我以它为生。本书便是我对这一信念的誓约。

---

1. Mario Vargas Llosa，A Fish in the Water，Transl. Helen Lane Farrar（New York：FSG，1 994）；Václav Havel，To the Castle and Back，transl. Paul Wilson（New York：Knopf，2007）；Carlos Fuentes，Myself with Others（New York：FSG，1988）.（本书注释除特别标明外均为作者注。）

第二章 雄心

你从政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从政。或许你会惊奇地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身处政界却依然无法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的人。但是，为什么会是选民、记者和对手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政治生涯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你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你之所以想成为国家的领袖，或许是因为这份工作会让你拥有一架专机，一处豪宅，一个为你马首是瞻的政府，还有一众穿着西装、戴着耳麦、佩带枪支的男女保镖；又或许是因为你渴望权力，享受将别人的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的快感；也可能是因为你想流芳后世，做一个名人，让人把你的名字写进历史教科书或者用来命名学校，再把你的肖像挂在各种神圣的礼堂大厅；甚至有可能，你只是想清算自己的过去而已，报复每一个曾断言你定将一事无成的人。

当然，这些理由你一条也不会想告诉别人。在政界，说话率直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你会告诉别人的一定只是：你想改变世界。你相信自己的经历让你有资格担此重任。这种表达上的迂回不仅是民主的礼节，更是对人民主权仪式性的致敬。虽然人们可能会怀疑，你想改变的只是自己而非他们的生活，但他们仍然希望听你亲口说：你正是为了他们才决定从政。

值得思考的是，这种掩饰或许也有其独特的作用。一开始的伪善，最终可能会演化为政治家的第二天性。从最初装出一副为民服务的姿态开始，久而久之，你或许会惊讶地发现，自己最终真的在践行承诺。当然，你起码要有一些基本的公仆意识，否则你必然无法在政治的夹缝里生存下来。有时，政治家真是份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要是

心里再没有一丝一毫的使命感，你就只能逐步沦为一介草夫，还不自知。

当我开始考虑是否要接受那三名“黑衣人”的提议时，我必须首先想清楚自己参选总理的初衷是什么。没错，让我出任总理就是他们提议的核心。如果我接受了他们的提议，我就要回到家乡，参选议员，再待时机成熟后，出面角逐总理宝座。可是，我一开始为什么会想做总理？我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上的使命感，而且也找不到任何合理的动机去做个高官。对我而言，回国从政吸引力最大的部分，就是可以不用再做一名观众。我一直以来都坐在观众席里看着场上的比赛，现在也是时候亲自上场了。你当然能够这样告诉自己，但不能这样告诉那些你想争取他们支持的人。当时我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但不久后的一次教训让我从此记住了这个道理。2006年夏天，正参选自由党领袖的我出现在鲍尔集团（Power Corporation）的白色宴会厅里，应约和蒙特利尔商界人士会面。在场的一位商业领袖问我，能否用简短的一两句话解释一下我参选总理的初衷。这个问题让我有些意外。我回答说，这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工作之一，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拿下这个挑战。

身处政界，没有什么会比将真相脱口而出给你带来更大的麻烦了。我还记得，当时我话音刚落，整个宴会厅便霎时被一阵寒意笼罩。在场的都是生意人，这些商业领袖不会对资助我参加什么生存挑战有任何兴趣。他们意欲支持的，是一个有希望赢得大选，并且会在胜选后赋予他们权力的人。

当时我就知道，自己答错了这道关于我从政初衷的基础题。此后，当登顶的征途从冒险之旅开始转变为求生之旅的时候，我才明白关于这道题有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是何等重要。相信我，只有外行才会给出这种拿下生存挑战的理由，因为我就曾被这样指责过。

我记得在2009年9月到12月间，作为党领袖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出错，我的手下看着我们不断下跌的民调惊慌失措到都不敢直视我的眼睛，但我们仍然要设法应对媒体不留情面的追问。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必须在众议院质询时段（Question Period）[注]与眼前那个自以为是的政府对峙，可我却总是拿他们没有丝毫办法，这让我感到万分煎熬。所以，每次质询时段开始前，我都会先冲到盥洗室，看着镜中的自己，强迫自己接受这份工作，强迫自己相信我能够胜任，告诉自己不能就这样当场认输。那时，巧兰常对我说：你还不够想要这份工作。但这并非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当时我已经想不起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才想从政的。正如其他任何困难的工作一样，你都会遇到这种怀疑自己是否还能胜任的时候。每一次犯错似乎都让无法胜任的质疑得到印证，你的自信心也会因此屡屡受挫。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你才会明白，如果你想熬到目标达成的那一刻，不管你决定要得到什么，你都不能忘了那个一开始驱使你的原始冲动。所以，你最好别忘了。

政治比其他任何我所了解的职业都更适合用来考验一个人的自知之明。这一路风雨兼程让我意识到：你为何想成为一名政治家这个问题，其实就等于，你是为了谁才想成为一名政治家。就我来说，我究竟是为了谁?

在雄心根植的那个原始层面上，你想要拥有某些东西，是为了那些使你成为今天的你的人。对我而言，我从政为的是我的母亲艾莉森与父亲乔治，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还在世，一定会希望我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当然，这只是猜测罢了，因为他们早在我投身政治前就已经去世。我想，他们对我的影响并非来自对我该怎么走人生道路的强制要求，而是来自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历程。比起内生的自我创造，我的政治理想更像是传承了父母的衣钵。早在19世纪，伊格纳季耶夫一家便因效忠沙皇而被封为贵族，享有声望。我的曾祖父早年曾被沙皇派驻君士坦丁堡，出任沙俄驻奥斯曼帝国宫廷的使节。1882年，他

出任沙俄内政部长，负责重建沙皇亚历山大二世（Czar Alexander II）被刺杀后的国家秩序。然而，他的政治生涯以失败告终，最后只能在自己位于乌克兰的庄园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20年，为失去了沙皇的信任以及他原先为国家制定的所有计划付诸东流而闷闷不乐。他的儿子，我的祖父保罗起初负责打理家族在乌克兰的庄园，后来沿着帝国的官僚系统一路晋升为农业部副部长，并最终成了沙俄末代皇帝尼古拉斯二世（Czar Nicholas II）内阁的教育部长。之后的俄国革命将他赶出了俄国，起初他流亡到英国，后来才到了加拿大。他与我的祖母纳塔莉在魁北克省墨尔本上城的一个村舍里度过了生命里最后的一段时光，两人最终被安葬在俯瞰圣弗朗西斯河的长老会墓园（Presbyterian cemetery）里。(注)

我的父亲乔治虽是兄弟五人里的老幺，却是最有雄心壮志的一个。当整个家族因为处境艰难从英国搬来蒙特利尔时，父亲只有16岁。搬到加拿大后的第一个夏天，他便离家到不列颠哥伦比亚，在库特尼峡谷（Kootenay Valley）为一个铁路公司铺铁轨赚钱，期间也逐渐学会了喝酒、骂人和伐木。等他在1928年夏末回家的时候，已然成了一个皮肤棕黄、肌肉强健的加拿大人。后来，他到多伦多大学求学，成绩优异的他在毕业后获得了罗德奖学金（the Rhodes Scholarship）并赴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继续深造，彼时正值1939年“二战”爆发之际。40年代初，他完成学业后离开牛津前往伦敦，在位于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加拿大别墅（Canada House）(注)为加拿大政府工作。那时27岁的他，身处正遭德军狂轰滥炸的伦敦，担任文森特·马西（Vincent Massey）的私人助理。作为马西·哈里斯·弗格森农机公司的继承人，文森特当时正任加拿大政府驻英国高级专员。在那枪林弹雨的四载时光里，父亲负责起草马西的信件和电报，安排他的行程，有时也会陪他一同到白厅（Whitehall）(注)与内阁大臣和将军们会面。从1940年的敦刻尔克（Dunkirk）大撤退到1942年美军抵达英国战场，加拿大军队是当时不列颠群岛上一支至关重要的防卫力量。加拿大在

当时的角色很关键。因此，在那样一个时间点上，以加拿大外交官的身份开始他的职业生涯，虽然危险，却也荣耀。我的父亲正是在那位一丝不苟又自视甚高、比英国人更像英国人的传奇领袖的手下度过了自己的学徒期。

那时与我父亲共事的，还有一位魅力出众的外交官，他便是后来成了加拿大总理的莱斯特·B.皮尔逊（Lester B. Pearson）。1940年到1941年间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和我父亲轮流在加拿大别墅的房顶上值夜，观察交火形势。一旦看见特拉法尔加广场附近出现炮火，他们便会立刻致电当地民防部门告知情况。敌人发动猛烈突袭的那几次，他俩被迫从房顶撤至地下室，在黑暗中蜷缩在一起，任由一旁破裂的管道里淌出来的水浸湿他们的鞋子。一个星期天的清晨，一场激烈的突袭刚刚过去，他们亲眼看见方才被袭击的白厅办公楼的窗户里，飘出了一张张烧焦了的文件。皮尔逊当时说了一番话，据我父亲后来的回忆，他的大意是："文明哪里经受得住如此摧残，我们必须设法阻止。"[注]至少我父亲认为，皮尔逊在战后对联合国大力支持的念头便是从这一刻萌生的。

同样在战时的加拿大别墅，我的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艾莉森·格兰特（Alison Grant）。她是文森特·马西的侄女，马西的妻子爱丽丝·帕金（Alice Parkin）是她的姨母。我母亲在1938年来到伦敦，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College of Art）求学。当时22岁的她还在为英国军事情报机关军情五处（MI5）工作，出任打字员和秘书。

我母亲一家与伊格纳季耶夫家族同样志向远大、热心公益。我的外曾祖父乔治·帕金（George Parkin）是新不伦瑞克省的一名教师，凭借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培育英才的能力成为管理牛津大学罗德奖学金的罗德基金会（the Rhodes Trust）的创始秘书。我的另一位外曾祖父，乔治·门罗·格兰特（George Monro Grant），曾是一支铁路勘测队的秘书，这支由工程师桑德福·弗莱明（Sanford Fleming）带领的勘测队曾

在1872年夏天一路往西，勘察从落基山脉（Rockies）直通太平洋的耶洛黑德公路（Yellowhead Route）。[注]从酷热的7月到初雪的10月，他们划着独木舟，乘着火车和汽船，骑着马，最后又坐着红河推车（Red River cart）[注]，从大西洋沿岸来到太平洋沿岸，成为加拿大建国五年来第一批在陆地上穿越这片土地的人。当他结束这段旅程回家后，便写下了《从此洋到彼洋》（*Ocean to Ocean*）一书，他在书中不仅描绘了沿途所见雄伟壮丽的风光，还憧憬了这片土地未来的美好前景。如果你的成长过程中，书架上也有这本《从此洋到彼洋》相伴，想必你也会和我一样觉得自己来自一个建国者的家族。

格兰特一家也有不少与总理有关的故事。约翰·A.麦克唐纳（John A. Macdonald）——那位通过贿赂、胁迫和各种粗鄙的政治手腕执掌国家机器直到1891年去世的保守党领袖——曾是金斯敦（Kingston）当地的一名议员，而我的外曾祖父就曾在位于金斯敦的女王大学（Queen’s University）担任校长。常被金斯敦当地居民亲切地称作乔迪·格兰特（Geordie Grant）的外曾祖父，曾对麦克唐纳的很多做法深感不安——比如他从铁路修建者那里敲诈钱财来充盈保守党钱袋的做法——并毫不犹豫地将他的顾虑广而告之。两人垂垂老矣之际，曾在金斯敦的一次聚会上相遇。约翰·A.麦克唐纳爵士走到外曾祖父跟前半开玩笑地问他：“乔迪，为什么你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我曾是你的朋友，约翰爵士，”外曾祖父尖酸地回答说，“在你做对了事情的时候。”“我要这样的朋友有什么用！”[注]这头老狮子吼道。

正是这些故事驱使我在困难的时候迎难而上。政治是一个大舞台，是一个既可以让你自己度过有意义的一生，也可以让你继承家族使命的舞台。政治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决定从政，既为了我的家族，也为了我自己。

但我现在要向你们承认，以上这些故事仍然不是“你为何选择从政”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你不可能奉父母之命才从政，所以这么回答

也会是个政治错误。任何关于从家族那里承袭权力的念头在如今的政治中无疑都是致命的。民主最美妙的部分就在于——或者应当在于——你必须亲手争取每一样东西，亲自去争取每一张选票。我深知不应觉得自己天生就有从政的权利，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才行。然而，当我在考虑是否要接受那三位曾在10月的夜晚与我共进晚餐的男士的提议时，我来自一个对于公共生活有着强烈使命感的家族——这个事实在我脑中挥之不去。

当我的母亲在为军情五处工作时，她曾和一位脾气刻薄、身材娇小的温尼伯人（Winnipeg）凯·穆尔（Kay Moore）同住在南肯辛顿沃尔顿大街54A号楼，凯后来冠了夫姓金佩尔（Gimpel）。1942年末到1943年初，她们曾把一个房间和一张床借给两个加拿大人弗兰克·皮克斯吉尔（Frank Pickersgill）和约翰·麦卡利斯特（John Macalister）住，他们加入了特殊作战执行部（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即将空降在法国的领土上加入与德国占领军战斗的抵抗运动中去。1943年6月前的数月，我的母亲和弗兰克走得很近——我永远也不会知道到底有多近——直到他有天晚上离开了住处，后来随降落伞落在了巴黎南面的卢瓦尔河谷（Loire Valley）的一处降落点。几乎就在两人降落的同时，他们就被出卖了，被直接交到了盖世太保的手上，随后便被关进了集中营。之后的两年，我母亲和凯都在等两人的音讯。特殊作战执行部让他们想了一些只有弗兰克和约翰能理解的暗号——比如“54A号楼里俄式茶炊的水开了”——看他们是否会通过无线电报回信，但之后收到的那些回复似乎都并非出自弗兰克和约翰之手。事实上，当时德军在同他们玩电波游戏，企图误导特殊作战执行部，使其相信他们两人仍然充当着特工的角色。我的母亲和凯开始恐惧最糟的情况是否已经发生。直到1945年春天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注]解放，两人才知道弗兰克和约翰在历经了长期的折磨后，早在1944年9月就被杀害了。[注]

1945年4月，我母亲写了一封信给弗兰克的兄弟杰克。我在信中仿佛听见——孩子很少能听见母亲以这样的口吻——她在亲口诉说着自己年轻的希望和梦想：

> 我知道（弗兰克）在英国的那些日子是快乐的——他的生活很充实，我们也被他所创造的无拘无束的爱情与欢愉深深吸引，和这些比起来，现在失去的又算得了什么。
>
> 他用他的幽默风趣、广博的兴趣和爱人之心将我们紧紧地黏合在一起。他的存在为我们设立了生活的标准。我清楚地知道，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可能阻挡他的脚步。直到他出发的那天，他都始终清楚地知道自己非去不可。他的离去不只是我和其他深念他无可替代的诸位的个人损失。他的果敢、无畏，还有他非凡卓越的想象力不仅在战时不可或缺，在战争结束后的今日同样如此，我们都应以他为楷模。
>
> 然而，他的生命并没有被白白浪费。正如许多他在这里的朋友告诉我的那样，我感到他将那股正义凛然的精神和绝不妥协的信念留给了我们。这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他向我们彰显了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而我将永生铭记。

1945年秋天，我的母亲从战场回家，与我父亲成婚。尽管她几乎从来没有主动提及过弗兰克，但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中，弗兰克却好像一直生活在我们身边。50年代，我们在渥太华郊区的住所离弗兰克兄弟杰克的家仅相隔一个街区。比起我们，弗兰克当然更是他们的一员，但我们也同样珍惜和他有关的那些回忆。

战争结束后，我的父母在加拿大外交系统内一路晋升，我们兄弟两人也跟随他们的脚步常年旅居海外，逐渐在华盛顿、贝尔格莱德、伦敦、巴黎、日内瓦和家乡渥太华等地长大成人。我的父亲曾为数位总理效力，其中也有莱斯特·皮尔逊，对他而言莱斯特永远是当初的迈

克。[注]20世纪50年代的渥太华，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皮尔逊先生有一次在外交部组织的野餐会上玩起了棒球。我父亲当时在外交部任职，而皮尔逊先生是外交部长。那是一个郊区学校的棒球内场，皮尔逊先生身着衬衣、打着领带，站在击球手的位置上。只见他击球后便径直向一垒跑去，站上垒包后便转身朝所有正忠诚地为他欢呼着的下属投来一个欣喜的笑容。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我的父亲受命组织了一支苏伊士运河区域的维和部队，这一行动后来帮助皮尔逊赢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10年后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之时，皮尔逊成了总理，而我父亲则成了加拿大常驻联合国安理会代表。我的父亲是联合国第242号决议的起草者之一，时至今日这份决议仍然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和平相处起着奠基作用。

1973年1月，在皮尔逊的葬礼上，我的父亲是其中一位抬棺人。他亲手把皮尔逊送到了他位于魁北克省韦克菲尔德的长眠之地。就在我踏入政界前不久，我还曾来此拜谒，以致敬意。皮尔逊被安葬在两位生前好友身旁，他们在世时也都是虔诚的人民公仆——诺曼·罗伯逊（Norman Robertson）与休姆·郎（Hume Wrong）。皮尔逊、罗伯逊和郎所代表的是一个加拿大政府和公共服务史上的黄金时代。他们穿着朴素，以令人敬畏的智慧行事，以严谨的工作准则要求属下。他们有着广阔的国际视野，诚实守信，在财政上作风保守，在政治上开明自由，以一种悄无声息又富有加拿大特色的方式践行着爱国主义。他们的那个世界便是我所坚信的世界，是我成长过程中始终想要追求的典范。正如我之前所说，你是为了那些使你成为今天的你的人，才会想要拥有某些东西。在我回国从政之前，我从未想到那个由他们构筑起来的自由世界、那个他们创造的加拿大，早已不复存在。

我父亲所向往成为的正是那种理所应当地认为政府应该成就伟大事业的人。1956年布达佩斯发生反共示威后，父亲便和时任移民部长

的杰克·皮克斯吉尔（Jack Pickersgill）一起，帮助数以千计的匈牙利难民离开难民营，到加拿大来寻找新的生活。那是一个自信的大国才会有的大动作，我的父亲也因为自己帮助那么多人重获自由而感到自豪。这种宽厚的雄心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加拿大政治中十分常见。当时，欧洲和北美的自由主义政府正着手重建社会秩序，为此后30年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在美国，艾森豪威尔启动了州际公路系统建设和国家太空计划，而加州的民主党州政府正在建立日后将成为全球高等教育楷模的加州公立大学体系。在加拿大，自由党领导的政府建成了国家公路系统和圣劳伦斯航道（St. Lawrence Seaway），并已募集到资金准备建设崭新的大学校园和国家科研机构，比如当时建立起来的乔克里弗核设施，让加拿大成为全球医用同位素生产行业的领军者。当时决策者的理念是，只有一个富有远见的政府才能将整个国家紧密地团结起来。后来，等我的年纪长到可以参与家庭餐桌谈话时，我迫不及待地和大家分享了我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幻想——只有一个在如我父亲这样的人的管理下的好政府，才是解决国家面临的任何问题的根本出路。

我的父亲热爱政府的公职，但他始终坚持与党争划清界限，从他讲述的那些故事里，几乎看不出他作为政治家和公务员之间有什么区别。他曾告诉我这样一个故事。1944年，总理麦肯齐·金（Mackenzie King）和妇女组织“帝国之女”（Daughters of the Empire）会面时，他曾在一旁做会议记录，该组织担心色情作品，比如蓓蒂·葛莱宝（Betty Grable）的海报和其他更过火的东西，会削弱当时正从荷兰一路攻向德国的加拿大军队的士气。当时，金的办公室里坐着十几位女士，她们轮番阐述着此类色情作品的不良影响。金耐心地听完每个人的发言后，起身走到她们面前，肃穆地与她们一一握手，并称自己很少有机会能参与如此重要的会面。这些女士离开后，总理办公室即刻安静下来，父亲清了清喉咙，问金先生他希望针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行动。“回去工作，”总理一边气冲冲地说，一边挥手示意父亲离开办公

室。金高超的掩饰本领让父亲当时惊叹不已。这似乎也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但父亲坚持与之划清界限。

当我终于在2009年出任反对党领袖时，才发现我那间在议会大厦三楼转角处用实木墙板装饰的办公室，原来曾在“二战”时为金总理所用。每当我坐在办公室的那张椅子上，脑海中便会浮现出65年前我的父亲坐在这间办公室的角落里，弓着身子用膝盖上的记事簿做会议记录的场景。隔壁那间用镶板装饰的长条形办公室则是金总理的战时内阁开会的地方，那间屋子的门上刻有两句话：“敬畏上帝”（Fear God）与“荣耀我王”（Honour the King）。每每走进那间屋子，我便会感到那段历史似乎在告诫当下的自己振奋精神，直面挑战。

18岁时，我曾赢得过一次安大略省即兴公共演说比赛的冠军，当时多伦多一家叫作《环球邮报》的报社采访了我，还给抱着奖杯的我拍了张照片。当时，当被问及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什么时，我脱口而出：“我想做总理。”

回溯过往，我似乎还是那个60年代的孩子，或许还是个孤儿，被今日看来已是遥远回忆的那段政治往事影响着的一个孩子。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1月那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宣誓就职的时候，我只有14岁。我记得，当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在肯尼迪的就职典礼上磕磕巴巴地朗诵着他的诗作时，一旁年轻的总统特意向前站了一步，用身体为垂暮的诗人挡住了诗稿上刺眼的阳光。我和学校里的同学们也曾乐于模仿肯尼迪的波士顿口音，还学过他那左手插在夹克衫口袋只露出大拇指的经典动作。到上加拿大学院（Upper Canada College）求学后，有一天，一个朋友从背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凑到在我耳边小声说：“我刚从收音机里听到，肯尼迪总统被人枪杀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一刻自己站在楼梯井里的什么位置。

这位倒下的总统曾经塑造了我们这代人的政治理想。这份使我感同身受的政治热情在我朋友们的身上同样存在。李博是我在多伦多大

学的同窗好友中最为聪明的一个。他的父亲索尔与我的父亲在30年前也在同一所学校求学，互为学业上的对手和生活中的好友。我最初遇到李博时，发现我俩除了以上背景之外，还有更多的相同之处。我当时注意到，他每次站在舞台一侧等待上台发言的时候，都会把左手放在口袋里，只露出大拇指。

我们入学多伦多大学的时候，正值全美大学校园兴起一阵反对“越战”示威宣讲热潮，这股热潮正在北上向加拿大校园蔓延。当时，与杰夫·罗斯（Jeff Rose）和李博一样，我也加入了反对“越战”的政治活动。除了帮忙组织了一场有关“越战”的辩论会外，我们还参加了反对为战争制造凝固汽油弹的陶氏化学公司的校园招聘的静坐抗议。此外，我也为自由党在1965年秋季的选战出了力，挨家挨户地为寻求连任的出色议员马尔文·盖尔伯（Marvin Gelber）拉票。他的竞争对手戴维·刘易斯（David Lewis）是加拿大新民主党（Canadian New Democratic Party）的领袖，比起自由党，他们是立场更为左倾的社会民主党人。那是我参与的第一次选战，我很享受在竞选办公室、区域活动室和拉票团队中的工作氛围。我们全心全意地投入了这场选战，但我们的候选人还是输了，我的首次自由党选举经历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1968年初，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在圣劳伦斯大厅（St.Lawrence Hall）见证了当时还是皮尔逊内阁司法部长的皮埃尔·特鲁多宣布竞选自由党领袖（此前不久，皮尔逊先生刚刚宣布从这一职务上卸任）。我从未像当时那样，觉得自己被一位政治领袖的非凡魅力所笼罩。特鲁多是一位法学教授，一位前不久才将家乡从天主教会的流毒和莫里斯·迪普莱西（Maurice Duplessis）反动政府打压工会的恶行中解放出来的知识分子。当时，特鲁多难以捉摸的魅力让我深深着迷，但最让我着迷的还是他为人的真实，以及为了在纷扰的宣传和政治活动中保持真我而展现出来的那份努力。然而，如今看来，他刚上任时的表现常常是业余甚至做作的。他挣扎着一边企图控制那些被

他亲手解除了束缚的势力，一边又想保留内心那个好自省的本我。40年后的今天，我才发现当时正憧憬进入权力巅峰的我受到了特鲁多决定性的影响。直到快50岁时，他才从大学的教室里一脚踏入政界。既然他能行，我为什么不行？我这样想着，虽然我绝不可能是特鲁多的翻版。

特鲁多如此让我着迷的原因还在于，他可以一边坚决反对安抚魁北克地区的民族主义情绪，一边又一腔热诚地向魁北克人民承诺把他们带到国家公共生活的舞台中心。正因他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为了谁而从政，他才能成为这么一位鼓舞人心的政治人物。我们当时都很确定，他是为了我们这代人在奋斗。

1968年4月，自由党全国代表大会（National Liberal Convention）在渥太华会议中心召开。第四轮投票结果出炉的前一刻，我仍在说服那些立场摇摆不定的与会代表选择支持特鲁多。我亲眼看着刚刚当选加拿大自由党领袖并可能会借此成为下一任加拿大总理的特鲁多从座位上站起身来，向投票支持他的欢呼雀跃的人群挥手致意。

为了早日就任，他几乎立刻便宣布参选总理。我作为一名全国青年组织者，也随即坐上了他的专机和他一起四处奔波，直到他1968年6月首次赢得大选。他是那种领袖人物：在机舱里四处走动，坐在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身旁，询问我手上正读着什么书。我仍然记得，我当时在读的是一本维也纳建筑家维克多·格伦（Victor Gruen）所写的关于城市规划的书。(注)当飞机翱翔在北美大草原上空时，特鲁多就坐在我身边，听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地叙述着这本书的大意，同时用冷峻的眼神打量着我。飞机一降落，他便坐进了车队里领头的那辆轿车直奔目的地，而我则钻进了队尾的行李车紧随其后。除了充当人墙，阻止人群过于靠近，我在那些活动上就没什么其他的工作了。我之前从没见过可以与当时达到顶点的特鲁多热（Trudeaumania）相提并论的疯狂场面。在他和民众互动的时候，人们会紧紧攥住他的手，年轻的姑

娘们则会尖叫，甚至试图亲吻他。这种狂热的情绪可以迅速蔓延到整个群体，这让在一边旁观的我兴奋不已。

同时，1968年的夏天，尤金·麦卡锡（Eugene McCarthy）和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领导的反约翰逊总统和反“越战”的运动也出现了一幕戏剧化的高潮。1968年2月，麦卡锡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得票数量直逼约翰逊。多亏了众多支持麦卡锡的青年人，他最终成功迫使约翰逊退出了总统选举。当时即将迈入21岁的我第一次发现，我们这样的年轻人竟然也能在政治上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由此感到无比兴奋。

然而，兴奋和对年轻人力量的初步体察并不是我们当时心中唯一的情绪。绝望和恐惧同时在我们心中逐渐发酵。1968年4月4日，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孟菲斯遇刺身亡。前一晚，他做了此生最后一次布道，并且用他那使人焦虑不已的预知力，告诫人们自己或许会像摩西一样，无法和追随他的人们一道亲眼目睹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的出现。金遇刺当晚，正在积极备选的罗伯特·肯尼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停下了脚步，随即将这一消息通报给了当地的黑人群体。在一片暮色中，他努力抚慰着那些沉浸在痛苦与愤怒中的人们。他用自己轻柔的波士顿口音安抚着大家，告诉他们自己也失去了一个好兄弟，同时告诉刺杀者，大家应一同为他哀悼，并像诗人埃斯库罗斯所教导的那样，学会“忍受上帝那令人生畏的恩典”[注]。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这些有关政治应该如此的超凡范例对我的启发有多么深远。两个月后的1968年6月4日，当我乘坐特鲁多的专机在安大略省萨得伯里（Sudberry）附近上空盘旋时，机长通过机上广播告知了我们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一家酒店的房内厨房中遇刺的消息。当晚，肯尼迪刚在民主党加州初选中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那一刻对我内心的冲击，时至今日我仍难以忘怀。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突然震惊地发现，原来我们亲身践行着的政治生活，除了可以给我们带来兴奋外，也可以带来暴力和不可估量的损失。

肯尼迪遇刺三周后，圣让巴普蒂斯特日（St. Jean Baptiste Day）[注]如期而至，皮埃尔·特鲁多也出现在了蒙特利尔市中心大游行的观礼台上，当时距离大选仅剩下最后几天的时间。作为那个年代崇尚联邦主义政治家中最重要的一位，特鲁多在家乡魁北克可谓是所有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发泄怒气的目标。游行现场，从讥笑着的分离主义示威者手上扔来的瓶子和啤酒罐如雨点一般砸在他的周围，让一旁的安保人员不得不尽力将他拉回安全的区域，而特鲁多当晚表现出的勇气则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相机捕捉到的那个场景。当他一把推开安保人员阻止他继续向前的双手，独自站到愤怒的人群面前时，他那不加掩饰、毫不妥协的政治意志表露无遗。

一周后，他在选举中获胜，他的办公室随后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哈林顿湖居（Harrington Lake）做客。那是位于渥太华郊外加蒂诺丘陵（Gatineau Hills）、专供加拿大总理居住的乡村居所。珍妮弗·雷（Jennifer Rae），一位在特鲁多辅选团队中任职的相貌出众、美丽动人的幕僚，那段时间一直陪伴在特鲁多左右。她是我大学同学李博的姐姐，或许请我来此作陪正是她的主意。刚当选总理职务不久的特鲁多和珍妮弗看上去好像都不太适应这座坐拥湖景，却布局杂乱、风格老旧的乡村居所。那段时间，我们三人会跳进水里从船坞处向远方游去，也会讨论各类书籍和各种与政治无关的话题。我现在还能记起，当时我感到疑惑，是否是特鲁多对这个此生中获得的最大胜利有些无所适从才会有这样的表现？就好像他突然意识到，进入政坛仅仅三年就一跃成为一国的政府首脑似乎是一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一样。当时的他不爱说话，有些孤傲，正试着唤起内在的决心来面对前路的挑战。我好似瞥见了一眼荣耀背后的代价，一种即便是最无畏的人也会感到束手无策的恐慌感。

那是我在他执政期间最后一次见到他。我的父亲后来继续在他的手下出任大使，特鲁多偶尔也会向父亲咨询在外交事务上的建议。1978年，当特鲁多正在寻觅一名新的总督（governor general）——加

拿大元首和女王在加拿大的代表人选时，他曾表示，我父亲是他心中的头号候选人。我的父母为接任这一职务做了好几个月的准备，除了在女王访问加拿大期间伴其左右，还积极学习王室规章和礼仪。我母亲的姨父，同时也是我父亲踏入职场后的第一位上司，文森特·马西曾出任总督。我父亲一旦上任，则会成为史上第一位来自移民家庭的加拿大总督。这一任命决定后来不知怎么被媒体得知，这倒也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为了讨好西部的选民，特鲁多却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最终任命曼尼托巴省前省长为新一任总督。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特鲁多也不例外，他最终还是输了1979年的大选。另一方面，我的父亲也因此几近崩溃，我弟弟记忆里唯一一次听见父亲哭泣就是在那个时候。

之后看着父亲逐渐恢复的那几年，或许是我平生接受的最早一次弹性教育。他重新站了起来，整理自己受挫的理想，然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高尚的十年岁月——出任多伦多大学名誉校长的同时，照料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母亲。父亲曾有一次对我说，失败是发生在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

很久以后，当特鲁多远离政治后，我曾在伦敦见过他一面，到了90年代初，我们甚至有一次共同出现在镜头前，有些不自然地讨论着他新写的关于安提戈涅和政治冲突悲剧的文集。[注]我们在交谈间并没有提起我的父亲，他那时已经去世了。

回顾我在特鲁多手下工作的那段经历，他本人对我的影响已经强烈到我觉得必须把自己从他的引力场里拉出来才行。那年夏末，我离开了渥太华，到哈佛攻读研究生。当时我一无所长，也没有准备好继续留在渥太华给哪位部长做幕僚。但无论如何，那段能被邀请到哈林顿湖居做客的日子已经结束了，层层叠叠的官僚体系已将我和我尊敬的领袖隔绝开来。当时的我才21岁，离开渥太华去充实自己的头脑恰

逢其时。我花了整整37年的时间才又一次回到政坛，我希望这次我准备好了。

我的父母、特鲁多和皮尔逊的故事，还有美国的肯尼迪、麦卡锡和金——那些悲伤又发人深省的回响——共同塑造了我的理想，驱使我投身政治。但我们应该清楚的是，遗传和家史都不代表宿命。我的弟弟安德鲁比我小三岁，他同样也是这部家史的继承者，和我度过了完全相同的60年代，但他却完全没有参选公职的想法。相反，他觉得我是疯了才会这样置家族的良好名誉于不顾。正如家族的神话当初选择了我一样，我似乎也注定要承担起延续家族神话的重任。所以，当那三位陌生人来邀请我回国从政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好像已经等了他们一辈子。

他们当时描绘的家乡的政治图景无疑令人忧心。由保罗·马丁执掌的自由党政府不久前刚以微弱的优势在2004年的选举中与败选擦肩而过，已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权者之间的内讧和发生在魁北克的财政丑闻更是让党的名誉大为受损。马丁是一个正派、有原则的人，他奋斗了整整20年才成功登顶出任总理，可是不论对错，现在他却表现出了一副茫然不知的模样。他曾是一名强硬又极富远见的财长，可是，后来成了总理的他却被人讽刺为“犹豫先生”（Mr. Dithers）。和英国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样，保罗早早便谋划好了登顶之路，但这好不容易坐上的总理宝座看来也快坐到头了。自由党已全然失去招募英才的能力，在西部或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支持者极少，甚至为零。马丁的前任让·克雷蒂安执政的11年后，自由党已经黔驴技穷。他们邀请我登上的，正是这艘朝着礁石撞去的巨轮。

我这几位政治上的新朋友觉得是时候给这艘巨轮换一名新船长了。我在他们口中被描绘成了一副十分招人喜欢的形象：一名具有国际声誉的加拿大公民，不但有着可追溯到皮尔逊和特鲁多时期的政治经历，而且能言善辩，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作为一名局外人，我

和正将自由党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内部斗争没什么瓜葛，也和正把党拖入泥沼的魁北克财政丑闻没有任何关联。我该好好考虑他们的提议吗?

鉴于当时的情形，我本应问他们一些更为尖锐的问题，比如我们该如何赢得下次选举？我又该如何带领一个在过去十年得票数不断下跌的政党走向复兴？我当时一定是在心中假设这是个“天然的执政党”，必定会有人来回答这些问题，而且我们仍然是整个民主世界中最成功的执政党，所以才没把这些问题问出口。但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自由党的执政地位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

当掂量手中的各种选择，我就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在美国的政坛有所作为。我不是美国公民，也无法说服自己去申请一张美国绿卡。当时，我的同事兼好友萨曼莎·鲍尔（Samantha Power）即将离开肯尼迪学院，准备为伊利诺伊州（Illinois）出身的新晋年轻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效力。我知道如果我继续留在美国，永远只能站在场外围观。我要是有意参赛，就必须回国。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共和党人——近期刚经历改革的、由斯蒂芬·哈珀（Stephen Harper）领导的加拿大保守党——很显然，哈珀的从政颠覆了所有我一向坚守的政治理念：强化作为国家脊梁的共同公民身份（common citizenship）的国家计划，所有加拿大公民的平权，以及以独立自主与国际主义为两翼的平衡外交战略。在他人的国家，我或许永远只能做个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察家，但在我自己的故乡，我却有机会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的政治活动家。这道选择题的答案似乎已经昭然若揭。

我继续质问自己，我该如何克服自己显而易见的劣势？多年以来，我早已习惯在加拿大和美国间来回穿梭，写作、教书、拍电影、做讲座，但是，我既缺席了80年代宪法之争，也没有参与1995年那场令人窒息的魁北克独立公投。要知道，倘若你没能在国家深陷泥沼时伴它生死与共，就别想在日后谋求一官半职。我担心自己会因当初的

缺席而在选举中被大家指责。可是，我所有关于政治的信念仍然全部来源于加拿大。我一直视我的祖国为人类社会中彬彬有礼、宽容大度、积极参与国际交往的典范。我当时一定是觉得，心里这份对家乡纯粹的浪漫主义情怀应该能弥补自己常年旅居国外的遗憾。

我还曾考虑再三，如果回国参政，我该怎么向人民讲述我的故事。讲故事是每个政治人物不得不做的功课。对于每个参选公职的候选人而言，设计、控制并使大众接受你的故事就是他们最核心的任务。对我而言，我必须把自己明显的弱势——旅居国外多年——转化为优势才行。要这么做就只有一种可能：给我的故事贴上“返乡”的标签。这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故事之一：浪子回头。《圣经》里，那些迷途知返的人不是都会得到众人的宽恕和拥抱吗?

落笔至此，我想读者们完全有理由对我在寻找从政动机的过程中表现出的自吹自擂、妄自尊大感到厌烦。对此，我所能辩解的是，适当的自吹自擂对一个政治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你包装自己是为了让公众更加了解你，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一回事，还有谁会这样做呢?

起码于我自己而言，“返乡”的想法是真情实意的。无论我身在何处，对我来说，家永远都是乔治亚湾（Georgian Bay）沉船岛（Wreck Island）上海伦姑母的小屋，迪马叔叔和弗洛伦斯婶婶在魁北克的农场（现在为基南一家所有），以及我们家在多伦多的那栋有三个卧室的房子，还有最重要的，魁北克上墨尔本那片墓地，我亲爱的家人都长眠于此：我的祖父保罗伯爵、祖母纳塔莉伯爵夫人、父亲、母亲，还有我所有的叔叔和阿姨。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会来这里常伴他们。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早在“黑衣人”劝我回国参政之前，我便开始花更多时间在加拿大工作和生活。我开始在班夫教书，因此我的孩子们一到夏天便能在落基山脉间骑马、漂流，我还开车带着巧兰游历全国，让她得以近距离感受大草原天高地远的壮阔。此外，我还

在加拿大广播公司担任梅西讲座（Massey Lectures）的主讲人。在我当时所做的一系列题为“权利革命”（The Rights Revolution）的讲座里，我试图这样定义加拿大政治的独特性：我们的法律既不允许死刑，也不允许公民持有武器；我们坚信保护法语和用原住民语言给土地命名是人民的集体权利；我们坚信女性普遍享有做任何选择的权利；我们在全国进行的双语实验，这个决定时刻面临各方压力，作为一种真实的生存状况，要求我们去尝试理解他人、求同存异。注美国人可以经得起红蓝分色的党派纷争，但我们不行。我窃以为，妥协的艺术已被深深嵌入了我们的政治生活之中。

我一生都在做一个快乐的国际公民，但我也知道，旅居国外的代价正不断增长。当你旅居异国他乡的时候，你最后一定会砰的一声撞在一扇玻璃门上，而那扇门后则是一块只为本国人保留的地方。你会发现你虽然能够理解当地人口中的话语，却从未真正懂得其中的内涵。虽然我所到之处，人们都会热烈地表示欢迎，但我仍然觉得自己不属于任何地方。另外，侨居国外实际上也是搭别国政治便车的一种形式，正如国际化的生活方式只是那些拥有别国护照者的特权一样。我手上的这本护照来自加拿大，现在是时候回家了。

从2004年10月到2005年12月，我花了一年多的时间策划回国。这段时间里，“黑衣人”当初承诺组建的辅选团队逐渐有了雏形。与其说是我挑中了这些精兵良将，不如说是我被他们选中了。我有一次飞回多伦多，发现自己处于这些专业政治精英的考察中，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想知道我是否有两条能够站得稳的“腿”。在决定加盟辅选团队之前，几位年轻的法学院学生——比如萨钦·阿加沃尔和米尔顿·陈——就我在同性婚姻问题（我持支持立场）上的立场向我发问。那一年里，我还在午餐桌上结交了参议员戴维·史密斯和前省长戴维·彼得森（David Peterson）等党内大佬，以及为自由党筹款的埃尔维奥·德尔赞托等人。此外，我的邮箱里开始不断涌入由如亚历克斯·马泽（Alex Mazer）、苏吉·乔杜里（Sujit Choudhry）和迈克尔·帕尔（Michael

Pal）等年轻的政策幕僚编制的一本本厚重的医疗、能源、就业等领域的政策简报。在我如饥似渴地读着这些政策简报的同时，只要想到自己或许能就这些年轻的研究员摆在我面前的种种问题有所作为，便会感到十分振奋：对一个崇尚平等主义的国家而言令人发指的收入分配不公，持续疲软的制造业，对一个全球重要能源生产国而言缺失的国家能源战略，选民和政治体制之间日益严峻的疏离，存在已久的法语人口与英语人口的团结问题，以及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不断加大的城乡差异。我认真研究了上述议题后意识到，我必须更为深入地认识这些问题的实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政治上的知识储备和一般意义上的知识储备之间的不同之处：用心而非头脑去接纳一个议题，还要知道哪项事业最适合用作你在战场上的口号。

2005年3月，自由党在渥太华召开了两年一次的政策大会，而我的竞选团队则成功地说服了党主席麦克·埃泽格（Mike Eizenga）邀请我在数千名党代表面前做一场主题发言。我还从没在这么多人面前说过话。我用这番话开始了我的演讲："在我所工作的美国，民主党仍是在野党；但在加拿大，民主党是执政党。在那里，做一名自由党人是个沉重的负担，在这里，做一名自由党人则象征着一枚荣誉的勋章。"

话音刚落，在座的党代表便伸出双手为我鼓掌。被他们的回应所感动，我便向各位代表坦言自由主义对我的意义。我告诉他们说，我母亲与他人分享的每一块蛋糕，都满载着慷慨与宽容。自由主义应当永远与宽容紧密联结：宽容的心、宽容的精神、宽广的想象力和视野。我最后说道：

> 宽容不仅仅是张开双臂对陌生人表示欢迎，更代表着我们对待自己的态度。它意味着互相信任，不计成本地互相帮助，共同承担风险。宽容让我们的心彼此敞亮，共同畅想更加美好的未来。长久以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一直如此，而这个党的任务便是让我们的祖国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行。宽容、团结、主权、公正，以及选

择的勇气、执政的意志——这才是指引自由政治前行的灯塔所在。注

演讲一结束，欢呼着的代表们便将我簇拥起来，大家争相与我握手，手机闪光灯在我眼前闪个不停，一旁的媒体则焦急地等着要采访我。我的老朋友格雷厄姆·弗雷泽（Graham Fraser）也和大家一起簇拥在我身边，并在我耳边轻声说了句：“精彩的发言。”我想，那一刻他或许已经意识到我是下定决心要迈出这一步了，所以他当时的脸上写满了同情，那种表情只有在你的老友意识到没办法阻止你趟某处浑水时才会表现出来。

翌日，总理保罗·马丁要求见我。我在他的办公室坐了整整一个小时，当时担任他助理的吉姆·宾布利特——后来又成了我的助理——坐在一旁，自始至终用他那猢猴一般锐利的眼睛目不斜视地盯着我，片刻没有离开。总理先生则试探着我对加美关系的看法，想试着从我的反应里摸清我的底细。他是个仁慈的人，但他不可能为我这次成功的演讲和此后受到的热情回应感到欢欣雀跃。我明显是他的对手。此次会面后，他派手下来告诉我，他将不会在我参选议员的道路上提供任何帮助。看来，我只有靠自己的拼搏才能在党内站稳脚跟。

同总理和马克·拉隆德相继会面后，我知道，回国参选这件事已是板上钉钉了。马克曾是皮埃尔·特鲁多身边最亲近的幕僚之一，听闻我当时的进展，他向我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我决定在圣诞节前后离开哈佛，接受多伦多大学的工作邀请，然后逐步踏入加拿大政坛。

在决心回国从政后，我和巧兰有一次在多伦多中国城同我的大学室友李博、他的妻子阿琳（Arlene），以及他们的一位千金共进晚餐。李博毕业后便一直在政界工作，起初以新民主党籍的身份出任国会议员，后来在1990年至1995年间出任安大略省第一位新民主党籍的省长。虽然他在1995年的选举中大败于对手，但他很快便调整好了自

己，开始在多伦多做一名律师，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可是，当我告诉他我准备参政的时候，他却面朝着我大发雷霆。看来我还没为自己赢得从政的权利。为了重回政坛，他已准备了这么多年，而我以为自己是谁？我有些退缩了。回过头来细想，既然我和他分属两党，他又凭什么认为我没资格以自由党人的身份参选议员？我没把这些想法告诉他，现在想想，我当时应该更加坦诚地和他交流才是。事后看来，他当时怒火冲天的反应代表着一个极其关键的转折。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这位老友的政治志向还未结束，他想转而加入自由党。我们互相之间都出现了误判，而且，我们都错误地以为我们多年的友情能化解我们敌对的身份。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戈登·布朗和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在伦敦一家饭店碰面后，决定由布莱尔而非布朗出选工党领袖。如果我和李博当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协定，我们后来的仕途或许会与现在的截然不同，可是谁又能保证我们其中一人会真的向对方妥协呢？坦率地说，我认为只要两个人的志向之间存在竞争关系，即便双方是好朋友，双方之间也无法调和。

木已成舟，我的归心已决。虽然我和巧兰仍会时不时带着渴望的眼神回望远去的平静生活，但来自未知前方的暗流已悄悄袭来。那年夏末的一天，巧兰转过头来笑着对我说：“我们有什么输不起的？”

我们都不知道。

---

1. 质询时段（Question Periods），指加拿大国会众议院每日例行的45分钟质询时间。期间，由众议院反对党议员就政府相关政策向总理、内阁成员与众议院各委员会主席提出质疑。——译者注

2.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Russian Album（London：Vintage，1987）。

3. 加拿大别墅，加拿大驻英国高级事物委员会（High Commission of Canada in the United Kingdom）所在地。——译者注

4. 白厅，位于伦敦威斯敏斯特的一条街，两旁及其附近有国防部、外交部、内政部等英国主要政府机关。——译者注

5. George Ignatieff，The Making of a Peacemonger（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85），p. 73.

6. George Monro Grant，Ocean to Ocean（Toronto，1873）；同时参见Michael Ignatieff，True Patriot Love（Toronto：Penguin，2009）。

7. 红河推车，一种由牛、马或驴驱使的木制双轮推车，常见于19世纪加拿大红河流域地区。——译者注

8. W.L. Grant，Principal Grant（Toronto，1903）.

9.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是纳粹在德国图林根州魏玛附近所建的集中营，也是德国最大的劳动集中营。——译者注

10. George H. Ford，ed.，The Pickersgill Letters，1934-1943（Toronto：Ryerson Press，1948）；Jonathan Vance，Unlikely Soldiers：How Two Canadians Fought the Secret War Against Nazi Occupation（Toronto：Harper Collins，2008）.

11. “迈克”（Mike）的昵称是皮尔逊在“一战”时服役于英国陆军航空队时得到的。此后，皮尔逊一般只在签署文件和正式场合使用“莱斯特”的名字，他的家人和朋友都称呼他“迈克”。——译者注

12. Victor Gruen，The Heart of Our Cities：The Urban Crisis：Diagnosis and Cure（London：Thames and Hudson，1965）.

13. http://www.youtube.com/watch？v=_E3-_z5YPoM.

14. 也称魁北克日，每年6月24日举行，为魁北克省庆日。——译者注

15. Pierre Trudeau，Memoirs（Toronto：McClelland and Stewart，1993）. 参见该书第369页上的叙述。

16.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Rights Revolution：The Massey Lectures（Toronto：Anansi，1999）。

17. 参见我在加拿大自由党双年政策会议上的发言《21世纪的自由价值》（“Liberal Values in the 21st Century”），2005年3月3日。

第三章 命运女神

我一度天真地以为自己重返加拿大政坛的过程，会像散步回家一样轻松，先在加拿大的大学里教书，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契机踏入政坛。可是突然，一个个预料之外的事件相继发生。2005年11月末，众议院通过不信任投票迫使保罗·马丁领导的自由党政府下台，总理随后宣布下次大选将于2006年1月23日举行。如果我要重返政坛，就必须要把握住这个时机。

我在教政治学的时候，常喜欢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搬上讲台。学生们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愤世嫉俗是那么令人震撼，置于当下的政治中又是那么应景。与此同时，他们也时常对马基雅维利为何会写下有关命运女神那一章文字感到不解。该书的第25章写于1513年，当时马基雅维利刚被驱逐出佛罗伦萨政治圈，饱受折磨的他狼狈地回到了自己旧时生活的庄园，过去苦痛的经历促使他写下了这一章，并在其中告诫人们，主宰着政治的正是命运女神。他心怀不满地写道，命运是个变幻无常的女人，她必须被驯服、被追求、被打败。马基雅维利的用语在现代人听来非常粗俗无礼："迅猛胜于小心谨慎，因为命运之神是一个女子，你想要压倒她，就必须打她，冲击她。人们可以看到，她宁愿让那样行动的人们去征服她，胜过那些冷冰冰地进行工作的人们。因此，正如女子一样，命运常常是青年人的朋友，因为他们在小心谨慎方面较差，但是比较凶猛，而且能够更加大胆地制服她。"注

一旦把马基雅维利的各种比喻放到一边，便能发现他的洞见有着持久的生命力。政治始终都在一名变幻无常的女神眼皮底下运行。现

实政治并非一门科学，它更像是狡猾的人类为了适应命运女神在他们前行道路上设置的种种阻碍所做的无止境的尝试。然而，这种尝试所需的基本技能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正如颜料是画家创作的媒介，政治家工作的媒介则是时机：他必须不断地去适应政治生涯中各种突发的、预料之外的，甚至是残酷的变数。对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自己或许会对某些理念或政策有兴趣，但对政治家而言，他们感兴趣的就只有一件事，即适合某个理念的时机是否已经到来。当我们将政治称作是一种可能性的艺术时，指的是此时此刻何为可能的艺术。这里说的可能性还包括潜力。同样一个房间，在一位平庸的政治家眼中就只是一个封闭的屋子而已，而一位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则能看见房间后面藏着的那扇通往新机遇的大门。实际上，我们在政治里所说的幸运，就是天赐良机：出手打击的时机，韬光养晦的时机和静候机遇的时机。当政治家开始抱怨自己的仕途充满不幸时，其实他们不满的是时机。只有愚者才会相信自己有本事掌控时机。在你真正可以控制什么的问题上保持谦卑，这才是在政治生涯中应当秉持的谨慎态度。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出任英国首相，当他被问及自己的首相生涯里最艰难的部分是什么时，据说这位长者是这样回答的："事件，亲爱的孩子，各种各样的事件。"[注]一位明智的政治家会懂得如何将各种事件巧妙地转化为自身的优势。尽管政治家们总是被指责为投机分子，但学会做个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正是政治艺术的要义。一个在政治里缺乏技巧的机会主义者，总能让人明显地看出来他是在利用某个机遇，而一位经验老到的机会主义者则会说服公众，是他自己创造了这个机遇。

我进入政界的时机由不得自己选择，但我和很多人想的一样，认为自己应该可以将眼下的情形化为自身的优势。虽然我在课堂上教过马基雅维利，但我并未真正理解他。我曾以为自己可以掌控时机，到头来才发现自己早被时机所掌控。

我和我的多伦多团队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向一位资深的议员简·奥古斯丁（Jean Augustine）献殷勤，希望已经快在这一职务上服务了三十年的她能够提出辞职，好让我有机会得到提名以接替她的议席。11月末，她宣布不再寻求连任，并对我接替她的议席表示支持。我在肯尼迪学院的维纳礼堂（Wiener Auditorium）上完了最后一节课，与学生合影之后便与巧兰共同登上了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我们本以为，即将参加的只是一场常规的提名我为位于多伦多西郊的怡陶碧谷湖滨选区——一个大约生活着2.5万居民的地区——的自由党籍候选人的仪式。

我政治生涯的第一幕是在一所有着瓦格纳式名字的机场酒店拉开的。那个机场酒店叫作瓦尔哈拉旅馆（Valhalla Inn），坐落在多伦多市中心通往皮尔逊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旁，酒店里还有一个70年代风格的宴会厅。后来，为了在这块地方建造新的公寓楼，酒店便被拆除了。如今每当我路过此地，都会忍不住怀疑那个酒店是不是真实存在过。

2005年12月的那个夜晚，当我所乘坐的机场客车在瓦尔哈拉旅馆门前停下时，只见酒店的停车场、入口与大堂挤满了数百名示威者，他们一边高喊着“可耻！可耻！可耻！”的口号，一边举着写有“姓伊的回家”的标牌。我心想，我现在就在家。一些示威者脸上戴着乔治·布什（George Bush）的面具，谴责我支持他侵略伊拉克的决定。还有一群人则穿着关塔那摩监狱鲜亮的橙色连体囚服，批评我为虐囚辩护，他们显然是曲解了我在《次级罪恶》（*The Lesser Evil*）一书中的论述。[注]呼喊声最响的是一群乌克兰裔加拿大人，他们基于我父亲一系的背景指责我是个俄国沙文主义者，客气地说，他们也错误地理解了我13年前在《血缘与归属》（*Blood and Belonging*）中的一段叙述。在那本书里，我揶揄地对乌克兰独立发表了一番评论，称它的独立让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幅混杂的景象，“绣花的农民汗衫、民族乐器的鼻音哀嚎、穿着披风和靴子的假哥萨克人和凶神恶煞的反犹分子”[注]。他

们好像没人发现这段话里的反讽，也没人读过我后来那篇明确支持乌克兰主权独立的文章。[注]对那些围在我车外的人群而言，这些我在1993年发表的言论仅仅只是他们如此行为的借口。有一群乌克兰裔民众本想推出一个自己人参选怡陶碧谷湖滨选区的议员，并且已经获得了一位在任的自由党籍议员的支持，所以才会在得知我和简·奥古斯丁间所谓的“交易”后大为恼火。因此，他们翻出了我数年前的文章，把上述这些罪名强加在我的身上，想在最后关头阻挠我获得提名。

政治的这个侧面——有意曲解你在多年前的言论——对我而言仍然很陌生。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为我笔下的文字负责，但我究竟写了什么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你的对手如何将你的“档案”变为他们的优势。所谓的“对手研究”（oppo research）就是指搜集可以在断章取义的理解后给某人定罪的视频片段、照片和言论的调查，这已然成为现代政治攻击中不可或缺的一支武器，而且，这种专门致力于“对手研究”的武器在网络上有着极为辽阔的作战半径。在如今这个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盛行的年代，你要么完全不发表、不从事任何可能在未来被用于攻击你的言论或行为，要么任由这些言论或行为的碎片散落在各个角落，你必须在这两者间做出选择。我坚定地支持后者。你不能因为对手纯粹恶意的攻击就绑架了你自己的生活。如果你选择不再将现在心里所想的说出来，那一旦迎来发表言论的契机的时候，你就会忘了自己的初心。

当我们透过车窗对示威人群做了一番调查后，我竟然产生了一种滑稽的想要为自己辩解的欲望。我想告诉那些戴着布什面具的年轻人们：“只有当你亲眼见到我在1992年的伊拉克北部看到的那番场面，看到萨达姆是如何对库尔德人（the Kurds）使用毒气的时候，你才会明白我为什么认为他必须离开。”对于那些穿着关塔那摩监狱囚服的人们，我想说：“如果你真的好好读了《次级罪恶》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和你一样对虐囚深恶痛绝。”[注]你们都误解了我。我本可以出面解释。但我知道，在政治的世界里，解释总是来得太迟。所以你从来不

会解释，也从来不会抱怨。要是你足够幸运，复仇的机会自然会来到。

当示威者正在不透明的车窗外朝我大吼大叫时，我和巧兰坐在车里相视无言。有那么一瞬间，我的脑海中闪过放弃从政回到哈佛的念头，但巧兰的眼神却传递出了一则明确的讯息。这并不完全是我们之前想象的荣归故里的场面，但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冲出去战斗。

我们推开把我们团团围住的示威人群和一旁跑来看我们笑话的摄像机和记者，一路穿过大堂，到达闷热的酒店宴会厅，站到了演讲台上。我的团队也集合了一群支持我的民众在台前为我鼓掌欢呼，但后头那些对我表示不满的人却试图用更高分贝的呐喊来压过我的声音。他们手中挥舞的标语表明了他们的立场。对我的提名既不民主也不公正，我不仅是所有乌克兰人的公敌，还是乔治·布什的辩护者。

我仍记得自己当时愤慨的情绪。那些乌克兰裔的民众怎会指责我蔑视他们的权益？我的曾祖父母就葬在乌克兰。[注]还记得我在访问乌克兰时告诉当地人这件事后，他们便拿出传统的面包和盐作为礼物欢迎我。就连他们都视我为朋友，我的同胞怎么会把我视作敌人？而且，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分裂自己的同胞？我并非俄罗斯籍，他们也不是乌克兰籍。我们同是加拿大公民。我声嘶力竭地喊着，声音盖过了喊着“耻辱！耻辱！耻辱！”的乌克兰裔民众和穿着囚服的示威者，和我们在台下喊着“我喜欢迈克”（I like Mike！）的自己人。

瓦尔哈拉旅馆是我踏入政坛后经历的第一次“肉搏战”。说实话，我倒也觉得很享受。当时面对恶意的指责者，义愤的情绪不禁涌了上来。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一切和好意或恶意无关。在政治的赛场上，任何手段都会出现，最重要的不是展现善意，而是赢得胜利。那天晚上，我就赢了。“黑衣人”替我邀请了自由党全国主席麦克·埃泽格

监督整个提名过程，另外请了数名党内律师到场以确保所有程序合乎规定。随后，集会现场的党员终于通过了我的提名。在示威人群的呼喊声中，我被随行人员从后门悄悄带到了我和我的辅选团队首次会面的现场。

看到现场众多的反对者，想必他们一定和我一样惊讶。在和他们一一握手、相互介绍后，我心想，他们便是我此后唯一可指望的人了。他们都是来自选区的本地居民，一共十余人，包括坐在轮椅上令人敬佩的玛丽恩·马洛尼和她的儿子杰米·马洛尼，从前是房地产律师但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官方代理人的阿尔芒·柯南特，简·奥古斯丁的助理玛丽·凯瑟，还有几位简组织的小团队里的退伍军人。简把她的这支队伍称为“能干大事的小引擎”，起初我还有些怀疑他们的能力，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他们都非常尽职，时至今日我和他们仍维持着朋友的关系。当时他们都无法预知，把自己的命运和我的捆绑在一起会有怎样的后果，但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陪我走到了最后。

现在我已经获得了提名，或许还是整个多伦多地区最富争议的一位候选人。接下来的55天，我的辅选团队——那支集结了城中律师、电脑天才和当地社区居民的队伍——试图把我塑造成一个能干的政治家。这绝非易事。当时我挨家挨户去拉票的场面看上去一定很滑稽，我竟然以为自己应该在每一位选民面前都花上好几分钟的时间与他们来一段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我的团队成员每次都必须用力给我使眼色才能把我拖到下一家门口。

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的我，却好像透过一面镜子，窥见了每一个谋求公职的人内心都存在的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接下来的五年里，我始终活在他人的眼光里。19世纪的一位法国作家埃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曾将国家称为“每日例行的全民公投”，对于任何寻求公职的人而言，这便意味着民主，你每天无时无刻都在评估每一个公民对你的看法，包括街上的行人怎么看你、你走上去和他们握手时

他们会怎样问候你、你经过机舱的走道坐进位置时他们又会如何与你互动。[注]那些从没参加过公职竞选的人或许永远不会理解你对这种每日全民公投式的考量有多么依赖，每当你走入公众视野，人们每个眼神的暗示、鼓励的微笑或厌恶的蹙眉都会在你的脑海里留下清晰的印记。相较于民调，我更依赖于民众直观的反应。据说前纽约市长埃德·科赫（Ed Koch）每天走在纽约街头都会问上路人百余次："我做的怎么样？"[注]我现在明白了，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我做得怎么样？你觉得我做得怎么样？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我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我遇到的每一个人手上。我当时还不知道这种在国人心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工作检查会在多大程度上掌控我的生活，并开始塑造我对自我价值的判断。

在商场、公寓楼、下着雪的怡陶碧谷湖滨郊区街道上拉票的时候，我会留意每一张有意向支持我的面孔，也学会了如何判断任何微小的信号，不管是迟疑不决、逃避，还是赤裸裸的拒绝，我都能感受得到。总体而言，公众对于拉票中的政治人物都会出奇得礼貌，但他们的行为也在向你传递着一些信号。那个摇下车窗收下传单的男人，下一秒便将传单揉成一团丢在一旁继续开车，他在用行为告诉你，就算你等到天荒地老，也不可能赢得他的选票。那位开门后用围裙擦着手然后耐心地听你讲完话的女士，可能只是一位小时工。那位想请你进门聊聊天的长者只是有些孤独。那个在地铁站里摘下耳机，听你说要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便不时点头的姑娘一定会投一票给你，只要她记得在选举当天出门投票的话。我开始认识到我在哪些人群面前势在必得，又在哪些人群面前永远只能吃闭门羹。我们在青年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和少数族裔中广受欢迎，而在选区内那些有着宽阔私人车道的更加富有的地方，保守党比我们更具优势。与此同时，我们还得和比我们左倾的新民主党争夺那些生活在选区南部的工会劳动者和贫苦家庭的支持。我们是一个中间政党，正是因为我们长期坚

持中间立场才得以在几乎整个20世纪间持续执政，但我能感觉得到，我们的支持者正在向另外两个政党流失。

我们接手了一栋位于一个繁忙十字路口的废弃银行大楼，作为我们的竞选总部——我在地下的保险库里有一个无窗的壁橱——这个保险库很快便被大批工作人员占领了。如果你热爱政治，那选举办公室会是个无比美妙的地方。这里总是乱中有序：到处都有喝了一半的咖啡、吃剩的中餐外卖、丢在桌上的披萨，还有我夫人准备的匈牙利热汤，常有陌生人进进出出，也总有记者在到处踱着步等着采访我们，后面的屋子里也总有一些年轻的政策顾问涂写着一张张地图，上头用不同颜色标注着我们和对手的票仓。我们甚至还请了一位教会牧师，罗布·奥立芬特（Rob Oliphant）定期到我们这儿来给我们、尤其是我开一些心灵处方，后来他自己也成了一名出色的议员。整个团队的核心是那些年轻的“数据猿”们，他们无论男女总是面色不佳，长期缺乏睡眠的他们，双眼一直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上各种拉票活动的统计数据，在这场战役正式开打之前，计算我们究竟有多大胜算。

在这个废弃银行大楼的一片嘈杂里，我头一次意识到政党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分裂的时代，人们因阶层、收入、种族、信仰和年龄的不同互相隔绝，不计其数的人只得无依无靠地过活，任凭那昔日热闹的广场大街如今空无一人。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政党让那些原本彼此陌生的人为了维护彼此共同的利益走到了一起，为了相同的事业携手并进。每当我们的拉票员涌入大本营领取一沓新的民调问卷，然后准备再次走上白雪皑皑的大街去挨家挨户地游说时，我都会站到屋子正中间一个摇摇晃晃的椅子上这样鼓舞他们：你们代表的不是我，也不是党，你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最出色的一支力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竞选活动推翻了肤色、种族和阶级的芥蒂，打破了让同胞互相对立的阻碍。在此之前，我从未在一个背景如此多样化的团队中工作过：一位巴基斯坦裔军官哈利法少校（Major Khalifa）带领着一组阿赫迈底亚穆斯林（Ahmadiyya Muslims），负责

在夜间散发传单；一位意大利木匠负责在草坪上捶置标语；数个此前支持简·奥古斯丁的加勒比团体，一开始对是否要支持我犹豫不决，后来也成了我的得力干将；一支由布拉德·戴维斯、米尔顿·陈和萨钦·阿加沃尔带领的学生和青年律师队伍，他们都被我的竞选活动中给青年一代提供了革新党务的机会吸引过来；一名来自选区北部高层住宅梅贝尔、总是穿着优雅长袍的索马里妇女；数位波兰裔的天主教徒，他们成功地调和了自身信仰与我们党支持同性婚姻与堕胎的立场间的矛盾；一众乌克兰裔居民，包括一位当地教堂的牧师——神父特里，他们为了声援我们不惜站到对我抱有敌意的同族人的对立面；还有一众电话拉票员，每天说着十几种不同的语言，通过电话向民众宣传着自由党的执政理念。

有几个人让我印象深刻。被称作“标语男”的史蒂夫·麦加奈德（Steve Meganetty），身材高大，一头银发，说话总是面无表情、拖腔拖调的他一个人贴完了整个选区的竞选标语。他是党内的一位退伍老兵，每天驱车一个半钟头从尼亚加拉（Niagara）的家里来帮我的忙。他说自己受够了党内的派系斗争。2003年，时任总理让·克雷蒂安被保罗·马丁所逼，让出了总理宝座，自此之后，这个曾经厥功至伟的全国性政党开始分崩离析，派系林立。我问史蒂夫为什么他愿意每天来帮我，他简单地答道：“我希望党能变回原来的样子。”

巴杰特·西坎德（Baljit Sikand）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他是位热心肠的锡克族人，头上总是扎着时髦的彩色头巾。从怡陶碧谷一间温室旁的小木屋起家，如今的他运营着雇有上百名司机的布卢明代尔豪车服务公司（Bloomingdale Limousine Service）。有了他的支持，就相当于拥有了当地数量庞大的一众锡克族支持者，还能享有无可比拟的本地情报服务。散布在整个选区各个角落的出租车司机和豪车租赁从业者都是获取情报的一线好手。

我们的竞选活动从当年12月持续至次年1月，那段时间里，我每天三次出门拉票，每次都会穿上一件之前为了去北极所准备的派克大衣，下身穿着滑雪裤和雪地靴，还戴着围巾和手套才能出门。冬天的多伦多，太阳在下午三点半就落山了，所以我们常常不得不摸黑在被雪覆盖的大街上艰难跋涉。为了证明被对手戏谑为“外来客”（carpetbagger）和“空降选手”（parachute candidate）的我有着满腔热诚，我的拉票团队和我决心要迎难而上。

我们敲开了数千扇门，期间遇到的一些民众我至今仍然记得。比如那位应声来开门时还在围裙上擦着手的女士，后面还跟着一个小男孩。“布赖恩有哮喘，”她说，“你准备怎么减少空气污染？”快在她家门口冻僵的我尽力向她阐述了一个她能够信服的环保政纲，可当她转身回到屋子里继续喂布莱恩吃晚饭的时候，我开始怀疑我是否赢得了她的支持，而且，我仿佛从中体察到了横亘在全神贯注的选民和天马行空的政治家之间的鸿沟。然而，从与那位夫人和其他上百位民众的交谈中，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正是为了她而从政。

我也还记得在平安夜给我们开门的那对年轻夫妻。他们当时脸上挂着泪痕，我说我可以等会再来，但他们执意要我留下，并且告诉我他们刚参加完侄子的葬礼回来。他们的侄子之前出门和朋友玩时，突然遇到两群毒贩在街头交火，这个年仅20岁的孩子不幸被一颗流弹从背后击中，当场毙命。数周之后，我亲自到市政厅参加了他的追悼会。此后，当我在议会带头反对政府废除控枪法案的提议时，为的正是在平安夜那晚遇到的沉浸在悲痛中的他们。

这种门前政治也能让你亲眼看到社会的分化，而弥合这些裂缝正是政治家的职责。记得那位住在蜿蜒小径尽头，家门前富丽堂皇的女士，在对我们党的政策进行了一番盘问后，便直言她绝不会投票给任何要她多缴税的政党，然后就把我打发走了。我还曾拜访过一些住在光线昏暗又臭气熏天的老公寓楼里的移民家庭，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敢

随意打开房门，而那些来开门迎接我的都是些半裸着身体、露出大片刺青、目眦欲裂又穷困潦倒的年轻人。

我们在当地的选举活动得到了多伦多各地自由党人的广泛支持。随着我们在开展活动中积累的经验愈发丰富，我们工作的热情也随之高涨起来。但是，从全国层面看，支持自由党的势头正在减弱。我最初投入这场选战时，是认定了自由党一定会胜选的。20世纪90年代时，自由党政府曾成功削减财政赤字，其恢复财政秩序的政策无论有多粗暴，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可。当时，国家的经济正持续增长，总理则因创造了持续繁荣的情景而广受赞誉。但是，自由党毕竟已连续执政了13年，党和政府都已经开始明显地感到乏力，而后来的丑闻又让我们的名誉大为受损。经历了1995年那场差点让魁北克独立势力得逞的公投，政府决定授权在魁北克资助一项以提升魁北克公民国家认同的项目。然而，这个项目数以百万的财政资助却在不知不觉间流入了十多个欺上瞒下的工作人员的口袋。尽管后来总理下令要彻查该案，那几个贪赃枉法的人随后又全数入狱，但保守党从此便不断拿这场“资助丑闻”攻击我们，民众似乎也逐渐认同了他们的说辞。

我们的选举活动进行到一半时，又遭晴天霹雳。加拿大皇家骑警（The Royal Canadian Mounted Police）宣布将就向股票经纪人与投资者泄露证券市场转向信息一案，对当时的自由党籍财长展开调查。虽然这一指控纯属子虚乌有，这名财长后来也确实被宣告无罪，然而，就在警察介入并宣布开展调查后，我们的全国选战便受到了一次空前的剧烈冲击，原本我们在全国民调中的领先地位瞬间化为乌有。

距离选举日只剩10天的时候，数名“数据猿”跑来垂头丧气地告诉我，我们在民调中正处于落后位置。保守党的支持率正在激增，这让保守党领袖史蒂芬·哈珀信心大增，他甚至一度兴冲冲地到我选区内的一个乌克兰裔居民聚集的大教堂，呼吁集会的民众“把叶礼庭送回哈佛”。为此，我们特地召集了一大批拉票员，和我一起挨家挨户地从早

上十一点到晚上九点半昼夜不停地向民众拉票。我的夫人则在大本营内帮忙接电话，煮饭烧菜，保障后勤。当选举活动进行到最后一周，一派自由党籍乌克兰裔民众出于对我的不满，竟走进了选区内的保守党总部，宣布支持我的保守党对手。而此时，新民主党的全国领袖杰克·莱顿（Jack Layton）也公布了几千通电话录音，告诉人们我的竞选活动正土崩瓦解，呼吁所有支持改革的选民转而支持新民主党人。总的来说，我们的选举活动是在一派失去控制的局面下结束的。

2006年1月23日的选举当晚，我们出乎意料地取得了怡陶碧谷湖滨选区的压倒性胜利，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现场近五百名拉票员的努力。我这时才明白了政治里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把你的渴望展示出来。我展现了自己赢得选举的渴望，人民便以支持回赠我。数千名同胞国人把他们对我的信赖和托付通过选票交到了我的手上，那是一种陌生又崇高的体验。那一刻之前，我只需为我自己代言，只需对我的家庭和我自己负责。现在，我必须开始为陌生人发声，对陌生人负责。

在那个修缮一新、名为“好莱坞”的迪斯科舞厅的地下室里，我站在电线杂乱密布的地板上，头顶着刺眼的强光，向所有支持我的陌生人、同胞公民和数百名志愿者们表示感谢，是他们让这场胜利成为可能。巧兰提前为我准备好了一首匈牙利小诗，准备让我在胜选时拿出来读，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小诗冷静的语调和其中朴素的意蕴。“黑衣人”之一伊恩·戴维在我耳边轻声说，“跳过这首诗”，我没有听他的，还是读起了这首约瑟夫·奥蒂洛（József Attila）所写的《多瑙河旁》（*By the Danube*）最末几句：

我欲追求那事业虽然人性难以

全盘坦白我们往昔的作为

但那载着前生、今朝和来世的多瑙河水

将我们温柔地卷入随湍急的水流流淌

父辈战时洒下的热血

传达着和平的讯号让我们共同缅怀与尊敬

将秩序融入我们的公共事务：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

而它注定艰难[注]

在这个挤着支持者和记者、吵闹不堪的迪斯科舞厅里朗读这首诗，确实感觉有些奇怪。对于那些一向不看好我的人来说，这也让他们几乎可以确定，他们此前对我这个从国外来的知识分子的印象是正确的。但我并不介意。之后的几年，“将秩序融入我们的公共事务”成了今后我习惯用来定义我的政治职责的各种方式之一。

在之后一个小时不到的时间里，我们仍挤在“好莱坞”舞厅的地下室里见证全国大选的结果出炉。史蒂芬·哈珀和他领导的保守党最终以微弱的优势胜出。尽管坐拥众多议席，但保守党的议席数量仍然不足以组建一个多数党政府。正当我还在消化方才那个改变我命运的选举结果并且意识到自己的仕途将从出任一名在野党议员起步的时候，总理马丁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他承认败选，并宣布辞去党领袖的职务。一场争夺党领袖宝座的鏖战随即拉开帷幕，那些原本想来看看我这个“空降选手”是否能够安全着陆的记者和摄影师立马将我团团围住，问我是否准备参与这场角逐。如果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有记者暗示我说，我将成为这场党领袖选举中最有可能获胜的候选人。在现场媒体闪光灯的簇拥下，命运女神掌控了我命运。

关于之后几周发生了什么，我记不太清了，只记得我第一次坐进议会，第一次参加自由党议会党团的会议，还第一次听到败选的议员最后一次在党团同事面前发言。其实，我们这些选举的幸存者应该多听听那些落选的同僚在说些什么。当时我们都认为，保守党的胜利只

是暂时的，因为作为天然执政党的我们很快就能夺回执政权。我们不断告诉自己，我们只是被暂时困在“禁区”而已，败选只不过意味着我们要在这里等上一段时间罢了。这是我上的第一堂关于政治幻想具有遮蔽效果的课。我们中的每个人最后都开始用同样的话安慰自己，尽管这只是个自欺欺人的理由。倒是我们那些败选的议员同事，包括那些回忆起自己在任时的情景便会不禁流泪的同事，更能比我们看清形势，他们说：“或许你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你们在野党的身份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时我们确实不知道，在野的身份将在前路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危机。

就在新一届议会即将开幕而我即将赴议会履职前的几周，“黑衣人”再一次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这一次我们商讨的是如何打好一场角逐党领袖的全国选战。我们原本设想，这场比拼还有好几年才会到来，可没想到这场决定我命运的党代会已近在咫尺。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就将在蒙特利尔拉开帷幕，届时将有来自全国308个地区通过投票产生的4500位党代表出席，他们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决定新一任的党领袖人选。当然，当时的我们对即将到来的党代会将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然而，党领袖将在此类党代会上由代表们亲手选出这一点，确实是加拿大政治惯常的运作方式。这势必将是一场群雄四起、竞争激烈的角逐，我们必须做足准备。有意加入这场战斗的志愿者开始注册，所需的上百万资金也开始陆续进账。站在这样一个关键的节点上，我绝不能像哈姆雷特一样优柔寡断。我要加入吗?

此前事态的演化全都在我们的预料之外，但巧兰和我都明白，我们已经出于种种原因回国，尽管我缺乏足够的从政经验，但我们可能再也不会遇到这么好的机会了。所以我们决心加入。说实话，我觉得自己像滑雪的初学者，正从山顶开始沿着一条黑钻[注]滑道往下滑。我能听见脚下滑板擦过雪面的声音，也能感到向下俯冲时加速产生的巨大动能。但我告诉自己，我之前就已登上了顶峰，现在只要能安全下山就行。

首次当选议员后的第八周，刚刚在议会宣誓就职的我便宣布参选加拿大自由党领袖。接下来的九个月，竞选党领袖的野心不仅将带领我横跨整个大陆，遍访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也将把我带入内心深处那片我从未发现的新天地去。

---

1. Niccolo Machiavelli，The Prince（1513），ed. and transl. David Wootton（New York：Hackett，1994），ch. 25.（此处译文参考马基雅维利《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0页。——译者注）
2. 对于麦克米伦是否真的发表了这次广为人知的讲话，争议仍存。Elizabeth M. Knowles，ed.，What They Didn’t Say：A Book of Misquot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 Vi，33.
3.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Lesser Evil（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4）。
4. 参见Michael Ignatieff，Blood and Belonging（Toronto：Penguin，1993），p. 123。
5. 参见Michael Ignatieff，Blood and Belonging（Toronto：Penguin，1993），p. 146。
6. “对任何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言，拷问从来都令人深恶痛绝，它绝不应当被合法化、被容许或在战场上被暗中使用。一旦国家实施了拷问，那也就表明该国认为人的个体是可消耗的这一终极观点。这一观点与任何认为自身存在的价值是以人类尊严与自由之名管控暴力与压迫的宪政社会的精神是对立的。”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Lesser Evil，p. 143。
7. 参见Michael Ignatieff，The Russian Album（London：Penguin，1997 ed.），epilogue。
8. Ernest Renan，“What is a Nation？” http://www.nationalismproject.org/what/renan.htm.
9. http://www.theatlanticwire.com/politics/2013/02/ed-koch-obituaries/61684/.
10. http://www.poetrymagnumopus.com/index.php？showtopic—1685.苏巧兰对本诗英语翻译已略做调整。
11. 一般说来，正规的滑雪场内的雪道上都有道标，不同颜色和形状的道标代表不同级别。黑钻滑道（Black Diamond）也称黑道，是滑雪场内难度最高的一种雪道。——译者注

第四章 察言观色

在加拿大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参选政党领袖绝对是个十足的体力挑战。毕竟，我们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民主国家，横跨六个时区，有着五个地区和两种官方语言。12月，由全国308个选区的六万名党员提名的党代表就将从五湖四海聚集到蒙特利尔，代表全国党员选出一名新的党领袖。他们所代表的地区北至北极圈，南至加美边境，西抵太平洋沿岸，东讫大西洋沿岸，东西跨度长达5000公里。要想当选党的领袖，我就必须赢得绝大多数党代表的支持，无论他们是来自北部的原住民保护区，还是东南部的渔港，或是西海岸上的豪华公寓。因此，我有上千公里的路要赶，上千只手要握，还有数不清的政治和谈、深夜协商、交易会面和募资集会要参加。

就在我宣布参选后不久，另外12名候选人陆续宣布参选，他们无不是些经验老到、出任过选任职务甚至是内阁部长的资深政治家。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比我更懂政治。他们的加入势必会让这场选战变得更为激烈：曾是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Montreal Canadiens）守门员的肯·德赖登（Ken Dryden），曾在90年代因在辩论场上驳倒分离主义者而扬名天下的魁北克人斯特凡·狄安（Stéphane Dion），还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青年时代的好友李博。当时的他为了获得参选自由党领袖的资格，已从新民主党出走，加入了自由党。

我觉得自己要比李博略胜一筹，毕竟我已经为自己在议会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他压根没有参加这次选举。我前一年在政策大会上的演讲让数千名党代表认识了我，也让媒体对我的回国从政兴趣渐浓，开始给我腾出越来越多的版面。参议员戴维·史密斯用他那雄辩的本事说服了大批经验丰富的政坛前辈支持我的参选，他们坚信我能够当选。

他们对我的认可带来了一个悖论。我本是个作壁上观的局外人，仅仅踏入政坛数周就成了一名党内的认证候选人（establishment candidate）。这反倒给我的辅选团队带来了紧张的气氛，那些负责运作我的选举活动的年轻人本想通过我给党带来一次彻底的变革，可是那些同意为我背书的专业政治家们却希望自由党能够维持现状。

从你踏入政坛的那一刻，你的对手就开始给你贴标签，如果你不想方设法地摆脱它们，你就很有可能会被踢出候选的队伍。如今，我的身上刚刚贴上“认证候选人”的标签，党外的对手就已经开始定义我为乔治·布什的辩护者了。竞选活动启动之初，我有一次到渥太华大学做讲座。刚到现场，就有一群人跟着涌了进来，后来在我讲到一半的时候，三个戴着面罩、打扮成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囚犯模样的人突然站了起来，就这样一言不发地站到了讲座结束。我尽力让自己用自由主义的姿态来应对这一情形，告诉人们我欢迎抗议者的到来，但是在现场各大全国性媒体的众目睽睽之下，显然党外那些反对我的学生们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将我的形象扭曲成了一个会为任何坏事辩护的人——比如虐囚或对被关押者实施酷刑——尽管我和他们一样对这种行为厌恶至极。

正当我们试着研究这些学生向我施压的缘由和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时，我和我的团队却意识到，原来媒体对我的高度关注并不会理所应当地带来党代表的支持。只有亲自与他们握手寒暄，才可能赢得他们的选票。如果你不在他们的家门口出现，他们就不会投票给你。出现在他们面前，并用行动告诉他们我可以迎难而上争取他们的支持，对我而言格外重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我在他们心目中自视甚高、却对政治涉猎浅薄的“官二代”形象。

我们便这样上路了。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同其他所有候选人一样，巧兰、我和我们的助手马克·查理福克斯生活在飞机和机场间。我们有时会搭大型客机去一些更远的地方，还有些时候我们就坐在我的

朋友杰夫·基欧驾驶的四人座小飞机上，缓缓地翱翔在2000英尺的高空中俯瞰广袤的草原和森林。夜深时分，窗外尽是一望无际的黑暗，只有远离人烟的农家还亮着稀稀疏疏的灯火，地图上幅员辽阔的疆土开始在我们的脑海中变得具象起来。我们住过各种各样的酒店，有的酒店有着低矮昏暗的走廊，有的房间门口还会停着废弃的餐车；我们整天靠蒂姆·霍顿斯（Tim Hortons）的袋泡茶、酸奶和饼干度日；我们一刻不歇地工作，后来发现自己无论站着或坐着都能睡得着，尤其是在深夜空无一人的机场休息室里。我们从马克经营乳牛场的父母那儿借了一辆车驶过大江南北，以至于他曾说我们应该给自己的回忆录取名叫作“别克君威岁月”（*The Buick Regal Years*）。

一旦踏入政坛，你每日的生活都将成为电视直播。你永远不会插队，永远不会对一个司机、服务员或柜台职员不耐烦。你永远不会发脾气。你也永远不会忘记每次有路人上前来与你合影或索要签名时要面带笑容。你不得不放弃任职期间自己所有的私人生活。人民在看着你。

许多打算从政的成功人士，既不屑于没完没了的见面寒暄，又不愿意在公众面前假装态度温和，认为这么做有失尊严，但他们错了。政治里所有的苦差，包括无止境的出差和开会，完成各种不可能的行程，还有时刻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中，都是为了寻求一种从别处无法获取的权威。你必须了解你的国家。

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对于国家的认识，是在简报里找不到的。他知道一方水土如何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又如何塑造了一方水土。没有什么形式的政治专长比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更为重要了：当地政治中奇闻逸事的细节，当地高官和权力代理人的名字——市长、高中教练、警署长官和大企业主——因为你常会需要在讲话里提到他们。伟大的政治家必须对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至少得记得每一寸自己曾经踏足的土地。无论身处何地，他们都要能让人觉得自己对这里就像对自

己的家一样熟悉。当他们询问人群中的某人来自哪里时，他们要随时脱口而出一个故事，把自己的背景巧妙地和提问选民的背景联系起来，达到令人称赞的效果。法语中会用“一个属于当地的人”（*un homme de terrain*）来表达对政治家的称赞。英语里没有准确对应的表达，虽然它应该有。这个短语的意思是，某个政治家对于脚下的土地和人民的背景都很了解，仿佛自己的根就在这里一样。我认识许多这样属于当地的男性（*hommes*）和女性（*femmes*）政治家。我记得，有一次自己和一位议员同坐一架飞机出行，当飞机经过他位于东海岸上的选区，然后逐渐靠近降落地点的时候，他始终专注地俯瞰着地面上的农场。“这家人是我们的支持者。”他手指着一户农家说道。随后，他又把手移到另一座房子说：“就算你双膝跪地求他们，这家人也不会投票给你。”他熟悉这片土地上的每一座屋子、每一片农场甚至每一条乡间小径，谈起这片土地时就像一个在评价自家羊群、眼里不带任何感情的农人。

只要民主政治仍然要求政治家掌握此类的属地知识，仍然以此作为衡量政治家可不可信的标准，那国家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而，一旦民主政治将自己与广袤的土地脱钩，让原本遍布于集会礼堂、客厅、餐馆和酒吧里的议政热情全然转移至电视屏幕和网络上，麻烦就大了。我们将不得不任由那些形象设计师和媒体顾问摆布，并且让我们的思维囿于他们展示的种种幻象。到那时，政治将成为大都会独裁的戏码，罔顾小城镇和偏远乡村的现状，而这些地方和大城市一样都是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针对所有那些认为网络将更好地落实民主的言论，我想说，网络可能会让我们失去那个让政治真正变得民主的侧面：选民与政治家面对面的互动。YouTube上的视频和广告永远无法代替两个有血有肉的人之间真实的交流。要是网络接管了政治，那选民就永远失去了核实现状的机会，失去了与政治家面对面交流后再决定是否支持他或信任他的机会。政治必须保持有形的沟通，因为信任也是有形的。

我想起了新斯科舍省斯普林希尔市（Springhill）的皮西厄斯骑士团礼堂（Knights of Pythias Hall）、安大略省林赛市（Lindsay）的山姆休斯军团礼堂（Sam Hughes Legion Hall）、温哥华唐人街上的富大海鲜酒家（Floata Seafood）和其他中国餐厅。这些地点和不计其数的更多地方，正是我们国家践行民主的见证。这些场所的墙上总是挂着各种旗帜和横幅、女王和前总理的肖像，以及当地狮子会[注]或扶轮社颁发的徽章。一走进去，便会看到后方的桌子上摆着茶壶、咖啡壶和三明治，围着讲台被摆成半圆形的宴会椅，以及坐在你面前的忠诚的党员们。他们中有即将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中老年人，也有头戴棒球帽的农民，还有穿着工会T恤衫的男士和打扮精致的妇女。他们的身边总是萦绕着安静、庄重的气息，表面和气的他们其实心里仍然对你有所怀疑，而你正是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而来。他们正是手中握有投票权的党代表。

在漫长的党领袖竞选活动中，我每天四次甚至更多次迈入类似的会场，先和完全陌生的人握手寒暄，试着搞清楚他们是谁、想听什么，再上台做竞选演说，然后回答问题、签完海报后，就直奔下一站，或是机场，或是礼堂，最后到下一个酒店的房间里倒头就睡，结束这漫长的一天。

要想让他们耐心地倾听你的演说，你就必须知道他们想听什么。这在专业人士的口中被称作是“察言观色”（reading the room）。如果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能够准确地察言观色，就能牢牢地掌控现场。但要是在察言观色的过程中出了错，就只能在聚光灯下敛手待毙。我也曾在察言观色时出过不少错，直到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上场前忘记你之前懂得的所有东西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必须丢掉小聪明，丢掉伶牙俐齿，丢掉侃侃而谈，开始学着怎么和自己的听众建立联系，任何联系都行。后来，我学会了从自己的生活中找一些故事，试图用很长的一段话来告诉他们：我认识你，你也认识我。在魁北克，我会谈起我的姨父姨母（主要是姨母）在列治文（Richmond）经营的

乳牛牧场。在海洋省（the Maritimes），我则会说起自己来自新格拉斯哥（New Glasgow）的曾祖父，和在弗雷德里克顿（Fredericton）出生的祖母。在西部，我会和人们闲谈父亲过去在落基山脉铺铁轨的故事。这些原本对我而言有些抽象的血脉，现在却开始变得真实起来。我在做一件所有政治家都会做的事情：把我的故事变成他们的。

在呼吁党代表支持我的同时，我也知道自己面对的是刚刚被夺走执政权、正挣扎着重拾信心和方向的政党的党员们。所以我每到一处便会对所有人说，支持我就代表着支持变革，支持革新。我和让自由党名誉受损的绯闻没有任何关系。但我同时是一个忠诚的党员，与自由党的渊源可以追溯到40年前。这就像走钢丝一样难。我在争取领导的政党，曾有着令我深恶痛绝的密谋文化，可我又不得不寻求那些忠诚党员们的支持，如果我的厌恶太过明显，他们肯定不会把票投给我。我必须说服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握手、回答和微笑——让他们知道我有做一名党领袖所需的能力，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为党的事业而奋斗，让他们知道我值得信赖。

政治是一项对肢体能力要求很高的工作：你通过双手的触碰、攥紧和握持，通过眼神，和他人建立联系。于我而言，这些本事并不是天生就会的。曾经我有这样一个坏习惯，别人和我说话时，我总是习惯性地眼神朝下，从不与人对视。一直以来，我也习惯了将信任用语言表达出来，让语言替我传递情意，然而在政坛耕耘时，真正的信息却是需要用肢体表达的，需要用眼睛和双手来传递的。不管你嘴上说着什么，你的肢体必须同步传递这样一个信息：你可以信任我。

如今投身政坛的我，比往常更加懂得欣赏政治艺术的美妙。我不禁回想起2001年上过的一堂政治研修课。我当时正带着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穿过举行达沃斯论坛的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我们途中经过一个房间，随后，克林顿展示了他那能将所有人的名字信手拈来的本事——不仅是人名，还有人们各自家族的故事——让我十分惊

讶。他和大家握手、亲吻脸颊、对视，然后向前行进的过程，就好像是一台联合收割机，一边前进，一边将所有的稻谷捆在了一起。当我后来遇到奥巴马总统时，他一边握住我的手肘，一边快速提及了我写的一本书和一位共同好友萨曼莎·鲍尔的名字，让我永生难忘。他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的风度，仿佛让人觉得，他在台上讲话时，眼里除了你，没有别人。

这是一门古老的技艺，一种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Baldassare Castiglione）在《廷臣书》（*Book of the Courtier*）中大为赞扬的政治艺术。他基于自身为曼图亚公爵（Duke of Mantua）的宫廷效力的经历，于16世纪初写成了该书。他在书中用“轻松”（*sprezzatura*）一词来形容政治中最为关键的一种天分。英语中同样没有准确对应的词汇，它大抵上是指能让他人在你的陪伴下感到轻松的一种天赋。时至今日，卡斯蒂廖内给出的建议仍然历久弥新：

> 我发现了一个似乎比人类的任何行为或言语都更为有用的普世准则：即不计成本地摆脱任何矫揉造作，把它视作如礁石般崎岖、危险，并且（或许可以用一个新奇的表达来形容）用一种可以使所有奇谲巧作隐匿起来的、特定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万事万物，使人的所有言行看上去浑然天成，毫不费力。我确信，优雅将从个中迸发……㊟

“浑然天成，毫不费力”——伟大的政治家能让复杂的设计看上去浑然天成。人类所有的政治技巧中都包含着诡计的成分，而诡计则必须被轻松和优雅包装得让人看不出破绽。这种后天的优雅只有在岁月与历练的洗礼中才能被逐渐掌握，无论是谁都无法教授。它不是一种技巧，也不是一种常规，没有任何执行领导力的课程可以把它教给你们。相较于一种技术智能，这种人类行为的优雅更像是一种体育竞技的能力。要是起步时没有这种天然的魅力相伴，便无法在后天习得，

任凭你的意志再坚定，也自然无法展现。当我们称一个人是“天生的”（natural）政治家时，就是指他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能与他人产生联系，让他人感到放松，让他人感到自己在他的眼中独一无二的本事。所有天生的政治家的本事都可以通过后天的练习更臻完美，但除非是与生俱来的天分，否则看起来不免有些虚伪。政治家因圆滑而遭人嫉妒和鄙夷，这一点并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对人们口中的故事、阐述故事的方式以及故事背后的涵义产生真实的好奇和兴趣。在所有构成轻松的品质中间，我会把倾听，真诚地倾听你的同胞国人的心声，列为最常被低估的一种政治技巧。人民想从政治家那里获得的、有权利向政治家要求的，正是被倾听。很多时候，倾听是你唯一能做的。人们向你倾诉的问题或许无法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或许在你的能力之外，但是只要你全心全意地倾听他们的心声，凝视他们的双眸，眼神不越过他们的肩膀落到队伍中的下一人身上，即便你没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他们也会坦然接受。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些技巧，而我眼下正面临着一场十分激烈的竞争。与我争夺党领袖宝座的对手们，不仅有的比我党龄更高，而且清一色都是资历丰厚、政治技艺纯熟的老手，个个都有匹配人脸与名字的能力，并且轻而易举便能找来曾经施过恩惠的人帮忙。

在遍访全国的旅途中，我发现一幅人民心中的政治关切的地图，一幅以自己生活的地方为中心，随后向全省乃至全国辐射开来的地图。这是一幅对宪法和司法毫不关心的内心地图。每当有人问你类似当地医院和社会日间照料中心为何关停的问题，你当然不能用这些不在联邦司法管辖范畴之内所以与我无关的理由来搪塞他们。除非人们发现你对本地的事务很熟悉，否则他们不会听你发表任何对全国性事务的见解。可是，熟悉当地事务并不容易。有一次，我们到访萨斯喀彻温的乡间小镇埃斯特黑齐（Esterhazy），巧兰和我在从政之前便来过这里。早在19世纪80年代，匈牙利人便率先在这片平原上安营扎寨，他们中的某些人至今仍葬在城外的一座山丘上。我的夫人正是一

名匈牙利后裔，她以前在我面前读起这里的地名时，会像在娘家说话时一样，发出一个短促的a元音。可当我试着在发表政纲时模仿她的口音，人们的表情却冷若冰霜。原来，当地人在读这里的地名时，发的是个拉长的a元音。一个小到如何正确地发一个元音的细节，也可以决定你和当地人建立联系的能力。

政治强烈的属地化本质时常让我不禁怀疑，究竟什么才是我们作为同一国人民、组成同一个国家而共享的事物。为我们的共通之处发声，正是一个政治家背负的责任，尽管第一眼看上去似乎我们相通的地方并不多。

这个问题在魁北克尤为突出。我原以为自己的法语已经足够流利了，可当我来到魁北克农村与当地的党代表交谈时，我的法语能力仍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因为当地大部分居民只会说法语，还带着浓重到让人难以理解的口音。用你的第二语言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感觉就像是在一条信号很差的电话线上打越洋电话那样艰难。况且，我所说的法语比起魁北克更接近巴黎口音，这一点也常为当地的民族主义者所诟病。我花了好一阵才适应了当地的口音，能够听懂当地人说话。我的夫人告诉我，我一开口说法语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我的动作幅度会开始加大，甚至有那么一点过于做作。

魁北克曾向国家提出过许多要求，但都落在同一个大范围里：承认他们独特的民族身份。时至今日，只要想到1759年被英国打败的6万法国殖民者如今竟然发展成了一个拥有800万人口、充满活力、联系密切、热情洋溢的群体，人们仍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然而，无论他们多么成功，他们始终都没忘记在这个拥有3亿英语和西班牙语人口的北美大陆上，这里是一座说法语的孤岛。

我们党和魁北克有着天然的联系。自由党的创始人威尔弗雷德·洛里耶（Wilfrid Laurier）是加拿大历史上的首位法裔总理，自此之后，三名来自魁北克的政治家——路易斯·圣洛朗（Louis St.Laurent）、皮

埃尔·特鲁多和让·克雷蒂安——曾先后出任自由党领袖和总理。长期以来，国家统一——使法语人口与英语人口为了一个共同的事业融合到一起——是自由党人心中神圣的使命，然而，腐败的丑闻却使我们逐渐失去了魁北克选民对我们的信赖，从而使左翼的魁北克集团和史蒂芬·哈珀领导的右翼的保守党有机可乘，夺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众多议席。就连对魁北克政治长期介入甚少的新民主党人，都开始成功地说服部分原先忠于自由党的选民。

想要夺回执政权，重获魁北克人民对我们的信任至关重要。在蒙特利尔、魁北克市（Quebec City）、圣劳伦斯航道北岸的小村庄和临近加美边境的农村地区，我每到一处都会提醒当地的党代表，当初接纳了我的俄国家族并给予我祖辈庇护的，正是魁北克。我说，他们就长眠于俯瞰圣弗朗西斯河的墓园里，我多么希望这块土地将永远是我们国家的一部分。对我而言，给予魁北克省以更大的自治权不仅会加大社会分歧，而且似乎也不能解决关键问题。问题真正的关键在于要展现出这样一种信念，即除非魁北克和魁北克人民是这个国家的核心构成，否则加拿大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2006年6月下旬，正当魁北克人民准备迎接圣让巴普蒂斯特日到来之际，一名记者基于我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血缘与归属》中关于民族主义的论述，问我是否认为魁北克人是一个民族（nation）。这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学术问题。魁北克的分离主义者坚持主张他们是一个民族，并且依其身份，应当获得独立的国家（state）地位。魁北克就这个问题已先后举行了两次公投，分离主义者在1995年举行的第二次公投中仅以6万票之差落败于联邦派。13年前，我在《血缘与归属》中写道：“因为我们不属于同一个民族，所以无法热爱同一个国家。”[注]然而不同民族，我继续写道，却可以共享同一个国家，我相信我们永远都会这么做。魁北克当然是一个民族。

刚结束这一访谈，我就立刻意识到一位作者笔下的文字和一名正参选联邦公职的政治家口中的话语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我这句简单的评论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辩论。一些专栏作家认为我很勇敢，也有人说我是个白痴学者。与我同台竞争的对手们也都被迫表明自己的立场，有人支持，也有人强烈反对。有一段时间，一些魁北克民众，尤其是年轻人，会群集在我们的竞选横幅前，因为他们觉得我们以一种自由党此前从未有过的态度给予了他们某种意义上的承认。

在政治里，把一个事实叫作事实，有时像拉开手榴弹上的保险针那样危险。以我之见，身处法语区的魁北克人民有自身的民族身份本就是一个事实：一直以来，他们都同时视自己为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他们对加拿大的忠诚不会因此被削弱，虽然确实会让它变得更复杂。加拿大政治的智慧之处就在于，我们从来不会把任何一个单一的民族身份强加在任何人身上。我们建国的基础并非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而是多种互相重叠的复杂的身份认同。在我们创造的这个国度里，“魁北克人”和“加拿大人”这两种身份认同谁先谁后无关紧要。我之所以反对分离主义，并不是因为他们对自身处于成为独立国家的状态而自豪，而是因为他们坚持独立建国的主张，因为他们认为魁北克人必须要在魁北克和加拿大这两者之间做一个存在主义的抉择。这正是大多数魁北克人一向拒绝回答的一道选择题，因为他们对两者都能感到一定程度的忠诚。无论是把哪一种身份认同放在首位，他们都希望自己既是魁北克人，也是加拿大人。分离主义者胁迫人民二选一，无异于逼着他们把自己硬生生地撕成两半，这是一种道德专制的行为。经过一番辛苦陈述，我最后说道，我们都知道任何国家都建立在归属自由的基础之上。在此之上，我们的联邦主义体制才得以建立。我说，我们无法在这个国家实行中央集权，正是因为我们无法集中地认同同一种身份。

话音刚落，英语区的人民便开始质问我的言论是否正置国家的统一于危险境地而不顾，而部分推崇民族主义的魁北克人则想知道我何

时才能在加拿大宪法中承认他们的民族性。我答道，我反对打开宪法这只潘多拉魔盒。我们之前习惯将一切魁北克和加拿大之间的问题都归结到宪法上的做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啊哈，一些魁北克分离主义者说，那你刚才说的关于民族的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既然我已经把自己的声誉赌在了国家统一的议题上，那现在也是时候要承担后果了。

我们的对手，保守党政府目睹着这一切，总理史蒂芬·哈珀也始终对此保持着高度关注。2006年11月末，当我们的党领袖竞选活动接近尾声时，哈珀突然决定将主动权从我们的手中夺走。他在众议院发起动议，建议承认魁北克人——不是魁北克本身——是构成一个统一的加拿大的一个民族。[注]这让推崇分离主义的政党魁北克集团沮丧地咆哮，他们宁愿让推崇联邦主义的对手否认魁北克人民所希望获取的民族地位。我们党也只能哀号一番，因为我们本想把这功劳握在自己手里。可他是总理，他想从我们手里拿走什么，就能拿走什么。当动议被提出的那一刻，我从自己在众议院的位置上站了起来，支持承认魁北克人作为构成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的一分子的民族身份。这在我们的议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也为促成这件事做出了贡献，但这位以老谋深算著称的总理却把功劳都揽到了自己身上，仿佛这是他自己应得的。

为竞选党领袖而遍访全国的那段时间，我开始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角认识我们的国家。起初，各地争着抢着想要获得身份承认的呼声不绝于耳。联结不同族群的共同纽带看上去既孱弱，又无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意识到，为了夺取定义作为集体的“我们”究竟指代什么的主动权，不同群体和不同利益集团间持续不断的争斗俨然已让我们的国土化为一片疆场。诚然，人们会有为了国家共同欢呼的时候，然而相比起为国欢欣和对国家的忠诚短暂，大家更多时候都在为了如何阐释那些共享的理念而纷争不断。一个人对其所处族群的诉求，时常会和他人的诉求存在冲突。每个群体都希望自己的独特性可以得到

承认，却又都不情愿承认别人的。加拿大国内的不同族群时常给人以互相隔绝、不相往来的印象。移民群体渴望有更多移民进入，工会工人则希望减少移民数量；富人希望减少税赋，穷人却想要得到更多救济。任何形式的控枪，对所有小城镇与农村地区而言都很难接受，但却是赢得城市选民支持的关键政策。所有地方都想得到更多的联邦拨款，却又不愿联邦政府插手干预省内司法。从纽芬兰岛到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内陆地区，再到魁北克最闭塞的地方，它们和各省一样有着强烈的防备心理。亲眼目睹了这些事实后，我开始将这个国家视作一个政治的而非自然的产物。一旦将国家视作一个持续不断、夜以继日的意志行为，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政治家的角色很重要。正是他们把诉求各不相同的人们带进了同一个房间，让大家一起挖掘彼此共享的事物和共同的愿景。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政治家则是那些将人们共享的一切展现出来，然后在众人各异的诉求间寻求妥协以让人们和平共处的人。[注]2006年夏日的竞选活动里，我始终都在向人们传递一个“公民身份脊梁”（spine of citizenship）的概念，它让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求同存异。所谓的“脊梁”，指的不仅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仅是在国家不同地域有大抵相似的公共服务，更意味着政府应尽己所能强化人们共同的经验、共同的历史责任感与共同的权利和义务，把我们凝聚成同一个民族。只有当你自己亲身从政时才会理解，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的众多分歧，以及对于统一的渴望才是超越差异的存在。政治家们必须想尽方法去阐释人民的共同之处，并将那种公共生活融入国家的制度设计。刚起步时我并不知道这也是自己的一项工作，但我之后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

那个遍访全国的夏天，让我发现了国家内部悬殊的地方差异，可是这些差异却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我所说的是城乡之间的差异、市区与郊区之间的差异、南北差异，以及繁华都会和偏远地区之间的差异。加美边境上的闹市区里，时间过得飞快，大部分人的工作都很忙碌。在乡村、偏远或北方的城镇——国家的绝大部分地方——时光总是慢悠悠地流淌着，站在加油站付款处的姑娘一边读着大城市报纸上

的招聘广告，一边幻想着逃离脚下这片无聊的地方，这些地方要么没有互联网，要么需要拨号才能上网，镇子边缘铺着石子路，学校很远，最近的医院也要开四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我们国家的地域可以被分为这样两种：一种是你生于斯、长于斯，还能在这里谋生的地方；另一种是你要想过上好日子就必须离开的地方。

这样的不平等似乎从来没人提起——但随着竞选活动的深入，我开始愈发频繁地谈起它。虽然人们自愿地背井离乡无可厚非，但要是有那么多人除了出走别无选择的话，那似乎就有问题了。诚然，政府仅凭一己之力要想反转偏远农村地区人口减少的趋势并不现实，但政府仍然能有一些作为——对道路建设、教育设施和网络连接加大投资——就能给那些选择留守家乡、养家糊口的人们以更多的机会。毕竟，我国大部分丰富的自然资源都蕴藏在这些偏远的农村或北部的地区。那里有煤矿，有一望无际的麦田和森林，还有一刻不停工作着的抽油泵。我还曾去过一些极尽荒芜的地方——原住民的保留地、正逐渐消失或已完全荒弃的小镇——大自然丰富的资源馈赠就躺在这些地方的土地里。要想把这些地方的财富留在本地而不被大城市卷走的话，肯定能找出办法来。就这样，看上去不太可能会呼吁缩小城乡差距的我还真就这么做了。城乡间不公正的机会分布正迫使那些最聪慧的年轻人背井离乡寻求出路，我过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于是我决心站出来，为了建设一个公平分配希望的国家而战，为了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站在脚下的土地上为创造自己的生活而战。

亲身从政正是有这样的魔力，能让你改头换面，甚至能让你改变开始时抱持的信念。无论是千百次在偏远地区开会，还是数不清多少次同无论贫富、无论老幼的民众交谈，都在让你心中的那份信念慢慢沉淀。你不再记得那些具体的细枝末节，但一层又一层地，一个真理开始在你心里扎根。你开始从心底理解这个国家，熟悉这片土地。这场一开始只为了你自己的冒险，逐渐变成了背负众人寄托的征途。政

治会慢慢地让你明白——虽然有时候这个过程十分艰难——你是在为谁从政，又是为了和他们一起建设一个怎样的国家。

---

1. 国际狮子会（Lion Club International）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非营利服务组织，目前拥有超过46000个分会及140万名会员，分布于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译者注
2. Baldesar Castiglione，The Book of the Courtier（London：Penguin Classics，1967），p. 67.
3. 参见Michael Ignatieff，Blood and Belonging，p. 212。
4. 保守党的众议院动议原文为：“我众议院承认魁北克人民是构成统一的加拿大的一个民族。”2006年11月27日。
5. 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New York：Verso，1991）.

第五章 金钱和语言

直到2006年盛夏，我仍在角逐党领袖的过程中一路领先，不免会遇到所有领跑者都会遇到的挑战。我成了所有竞争对手联合攻击的目标，他们甚至开始在私下里谈判交易，试图将我挤兑出局以防我最后胜出。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我们不得不加大宣传攻势的力度，尽量将更多的党代表争取到支持我们的阵营中来。我们在多伦多市中心的办公室原本设在离央街（Yonge Street）不远的伊莎贝拉大街（Isabella Street）上的一家饭店里，但这里的空间太过局促，显然已无法容纳我们这个日渐庞大的团队。因此，感谢某位地产开发商出手相助，才让我们得以搬进不远处的布洛大街（Bloor Street）的一处更大的房子里。

忙于在全国奔波筹款的我，并没有本末倒置地选择坐镇大本营，亲自掌控竞选活动的运行。然而，每当我现身于竞选总部，并向在场的电话拉票员们致以问候的时候，对我而言全是陌生人的他们都会热情地向我招手，越来越多拉票员的加盟和不断壮大的竞选阵势，让我每次回来时都感到十分惊讶。所有竞选活动由伊恩·戴维和一群尽心尽责的年轻律师把控着，他们都主动辞去了先前的工作，在这里拿着最低工资全职工作。与其要找一群经验老到的幕僚再向他们支付咨询费，我更愿意和他们共事（即便我付得起他们的咨询费我也情愿如此，虽然事实上我并无财力承受高昂的咨询费用）。政治家离不开幕僚的辅佐，离不开他们对民调数据、焦点小组调查和市场战略头头是道的解读分析，但与此同时，政治家也应当明白，这些受雇于你的幕僚不应当成为整个竞选活动的主导。选举政治必须给那些从街头巷尾走来的志愿者们以足够的空间来施展他们的才华与抱负。要是身边没

有一群满腔热忱的志愿者，政治家就不免沦为幕僚手中的傀儡，任人摆布。况且，志愿者们对政治家的忠诚是再多金钱也买不来的。任何政治活动中，领袖的任务之一就是必须让其周围的人时刻保持对领袖的忠诚，而领袖也必须不负重托、以身作则。在我身边的人一路上与我同甘共苦，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与我成为了挚友。当我在外奔波、遍访全国各地的时候，他们也在游说各地党员，以确保只要某一个选区开始本地党代表的选举，当地党员一定会选出一位支持我的党代表候选人。要知道，这个年轻的团队里没有任何人拥有运营这样一场全国性政治活动的经验，但他们却极其出色地完成了任务。然而，不断增长的开支却开始让我们在财务上捉襟见肘。

与美国的标准相比，我们用于党领袖竞选的预算少得离谱，仅有230万美元。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坐一辆老旧的别克君威，搭普通的民航客机到四处工作，睡在最普通的酒店里，有时甚至不得不在支持者家中空余的房间里对付一晚上。这就是加拿大政治的运作方式，我们的民主相对而言并不昂贵。2011年，在我们这个国土比美国广袤但人口只有其十分之一的国家，一场联邦选举只花费了2.91亿美元，而2012年美国选举的总花费则直逼60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注]追根溯源，这悬殊的差距不只是因为我们可花费的事项较少，而是因为加拿大对选举花费有着严格的控制。在加拿大，选举活动的财务状况由加拿大选举局（Elections Canada）这一联邦机构全权监管。与欧洲的做法类似，加拿大各政党可以根据上一轮选举中的得票数量获得相应比例的纳税人所缴税收作为竞选活动的预算[注]，但必须在选区和全国两个层面上都严守对资金使用上限的规定。以2006年的党领袖选举为例，任何捐赠者最多只能为我们的选举活动捐款3300加元，且现金和来自国外的政治献金都不得被接受。另外，我们必须将每一笔政治献金捐赠者的姓名与地址上报给选举局，再由选举局将这些信息刊登在一个公开的网站上。只有通过官方渠道上报并开具收据，捐赠者才可以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时至今日，你仍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每一个曾

经勇敢地给我捐过款的民众的名字。所有这些规定都对负责上报捐款信息的工作人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他们也让我得以从这些繁复的规则里被解放出来。当那些身材魁梧、有钱有势的人穿着一身挺拔的西装在筹款活动上出现并与你勾肩搭背拍下合照的那一瞬间，你会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刚被某个利益集团所挟持，我想任何有过参选公职经验的人都明白这种恐惧感是怎样的滋味。选举局设定的资金规定则让我们得以免于如此恐惧感之扰。我清楚明白地知道每一笔资金的来源和捐赠者的信息，而且对献金上限的规定又能让我免于受任何利益集团挟持。这也让所有支持我的公民松了一口气，因为献金数量的有限让他们不必被人怀疑自己是想试图通过捐款对候选人施加影响。他们只是简单地想要支持这一政治进程，并同我们共享期间的激动与兴奋之情。这次竞选经历让我对于政府对选举资金做出规定的必要性深信不疑——上报与披露的流程规定、献金数量上限规定，以及禁止第三方势力对选举过程施加影响的规定。如果我是选举规定的政策制定者，我会将这些规定再向前推进一步，禁止在非选举期间进行政治宣传，以防没完没了的选战让政治家离选民越来越远，让政府一心只想着赢得下一次选举而不去尽职履责。我希望政治家们能从大金主的压力下解放出来，也希望政治家们能免于第三方造势机构的肆意诽谤和诋毁。政治家们当然可以尽己所能筹得更多的选举资金，但他们绝不能挥舞金钱政治的大棒来逼人们就范。

美国在金钱政治上的态度与做法多少让我有些困惑，尤其是前几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联合公民（Citizens United）案的判决更是让我难以释怀。注不管大法官们如何陈辞，金钱始终不能和言论画上等号。金钱代表的是权势。让我惊讶万分的是，财主们对政治进程粗暴的干预竟然受到了第一修正案的庇护，要知道，第一修正案的本意在于保护自由的政治辩论得以开展，而不是为金钱政治开脱。而且，在美国的政治传统中，人们也并不是不知道金钱可以对选举产生多大的影响，对于代表人民议政的政治家的腐蚀可以有多严重。以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为例的美国

国父，皆十分精通于任何可溯源至罗马共和国时期有关政治道德和腐败的经典共和政治著述。这些著述让他们明晰地认识到政治中的金钱必须被严格管控，以免其腐蚀一个崇尚自由的民族。托马斯·杰斐逊在1816年所写的一封信函中，称自己希望能够“从摇篮里扼杀那些富有企业的贵族们尝试挑战政府权威、拒绝服从国家法律的企图”(注)。在我看来，他所担心的金钱腐蚀似乎已提前到来，政治道德也似乎逾期不归，要想砍断金钱伸入政治的触角，除了强化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职权，并赋予其要求披露每一分一厘政治献金来源的权力，或许别无他法。美国必须让第一修正案的功用回归其被写下时的初衷，即保护自由的政治辩论得以开展。金钱的影响力显然已公然违背这一初衷。加拿大在这一问题上的监管模式或许无法在美国被复制，但它和欧洲模式一样，展现了兼顾管控金钱政治与保障言论自由的可能。

那年盛夏，我和巧兰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一段时间，以专心起草一份政策宣言。当时正值选举活动的高潮，各位候选人都已陆续表明自己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以肯·德赖登为例，他的那篇名为《加拿大雄心》（“Big Canada”）的文章甫一公开便收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文中呼吁人们齐心协力促生一个更具雄心壮志的加拿大。读罢该文，我心想，是时候写下我的观点并带着它们加入全国的政治辩论了。于是，我写下了这份将近八千字的政治宣言——《国家建设日程》（“An Agenda for Nation Building”）。既然史蒂芬·哈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决心要将国家带入衰退的泥沼，弱化联邦政府在国家公共生活中的作用，我认为一向高举自由主义大旗的我们应当站出来不遗余力地批评他们的做法：我们的政府应当遵循这样一个核心的宗旨——强化公民身份的国家脊梁以团结所有的加拿大公民。我们的同胞在偌大的大陆上四散而居，彼此的家乡、种族、宗教和语言各不相同，因此，我们的中央政府应当履行这样一个职责，即保证为所有人提供平等的公民身份条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建立大到令人反感的政府机构才行，因为自由必须是享有公民身份的前提。然而，有这样一个政府的存在，比如说加拿大公民便能安心地确保自己不会因为接

受高等教育而债台高筑，也可以确保自己搬到另一省份生活后仍然能够享有与从前大致相同的社会服务、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障。在医疗保障问题上，我们和新民主党人在过去的立场相同，都强调个人财富不应影响人们接受的医疗服务质量。我们因此走到了一起，提出了建立由公共财政支撑的医疗保障体系的设想。但是，如今关于这一设想的争议焦点却转移到了接受医疗保障服务的地域限制问题上。我们坚信，农村地区、偏远地区和北部地区居民有权和大城市的居民享有同样高质量的医疗保障。设立医疗保障全国标准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确保这一点：尽管我们分散在10个省份、3个地区，整整跨越了49条纬度线，但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公民身份。我们同属一个国家，我们始终坚信，正是这个富有创造力的国家政府将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使我们成为了一个共同的民族。

在选举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在许多问题上都提出了一些积极有为的设想：在魁北克市——温莎走廊（Quebec City-Windsor Corridor）建设一条高速铁路，以连接在这条走廊上生活的我国60%的人口；帮助生活在《印第安人法》（the Indian Act）阴影下的原住民摆脱该法案有辱人格的区别对待，重获与他人平等的公民身份；重新恢复联邦政府对科技项目的投资，以抵消私有部门长期以来对研发投入不足带来的负面影响。此外，我们还制定了全新的国家能源战略，包括打通一条横贯东西的电力和油气走廊，以减轻目前南北向电网与天然气管道的过重负荷。在我看来，要想实现以上这些设想，不能仅靠联邦政府一家坐镇首都、指点江山，而要寻求和各省政府、私营部门的通力协作才得以可能。因此，总理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仅需要排兵布阵、掌控全局，还要能够厘清各方的轻重缓急，从而找到一个合适的支点下手来撬动全局。

那些愤世嫉俗的人或许会觉得，这种宏大的设想只有愚蠢到会跑来政界碰运气的知识分子才想得出来，实属痴人说梦。这种观点显然低估了施政理念在描绘候选人形象和拉拢支持者时所能起的决定性作

用。政治家在判断属于一个理念的时机何时到来时，必须得有些特殊的天赋，这样才能在恰如其分的理念上做文章从而将民意牢牢地握在自己手里。在我们发布《国家建设日程》的小红书后，来自媒体和竞争对手的嘘声不绝于耳，可每当我注意到会议结束后来找我攀谈的年轻人手里都会攥着一本已经被翻旧了的小红书时，我就知道我们成功引起了这些年轻人的共鸣。

多亏我们的施政理念深入人心，加上全国竞选活动声势浩大，我才得以在这场党领袖竞选里愈走愈远，而我的竞选对手们恨不得我立马在他们面前摔一个大跟头。

2006年7月，黎巴嫩战争爆发。8月上旬，所有党领袖候选人都已就加拿大在这场危机中所能扮演的角色表明了立场。我们有必要在此稍作停留，来看看这件事到底有多古怪。我们这些候选人里没有谁有能力对中东局势的走向产生任何可以预见的影响，我们只是在野的反对党，而不是执政者本人。表明对这场战争的立场，对我们而言，最多会让我们在全国犹太人、黎巴嫩裔和穆斯林族群中获得更多支持，仅此而已。无论黎巴嫩人民正在经历如何切肤的伤痛，作为一个政治话题的黎巴嫩战争在加拿大一个政党的党领袖选举中都只不过是一个虚无缥缈的议题罢了。然而，政治就是如此。尽管政治家们对各种突如其来的事件毫无影响力可言，他们的立场和看法却能左右普罗大众对其是否能胜任公职的看法。

用政治的眼光来看，这场黎巴嫩战争正是让我给自己定位的好机会。给自己定位不同于在某一议题上选取立场，它不需要你对复杂的局势出谋划策，也毋需任何专业背景。给自己定位，就是要在政治光谱上找到属于你自己的独特位置，既要和其他对手有所区分，又不能和大部分人的立场差别太大。定位的目的，便是校准你在公共事务上的立场，从而和你意欲说服的某个选民一致。定位要讲究战略，你不必事事都力求我口说我心，但必须事事都有所准备再开口陈辞。要是

定位成功，你便能毫无削足适履之嫌而赢得目标群体的支持；要是失败，你必然会显得婢膝奴颜。

实不相瞒，这场黎巴嫩战争的定位良机被我彻底搞砸了。我在当时的一场访谈中，一个不小心便脱口而出称，我并不担心在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占领区发生的惨重伤亡。其实我的意思是，既然这场战争是由真主党开启的，不管结局有多惨烈，他们都必须接受。可是，我的这番话一经公开便被迅速解读为对平民伤亡的冷血与无情。这一解读在居住着大量黎巴嫩裔居民的蒙特利尔产生了尤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弥补此前言论带来的负面影响，我数日后特地出现在魁北克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大家谈》（*Tout le monde en parle* 或 *Everybody Talking About It*）的嘉宾席上。我在节目中说，攻击黎巴嫩南部小镇加纳（Qana）的以色列军队或许已经犯下“战争罪”。当这番言论被译为英语并在全国的英语媒体中广泛传播后，立刻引来轩然大波。我当时的意思是，面对真主党的炮火，本处于正当反击中的以色列国防军却不加判断地攻击了一片平民聚居的区域。我在哈佛的课堂上曾教过有关《日内瓦公约》（Geneva Conventions）的内容，我当然知道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之间有什么区别。我绝对不相信以色列国防军会蓄意地屠杀平民，但他们确实使用了过多的军事力量未加区分地打击了一处非军事目标，并且造成了众多平民伤亡。然而，支持我的犹太民众显然认为，在我的心中，以色列早已和纳粹画上等号了。

他们耳朵里听到的并非是你的本意。我无意撤回这些言论，因为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早已确认这场战争中滥用武力的现象确实存在，但我后来还是再一次重申了我对以色列正当防卫的支持。我知道，无论再多说什么都无济于事。正因为说错寥寥几句话，我便失去了许多犹太裔、穆斯林和黎巴嫩裔的支持者。事件发生后，媒体因此掀起的风暴，犹太支持者对我感到的愤怒和幻灭，以及这一争议对我们的竞选活动产生的灾难性影响接踵而来，无不让我大惊失色。回头来看，这个事件揭露了一个奇怪的事实：在像加拿大这

样一个文化多元并存的社会中，最能引起国内社会分歧的竟然是发生在遥远国度的国际事件。尽管相距千里，但发生在母国的冲突却有本事让身处加拿大的同胞们严阵以待，这就要求政治家口中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能治愈伤痛的神奇魔力，他们必须是平衡各方利益的高手。我从任何一个方面来评价都不合格。待这场有关黎巴嫩战争的争论平息，伊恩·戴维安慰我说，政治家都有九条命。加纳事件后，我就只剩一条命了。

至此，我们有必要再一次稍做停顿，从这一事件中反思语言在政治中的角色。如果你在踏入政界前曾是名作家、记者或教师，那你在运用政治语言上势必不会占什么优势，因为它和你此前玩过的所有文字游戏都不一样。或许你曾因为自己出色的沟通能力而感到沾沾自喜，但当你第一次踏上政治的舞台，你也会有这种好像走进了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香蕉》（*Bananas*）里，亲眼看着那个拉美游击队领袖宣布将瑞典语定为国家的官方语言一般荒谬的感觉。你离开了那个善良的世界，那个人们总是宽容善良地替你说完未尽的话，还对你的口不对心表示理解的世界。你转而进入了一个疯狂、愚蠢、想象力极度匮乏的世界，人们会逐字逐句地检验你的言语，你嘴里说出来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你的为人。同时，你也离开了一个互相原谅和遗忘的世界，一个允许往事随风散去的世界。你进入了一种当下即永恒的状态，你嘴里发出的每一个音节，你指尖敲打键盘发出的每一条推特、脸书状态、报纸文章和令人尴尬的合照，只要存在于网络空间，便等于给了你的竞争对手以攻击你的机会。你要是还因此特地召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予以澄清，那你已经在这场选战里输了一大半。在这场加纳之争里，我脑海里甚至出现了这样荒诞的想法，其实我那些没被人发现的评论才是我全部的生活。难道没有人知道我曾在以色列执教和生活，还曾为忠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赛亚·伯林作传？[注]怎么会有人认为我只是一个一味批评以色列的人？但这些都不是关键。我确实没能意识到一个族群在感到自身受到攻击后会以何种方式倾听。以赛亚·伯林曾和我谈论过这个问题。他曾经开玩笑地对我说，

20世纪20年代，在他长大的伦敦北部犹太人社区里，人们唯一关注的政治议题便是“这对犹太人是好还是坏？”这种二分法才是人们倾听政治语言的真正方式，不仅对于犹太裔人民而言如此，对于任何一个希望在政治上得到承认的族群而言皆是如此。锡克族人民想知道关于他们在印度备受压制的同胞的人权问题上，我所持的立场；泰米尔裔人民也想知道我对正让斯里兰卡面临分崩离析威胁的内战持何种态度；还有，伊朗裔人民也想知道我如何看待伊朗的神权政体。对犹太族群而言，他们能够接受的底线是对以色列享有的自卫权的明确支持。在这一点上我没有任何疑义，但我必须就一个被赋予合法自卫权的民主国家是否也有权僭越战争法提出我的质疑。这一点本不应该成为争议的焦点，一个加拿大政治家为什么要就另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是否在战时遵循《日内瓦公约》提出质疑？这不是我的工作。但我在加纳问题上的评论却被犹太裔人民解读为我对他们是否拥有自卫权的质疑。不管我此后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该族群领导层对我的信任了。自从史蒂芬·哈珀代表加拿大政府在以色列问题上提出了一个毫无变通余地的立场后，我便再也无法获得犹太族群间那个坚信两国方案(注)才是保障以色列安全的最佳路径的一派的支持。此后，我在这一问题上再也没有了昭雪的机会。

政治和生活一样，个中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从过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待这场争议渐渐散去后，我在位于多伦多的圣花犹太教堂（Holy Blossom Temple）做了一场演讲，细数我从这次争议里学到的教训：

> 历经磨难与过失——主要是过失——我终于总结出几条结论。在这个反思的过程中，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一句话成了指引我的纲领。他说，政治家不应做一个沙发。我们不能任由最后一个坐在我们身上的人塑造我们的形状，我们应当坚守自己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我们应当坚守原则。那应当坚守些什么原则呢？

原则一，坚持始终如一。我不应该在这里因为袒护以色列而背叛身处我们这座城市另一端的清真寺里的朝拜者，我也绝不应该在清真寺里为了袒护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巴勒斯坦，去背叛我在这座犹太教堂所许下的承诺。我必须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原则二，不得因言论不当引起纠纷。我必须心口如一，只将我意欲表达的说出口。我绝对不得为了迎合仇恨与不满的情绪而发表言论，我若发表此类言论，便是背叛了自己要将加拿大人民团结起来的使命。原则三，我必须为加拿大发声。我从不代表任何以色列或其他国境内的政治势力发言，只有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可以指导我作为一名选任代表的言行。在处理与中东关系的问题上，为加拿大国家利益代言意味着竭力避免可能进一步拖累以色列的更为严重与致命的冲突。(注)

我从历次过失中吸取的教训，就是认识到了政治可以是一场文字游戏，尽管还不至于是一场纯粹的拼字游戏（Scrabble）。没有任何政坛新人会在一开始就做好了应付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的准备。你嘴里冒出来的每一个单词都可能成为对手反击你的好机会。初涉政治的人几乎都会不可避免地把他人的攻击放在心上，殊不知这就成了他们政治生涯里犯下的第一个错误。经验老到的专业政治家们早就想明白了，你早晚也得学会：永远别太在意对手的攻击，这只是大家的工作而已。

眼看党领袖选举的日子一步步逼近，各位候选人间的公开辩论变得愈发剑拔弩张了起来。我记得2006年11月下旬在蒙特利尔举行的最后几场的辩论会上，我的对手之一李博又一次搬出了虐囚的话题，要求我就自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做出澄清，并且声称要是我拒绝澄清，就表明我无法成为加拿大《权利与自由宪章》（Charter of Rights and Freedoms）的坚定捍卫者。看到眼前这位好友也在散播这个陈腐谣言，我不禁怒火中烧。下了台后我俩擦肩而过，他看着我，耸耸肩

说：“这就是政治。”他说的没错，在政治的舞台上，本就没有良心好坏这一说。

你当然可以就对手的恶意向媒体大吐苦水，但他们终究不是裁判，他们只是来看热闹的，当然希望你们打得越激烈越好。正如一位媒体朋友曾经对我说的那样，“我们的工作就是来观察你们之间的战争，待双方开打后再朝着受伤的一方再开一枪”。只要你中过媒体的枪，你从此以往就再也不会怠慢同媒体的一切交往了。你会开始用战略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且从此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形象，就连一根不服帖的头发、一个打歪了的领结甚至是西装上一点点的污渍也不会放过，随时随地准备迎战。同时，踏足政治还意味着你从此必须放弃任何即兴讲话的念头，再也不能享受脱口而出的快感。要想在政治的疆场上存活，就必须在大脑和嘴巴间的通道上装个过滤器，要是你想说的话可能反过来被对手用来攻击你自己，那毫无顾忌的表达自我无疑成了你生活中无福消受的奢侈品。你说的话，正如你的为人一样，都要被保护起来。当然，你仍然可以苦中作乐。实际上，你必须表现得乐在其中，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到一个乐观的武士，尽管每个武士，无论多么乐观，都不得不随时保持警惕。

显然，面对直白的提问只有直白的回答最为恰当，而且，你在回答民众提问时保持率直的态度也是你的义务。毕竟，是他们投票选出了你。然而，和媒体打交道适用的却是另一套不同的规则。记者发布会或采访就好比一场奇怪的歌舞伎表演，不带妆就上场的做法决不可取。必要时，时刻保持战略警惕，在可以接受的范围里开诚布公。正如一句非洲谚语所说，真相虽好，却并非都适合脱口而出。你会试着永不撒谎，但这并不代表你必须回答别人问你的每一个问题，你只要回答那些你想回答的就好。

当你准备向公职身份的要求妥协时，你的内心便开始被你的公众形象重塑。踏足政界不到一年，我开始感觉自己像是被另一个自我控

制了一样。这个完全陌生的自我，常常让我站在镜子前却难以认清镜子里的究竟是谁。我总是穿着哈里·罗森（Harry Rosen）的定制西装（哈里亲自为我量西裤的尺寸），戴着和衬衫颜色搭配的领带出席活动。我这一辈子都没像那段时间穿得那么考究过，我心里却从来没有那么空落落过。回望那段岁月，我真切地认为只要你还存有那么一点表里不一的空虚感，那你的心理起码还算是健康的。当你再也意识不到你面向公众的一面正在侵蚀你的本我之时，麻烦就大了。当你忘记自己原来还有和面向公众的那个自我不同的本我，你的全部生活就会被政治逐渐吞噬。你成了自己那张被政治训练出来的固定的和蔼笑脸。如果这一切真的发生了，那便证明你已失去了自我。

随着2006年12月的悄然来临，辅选团队里的所有人都开始建议我打安全牌，除了尽量避免口误外，讲话内容还必须保持在安全范围内，绝对不能脱稿发言。这或许是个深谋远虑的建议，却让我松懈了曾经坚守的信念。我能感受到自己言语间鼓舞人心的力量正在流失。优秀的政治家和演员一样，都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永葆青春”的长久之计，他们需要不断革新自己的角色。然而，我在党代表会议和募资活动上的表现却越来越像一场每日重复上演的马戏团表演，连我自己都觉得俗不可耐。随着党领袖选举开始进入倒计时，我的竞选团队此时已达数百人的规模，大家都在争分夺秒给各地党代表打电话拉票，而我却开始反思政治家的身份对我的意义。虽然我已经成功让自己成了一名政治家，但我真的不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

我并不希望把这些想法在他人的面前表露出来，尤其是当巧兰和我在蒙特利尔会议中心的接待套间里、在支持者群集的场合上，还有在和其他候选人秘密会面的酒店套间里。可是，政治正是这样一种浸润在各种无耻的魅力之中的游戏。台面上再怎么针锋相对的对手，走下舞台也会坐下来耐心地听你能给他怎样优渥的条件，来让他呼吁支持者把票转而投给你。这便是政治那令人不耻的魅力所在。事实上，我给不了他们任何实际的利益，但我仍然会慷慨地承诺他们，一旦我

当选，便会将某些政府要职委派予他们。这就像是在玩大富翁一样，所有的筹码都不是真的，相互间简单握个手就等于签了合约。我也知道，这个刚和我谈妥握手的人，出了门又会转战下一场闭门会谈，看看其他人是否能够给他提供更具吸引力的职位。要是我没能成功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压倒性的支持的话，这些握手间达成的秘密交易也就统统作废了。要是我获得的支持甚少，那原本支持我的人也会立马转而支持那些势头正劲的候选人。任何一场结局当场见分晓的大会都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赌你能在台上待多久，这就是游戏规则。我的酒店套间还迎接过包括锡克人、穆斯林、黎巴嫩裔和希腊裔在内的国内各个族群的权力代理人，在和我们秘密会谈并互致敬意后，他们也承诺让本族群的所有党代表在选举中支持我。虽然他们这么说，但我知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酒店大厅另一头其他候选人的套间里头也做过相同的承诺。

党代会开始前，我就已经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入到这场战斗中去了。我已经做好了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结果。因此，身处选举现场的我，竟在不知不觉中竟哼起了多丽丝·戴（Doris Day）的那首《世事不可强求》。注我背后那支数百人的辅选队伍仍在大会现场和酒店套间忙碌地工作着，直到最后一刻他们仍在争取各路党代表的支持，并且把分散在四处的支持者聚拢到一起来，防止有人投敌。他们成了我最后的希望。其实选举开始前，我就知道自己注定不会在第一场投票中胜出。虽然我身后有不少热情的支持者，他们也始终将我看作是革新、改变和国际主义的代表，但也有一批人在不遗余力地坚持诋毁我，把我形容成一个来自哈佛的势利鬼、外来的投机精英和小布什的拥护者。类似地，有人欢迎我称魁北克人为一个民族，也有人痛批我是在出卖国家的完整和统一。只要有人被我描绘的未来蓝图所鼓舞，就一定有人会质疑我不够资格出任一党领袖。

当我在酒店套房楼上起草大会演讲稿时，我没有让任何一位顾问站在边上给我出主意。我想在这次演讲里摆脱媒体之前所有的负面报

道，摆脱任何他们曾对我产生的误解。我也不准备引用任何人的话，不管引用正确与否。我只想站在那4500名同我一样的加拿大公民面前，把我最真实的一面展示给他们。我渴望有那么一刻，他们之前对我的所有误解能够烟消云散，我能够让他们再次坦然地接受我，一个真实的我。我渴望自己能在他们的承认和接受中赢得这场党领袖的选举。相信我，假如你是我的话，你也会这样想。为了让我的渴望变成现实，我反复地排练，打磨这篇演讲，试着寻找能使听众心头一亮的最合适的词汇。那一刻终于来临了，当我站在舞台上，面朝被挤得水泄不通的会场发表演讲之时，心中逐渐升起一股解脱的振奋之情：

> 正如我在此前的竞选活动中反复强调的，我们必须是——我们也正是——一个希望之党。然而，希望始于机会。
>
> 让低收入的加拿大人获得更多福利的机会，让原住民能在生活的社区里经营小生意的机会，让人们都能买得起房子的机会，让新移民们能够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的机会，让女性可以免于贫穷和暴力的机会，让农民能安心地将富饶的农田传承给下一代的机会，让老年人能在生命的尾声有尊严地实现他们的加拿大梦的机会。
>
> 既然希望始于机会，那机会就意味着教育。我们的党必须能够有足够的底气向每一个年轻的加拿大人承诺：只要你想接受教育，你就能得偿所愿。
>
> 机会还意味着创新。我们必须要让每一位科学家、研究员、商人和投资者心服口服地朝着我们说：这些自由党人确实有点能耐。
>
> 我们要让加拿大的未来充满更多机会。我们希望的未来，是华裔和印度裔的国人后代能够助我们征服正蓬勃发展着的中国和亚洲市场。
>
> 我们希望的未来，是我们的下一代不必受我们今日欠下的债务之苦的未来，是一个山青水绿的未来。
>
> 只有我们的政府能让污染环境者付出代价，市场才会响应。只有市场响应了，政府也行动了，我们过去的错误才能得到改正，我

们留给下一代的遗产才会是绿色的。

一位优秀的加拿大公民也同时是一位优秀的世界公民。自由党人眼里的加拿大，既是带领国际社会抗击艾滋病的领袖，也是捍卫全球民主和人权的领袖；既是一个致力于提高女性受教育程度、基本保健水平和政府治理水平的榜样，也是一个坚持提升国防能力以保护弱小的战士。

这就是自由党人为何从政的理由，这就是我们坚持的理念：

希望，机会，环保，国际社会的领袖地位。

此外，我们还始终坚守着这个伟大的使命：国家统一。

看看今晚这个盛大的场合！

英语居民和法语居民，都在一起（*tous ensemble*）！

拥有不同信仰、分属不同种族的男男女女们，都在一起！

第一民族[注]的公民们、梅蒂公民们、因纽特公民们，都在一起！

无论你来自东西南北哪个地方，无论你来自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在一起！

都在一起！我流着泪喊道，台下的支持者们也反复呼喊着这句话。无论你身在何方，只要你们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公民，我们都在一起！

人群中有一众我最早也是最忠实的支持者，他们是一支来自怡陶碧谷湖滨选区的队伍。当其他党代表们也纷纷加入开始呼喊这句口号的时候，一位从我的选区赶来的英语居民在一片嘈杂中不断问周围的人："他是什么意思？*Tous ensemble*？他在说什么？"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在一起。

巧兰和我从套房出来，下楼参与投票。你简直无法想象现场有多热闹，只听见会场四处人声鼎沸，纷乱的闪光灯在你眼前闪个不停，一众记者正等着采访你，会场上奇形怪状的人浪轮番出现，一旁的党代表还在边唱边跳康茄舞，现场蔓延着一种集体疯狂的氛围。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人们正准备做出一个严肃的决定。在会议厅举行的投票持续了一整个下午。我沿着正排队等待投票的代表队伍，一一向支持我的代表表示感谢。虽然比我们预想得要糟一些，我们还是顺利地赢得了第一轮投票，并在第二轮投票中占据领先位置。然而，随着对手们开始携起手来，我在第三轮中落后了。李博在先前几轮投票中就已被淘汰，正在犹豫是否要呼吁支持者转而支持其他候选人。得知消息的巧兰和我随即向李博的阵营走去，身边围着一群摄像师和支持者。如果李博站出来呼吁其支持者转而支持我，便意味着我将成为新一任党领袖。我们从孩提时代就已相识，我们的父母也都是挚友。那天下午，我还拥抱了他的母亲，并和他一家围坐在选举现场。我们在大学里曾是对手，他后来拿着罗德奖学金去了牛津，而我去了哈佛。在最艰难的那段日子里，他曾在我家沙发上睡了六个月的时间。他加入了新民主党后，一跃成为安大略省省长，直到在后一次选举中惨败。为了重新出山已经谋划了许久的他，确实是个能力出众的政治家。在他看来，他是靠自己的本事赢来了参选党领袖的机会，而我却不是。

在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关键时刻，政治站到了友情的对立面。我们被一群摄影师团团围住，身边的记者们也举起了麦克风准备记录下我们口中的每一个音节，而一旁4500名党代表则在震耳欲聋地呼喊着，准备见证这个决定性的时刻。就在我踏入李博支持者所集结的警戒范围时，他的哥哥约翰·雷（John Rae）挡住了我的去路。他是前总理克雷蒂安的心腹，为他工作了三十余年。我从小便认识他，我们也共同见证了1968年的党代会将特鲁多选为党领袖的历史性时刻。现在，他就站在我的对面。他是否会同我握手，成了决定我命运的关键。如果他伸出手来，就意味了李博的支持者会转而支持我，我将成

为新的党领袖。可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当时的行为让我目瞪口呆，甚至我时至今日回想起来，仍然心有余悸。只见他张开双臂，双膝微曲，整个人前倾地挡在我的面前，脸上的表情就像个在守护兽穴的猛兽一般狰狞。他龇着牙向我吼道："退后！"我从未见过这样一张愤怒、狰狞、急切地想要保护身后人的面孔。这种原始、激烈、充满兽性的想要夺取胜利的渴望以及失败后的表现，在任何对政治的真实记录中都必定会出现。我往后退了几步。看来他们两兄弟得不到的，我也得不到。李博的辅选队伍随后放出了原本支持他的代表选票。第四轮投票结果出炉，魁北克人斯特凡·狄安当选新一任党领袖。他众多胜任领袖职务的品质还包括了这样一条：他既不是李博，也不是我。

结果甫一公布，巧兰和我便立刻穿过会议厅，一路上满是杂物纸屑以及被丢弃的加油棒和标语牌，来到酒店的一间宴会厅，惊魂未定的支持者们正聚集在此等待我们。我随后站到一个椅子上向大家致谢，但我已记不得当时具体说了些什么，只记得一个自始至终支持着我们的年轻魁北克小伙子马克·根德隆当时趴在巧兰肩头泣不成声的场景，还有我们那一向禅宗般冷静的助理马克·查理福克斯一双噙着泪的眼睛。

至于我们俩，在败选面前并未流泪。政治本就如此血腥、刺激、危险。我们已经尽全力地完成了这场战斗。那天晚上，我们在会议中心楼上的酒店房间里分享了同一份晚餐和同一杯红酒，而此时，党代表们已纷纷登上了回家的巴士、火车或飞机，四散在国家的各个角落。我们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的外行人已经尽力了。我们尝试了，但我们仍然没有准备好。如果还有一次机会，我们依然会站在这里，鼓足干劲，在命运女神面前再一次奋力一搏。

---

1. http://www.elections.ca/content.aspx?section=fin&dir=lea&document=index&lang=e；http://www.elections.ca/content.aspx?section=vot&dir=faq&document=faqelec&lang=e#a15；

http://www.fec.gov/press/press2009/20090608PresStat.shtml；
http://www.opensecrets.org/news/2012/10/2012-election-spending-will-reach-6.html.

2. 2006年的法案仍然如此规定，2011年开始哈珀政府逐步取消了按获得选票比例获税收作为选举资金补贴的规定，并进一步下调了政治献金上限。

3. 参见美国最高法院“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2010，http://www.supremecourt.gov/opinions/09pdf/08-205.pdf。

4. http://www.nytimes.com/2009/08/11/opinion/11tue4.html.

5. 参见Michael Ignatieff，Isaiah Berlin：A Life（London：Chatto，1998）。

6. 两国方案（two-state solution），即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实现持久和平共处的方案之一，该方案主张居住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自建立两个不同的国家。——译者注

7. 参见Michael Ignatieff，“Canada and Israel：A Personal Perspective on the Ties That Bind”，在多伦多圣花犹太堂的演讲，2008年4月13日。

8. 歌曲原名“Que Sera Sera”，为希区柯克电影《擒凶记》（1956年）插曲。——译者注

9. 第一民族（First Nations），指现今加拿大境内的北美洲原住民及其子孙，他们与因纽特人、梅蒂人一起组成了加拿大原住民。——译者注

第六章 责任与代议

从古罗马农民辛辛纳图斯（Cincinnatus）丢下手中的犁去救共和国于危难之中的那一刻开始，许多局外人便由此踏足政坛，并把自己描绘成一反传统政治家的形象，以拯救政治自居。在这场选举里，我便是那个古罗马农人，只是离当选还差了几百票。选举收尾后，我回到首都继续履行议员的职责，但是这次我不能再表现得像之前那么业余了。如果你以为你比圈内人更好，甚至你真以为业余选手有可能打败专业选手，那你就错了。毕生从政的专业人士之所以能够玩转政治，是有理由的。当今大部分政治家在二十多岁时便踏入了政坛，从幕僚开始做起，在四十岁不到的时候开始参加竞选，几乎一辈子都在政治的世界里活动。我本以为政坛也可以有外行人的一席之地，但事实证明我错了。但这并不是说局外人不可能在政坛取胜，巴拉克·奥巴马就亲身证明了这一点。但是要知道，他的胜利取决于多种因素，首先是他曾在伊利诺伊州参议院工作的经历，其次是初涉政治便敢仅凭此前学到的基本技能同内行竞争的勇气，并成功地将年轻人和少数族裔动员起来，并且通过社交媒体来吸引他们参与竞选，而这两个群体曾经长期被民主共和两党所忽视。当我在2006年参选时，距离奥巴马那场精彩绝伦的选战还有两年。当时，我们还没见过有哪个局外人能够赢。

我们的党始终把我看作是个局外人，并未认真对待过我，所以最后选择了一名经验老到的内行作为党领袖也并不奇怪。新的党领袖斯特凡·狄安从政已有整整10年。他在1995年魁北克独立公投时便已崭露头角，当时他同魁北克分离主义者的激烈辩论让人们被他独到的眼光和信念深深折服。投入党领袖选举前刚刚卸任环保部长的他，不得不

在选战中背负民主党政府没能履行有关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给他带来的压力。在多伦多的一场辩论上，我曾就这一点向他提出质疑：“我们确实没做到，斯特凡。”我没有继续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所以我们之间也并未太过剑拔弩张。他这次参选，不仅通过大打环保牌吸引来了一大批年轻的支持者，而且还不断劝党内精英们说，选择一个有经验的老手对他们而言更为安全，由此才夺得了党领袖的宝座。如今选举已告一段落，曾经的对手现在不得不成为互相的盟友，这也是政治的常态。顺便提一句，这一常态同样常常为媒体和民众所误解。选民们看到昔日互相攻击的对手如今又携起手来共事，或许会在道德上产生一些困惑：这样一来，何来忠诚、信念和原则可言？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s）曾在一本研究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内阁的书中提到，除非来自不同党派的竞争者能够撇开偏见，或者至少能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撇开偏见的姿态，并且学会以一种“对手团队”（team of rivals）的姿态运作，否则该执政党必然无法成功掌权。[注]这么做的过程中必然需要丢掉许多傲慢和苦痛，然而有时，就像在林肯身上发生的那样，对手也会少见地承认对方作为众人领袖的角色实至名归。

败选并未给我带来太大的打击，但我知道未来还要在这位其基本政治直觉无法让我立刻点头认同的领袖手下，作为一名在野党议员工作好几年绝非易事。我当时可以选择就此收手，认定自己从政就是个错误。就在我败选后没几天，肯尼迪学院的院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问我愿不愿意继续回去执教。我没想到他比我预想的还要关注我在加拿大的情况。感动和惊讶之余，我向他解释说，自己当初是真心实意下决心回国从政，况且怡陶碧谷湖滨的选民们已经选举我为他们的代表了，我必须履行我的职责。当然，我选择留下来还有其他原因。我认为党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我常在机场碰到有人对我说：“当选的应该是你才对。”这让我时常觉得我应该为人民的嘱托留下来继续奋斗。因此，我在党代会之后见了狄安一面，主动要求出任他的副手。党的副领袖的唯一任务就是在党领袖缺席的状况下替他在众议院出席每日

例行的质询时段，带领反对党对政府提出种种质疑。狄安在选举中以微弱优势胜出，并没有强有力的民意基础，所以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他勉强答应了我的请求。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他总是尽量避免让我知道太多内幕，所以，尽管我们此后屡屡在演讲时提到要建立一个对手团队，但实际上我们从来没能成为一个团队，只是对手罢了。但这就是政治常见的结局，如果我坐在他的位置上，或许也会这么干。总之，我在他面前总是透明的。

我的辅选队伍估计狄安将无法在下次选举中再次获胜，因此力劝我留下，等待属于我的时机。我们知道这次的对手里起码还有一人也会再次参选，那便是李博。我们赞成先将继续参选党领袖的计划保密，因为政党必定会对党内的阴谋分子做出惩罚，或至少是那些阴谋太过张扬的人。像一个出色的战士一样，我刻意掩饰起眉宇间的紧张，神态自若地跟在我们的新领袖身后。我会为他的讲话热烈地鼓掌，也会给他提一些大多会被他无视的建议。我从来不在他面前表现出任何不满，也不会将我对下次选举的企图表现出来。安大略省的冬天寒风凛冽，每天清晨，我都得步履艰难地爬上国会山，经过正等着救世军旅馆开门的瑟瑟发抖的醉汉，再回过头朝站在公寓楼第13层窗边的妻子挥挥手。接下来的一整年，我走遍了全国，在高中的体育馆里、人们的客厅里和教堂的地下室里同各地忠诚的党员亲切交谈，既为了给他们打气，也为了我自己。人们并不知道，其实领袖人物自身的精神面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仰赖基层党员群众的态度，需要仰赖他们坚持在一个下雨的周五夜晚出现，为你鼓掌的意愿。当你所在的政党成了在野党，能够支撑你继续前行的便只有那些对党矢志不渝的忠诚党员们。你手上既没有权力委派官职，也没有向党员汇报你在议会推动议案通过或在国际舞台上同他国领导人会面的机会。只有信念，坚信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就一定能反败为胜的信念，是你手上唯一的筹码。

除了团结人心外，我还得想办法偿还竞选时欠下的超过一百万加元的债务。为了募资还债，我们一位位地拜访各路金主，前前后后一共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还清了债务。这期间还发生了许多滑稽的和不那么滑稽的插曲，比如，在蒙特利尔和几名魁梧结实的建筑公司老板们共进晚餐那次，尽管他们身上散发着温暖又粗犷的魅力，可是我的心里仍在不停打鼓，怀疑自己要是在饭桌上惹恼了他们，我的脚会不会被他们灌上混凝土，然后从此无法动弹。另外几次的募资，让我隐约感觉到了家财万贯对于人们个性的影响。有一次，一名靠采矿发家的亿万富翁约我在多伦多的一个被雪覆盖了的停车场见面。12月的多伦多午后，明媚的阳光终究抵挡不住刺骨的寒风。当我到了约定见面的停车场，试图寻找一辆宾利或劳斯莱斯的时候，却只看到停车场的尽头停着一辆1988年的老款克莱斯勒，我上前绕了一整圈后才决定伸出手去敲窗。只见一个身材魁梧、穿着派克大衣的男人推开车门对我说："走，我们去兜风。"我当时穿着自己最名贵的大衣、西装和领带，脚上是一双刚上了光的皮鞋，而他穿得则像是要去远足一样轻便休闲。我们沿着多伦多当地一个深谷四周陡峭的木质斜坡一路往深处开去，他一路上不断向我厉声发问："你为什么想做总理？"要是他不喜欢我的回答，就会厉声对我说："再试一次，你能说得更好。"一路上，他就这样咆哮着问一句，我磕磕绊绊地答一句，直到他对我的答案表示满意才罢休。当我们后来回到停车场，我已被冻得瑟瑟发抖，而他依然容光焕发、满面春风。这就是政治吧，当我目送他开着那辆老旧的克莱斯勒远去时，心里不禁如此感慨。正是在许多如那次一样古怪的会面中，我还清了所有债务。

除了还债，我还必须对选我上台的民众负起责任。你在国会山众议院附近那个用实木墙板装饰的屋子里宣誓就职的时刻，心中的责任感便会油然而生。让我惊讶的是，我们的誓言里竟然没有只字片语提到投票给我的人民，而是像其他所有英联邦国家一样，全是关于对女王与其子嗣和继承者效忠的话语。我在"子嗣与继承者"这部分停顿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对加拿大而言，现在是时候决定是否要在女王离世

后不再尊英国王室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了。就算届时我们决定延续这一传统，也必须在议员的就职宣誓中加上对人民效忠的话语。其他和我们情况相似的民主国家就有这样的做法。虽然我真心实意地敬仰女王陛下，但我不认为我需要效忠的只有王室。我们现行的宣誓制度不但没有拉近作为人民代表的议员和人民之间的距离，反而疏远了两者。没能在誓言中表示自己对加拿大宪法的拥护和对人权的捍卫，对我而言似乎是一种遗憾。

宣誓就职后，我终于得以在众议院那个属于我的议席就座。在所有民主国家的首都，人民代表所工作的议院都是那样的宏伟壮观。我们的也是如此：高耸的新哥特式屋顶，壮观的彩色玻璃，为300名议员精心雕琢的座椅和书桌被中间一条铺着绿色地毯的走道分隔开来。议事厅最中间摆放着象征议会权威的权杖，而走道的尽头则是专属于众议院议长的座席，后上方挂着加拿大国徽。众议院议事厅四周设有一圈供媒体和民众落座的旁听席，媒体的特定旁听席在议长身后，他们可以观看和报道辩论环节。

还记得我第一次走进众议院时，大厅只有两位在做清洁的女士，一位忙着在绿毯上吸尘，另一位则把一张张议程单丢进一个黑色塑料袋里。我独自坐在偌大的议事厅中看着周遭的一切，回想起1941年12月温斯顿·丘吉尔在此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就在这间大厅里，丘吉尔曾这样说道："我之前就已告诫他们（法国），无论他们做什么，英国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战斗下去。法国人的将军告诉他们的总理，三个礼拜之后，就算英国会像小鸡被拧断脖子一样被摧毁，那也会是难对付的小鸡、难对付的脖子！"(注)

在与众议院一墙之隔的议长室，尤素福·卡什（Yousuf Karsh）为丘吉尔拍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被夺走雪茄的丘吉尔胖乎乎的面孔上写满了被公然违抗的愤怒，这后来成了他标志性的形象。这幅照片至今仍然挂在议长室，常会有议员前来与其合影。

这里也见证了历任加拿大领袖在许多关键历史议题上的唇枪舌战，包括对组织叛乱的路易斯·瑞尔（Riel）的处决（1885年）、使加拿大英语和法语人口决裂的征兵危机（1917年）、是否参加“二战”（加拿大于1939年决定参战，早于美国两年）、是否修建输气管道（1956年），以及如何应对魁北克分离主义（1980年和1995年）等问题。时至今日，他们当年慷慨激昂的陈辞仿佛依然在议事厅上空回荡。除非初出茅庐的议员会带着敬畏与尊重走进议会履职，除非年轻人会憧憬有朝一日能在议会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否则这个国家的民主没有任何健康可言。议事厅外的大堂里，有的议员正坐在沙发上休息，有的正在打电话，有的在接待自己选区的选民，也有的正在背诵讲稿，乍一看就像是来到了一个绅士俱乐部。然而，当你回到议事厅，便会马上意识到你并非什么俱乐部的成员，而是一名民意的代表。你身处此地就是为了替人民发声。

每次在议会大堂里和民众会面时，我都会告诉他们，这里是属于他们的议会，是属于人民的议会。我坚信人民才是议会的主人，这不仅是因为人民为议会的运转缴纳了税收，为议员的产生贡献了选票，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理由。这个给“我们”下定义的过程，正是在政治的世界里完成的。公民应为他们获得的公共服务纳税多少，如何监管各类市场，如何在不牺牲公共利益的同时满足某一特定群体的利益等等，通过在这些富有争议的问题上做出成百上千次的决定，我们才建构了“我们”的概念。议会的走廊见证了上千个这样的决定、妥协或协议的诞生，也见证了这些不同的结果是如何在信息不对称、互相怀疑和欺骗的背景下艰难达成的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每个人的生活被缝合了起来，构成了让我们得以共存的公共生活。我们都在说服他人妥协，也都在严守曾经向他人做出的妥协。可是，除非你的对手对他人的劝说持开放态度，否则妥协便不可能存在。[注]对我而言，如果不是民主的浪漫引发了我对政治无边无垠的想象力，一个和我一样的人是断然不会放弃原先在学界舒适的生活跑来众议院工作的。

在我从政的岁月里，我确实曾经无数次见证民主劝说发挥作用。在党团会议上，常能看到我的同事们站起身来就他们在选区看到的某个问题与大家进行讨论。有好多次，我在听了他们的阐述后对讨论的问题产生了改观。在工会礼堂、教堂地下室和市厅之类的其他场所，我也亲身经历过民主劝说发挥作用。时常会有民众站起身来拿着麦克风，向我抱怨这个或那个联邦项目的实施过程有多糟糕，如果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我也会向人们承诺他们所说的问题将会得到解决。人们相信政府的工作制度，也希望政府能有效地运作。所以，以我之见，我不认为我们的民主已经病入膏肓，至少依我之见，它正健康高效地在人民的心中运转着。可是，在本应是一国民主神殿的众议院，民主却无法有效践行。我不记得我在任的五年内有听过任何一场真正以说服他人为目的的演讲，可是我却听过不少照本宣科地重述着党所要求的发言重点的讲话。这正是政党纪律中贻害无穷的地方，它时刻威胁我们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比起用选票亲手把我们送进议会的民众而言，我们更应为自己的政党代言。

在任何和我们类似的议会体系里，党纪对政治行为的掌控都是不容小觑的。我从政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事和社会关系都是自由党人，甚至，当我过完周末准备搭飞机返回首都工作时，在登机口前的队伍里和我搭讪聊天的也都是自由党人，就算一位其他党派的议员和我一起站在登机队伍里，我们之间也不会有什么热络的交流。当我后来离开政坛才意识到，原来身边也有不少优秀的保守党人和一大批正派的新民主党人，荒谬的是，当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我竟然还有些惊讶。想当初，我们面对面坐在众议院里，从来没想过要浪费任何一丝力气去说服对方任何事情。党鞭[注]早已决定了这场投票的票数多少，我们只要能够压过对方的声音，并且冷嘲热讽地尽量灭对方士气就算完成了自己的工作。难怪特鲁多总理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著名的话，下了国会山，大多数议员都只是无名小卒而已。[注]我一直很讨厌这句话，因为它既傲慢，又对民主嗤之以鼻。可问题是，这句话里也

包含了一定的事实成分。至于如何解决，其实不难想象：给议员以更大的投票自主权，各议会委员会可以摆脱政党束缚自由选择本委员会主席、决定本委员会事务，限制总理随意解散或重组议会的权力。这些措施势必会让被“松绑”了的议会和议员们的行为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但是也可以让议员们更加实实在在地代表人民发言。

在众议院的工作让我观察到加拿大的一大民主特点，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极具加拿大特色，那就是由吉勒斯·都赛佩领导的、支持通过全民公投决定魁北克独立以及加拿大分裂的魁北克集团在议会的存在。如果不是真心热爱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恐怕你很难和一群不愿意承认和你同属一国的议员们同处一室。他们不但拒绝说任何除了法语以外的其他语言，也拒绝在就职宣誓时向女王效忠。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是出色的议员和优秀的同事，也是值得选民信赖的好代表。这个民主的殿堂宽容到可以允许如此极端的分歧存在，却仍然能够彬彬有礼、互相尊重地运转，这一点直到现在都让我引以为傲。

在其他方面，我们的民主恐怕就没那么有吸引力了。质询时段总是会让那些特地远道而来旁听的人民大吃一惊。和相扑一样，质询时段是一项被精心设计过的仪式性的对抗活动。每天下午两点一刻，政治家们准时涌入议事厅，随即开始45分钟的质询时段。这45分钟可以成就、也可以摧毁一个人的仕途。一组问与答的时间不得长于35秒，每位议员最多只能额外多问一个问题。议会传统上要求议员的问题起码有一半是以法语提出。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我无数次在议长、旁听席上的民众和电视机前观众的共同关注下同政府对决，有时还要面对总理本人。与美国总统不同，加拿大总理需要每周至少参加一次质询，这样的设计可以在理论上有效制约总理的权力被滥用。然而在实际运作中，情况和预想的大相径庭，浪漫的代议制民主和残酷的现实在此分道扬镳。经过数代人的运作，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的权力已经从立法机构的手里流向行政机构、官僚机构、法院和媒体。加拿大也是如此，任何一位反对党议员在每日质询一开始就能明显地感受到这

一权力的流转。在过道另一边的政府首长，面前总会有一个活页夹，幕僚和属下早就为他起草好了任何可预知问题的答案。可是，对所有反对党议员而言，他们只能仰赖媒体报道、廊间闲话或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才能获得关于某一议题的足够讯息，甚至有时还不得不靠一些不满的公务员故意泄露的、可以表明某位官员未能尽职的资料才行。如此信息不对称，让反对党在质询中总是处于劣势。其实，只要给予他们更多的资源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在德国，政党普遍设有属于自己的研究基金——但在我们国家，从来没有哪一任政府有任何实在的动机去提升议会民主制的质量。我们的政党更在意的是，如何在掌权时强化自己的信息优势从而掌控立法议程。这就需要一名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人物，给予负责制约行政机关的立法机关更大的权力。

这个问题到了那位想要施技迫使众议院就范的总理手上就更加严重了。哈珀先生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是因为他本就性情多变，喜怒无常的他时常被个人生活牵着鼻子走，另一方面则出于他对形势的战略谋划。他领导的保守党并未在众议院中获得足以使其成为多数党的席次，所以他始终坚信，要想守住总理宝座，就必须在众议院尽可能保持独断才行。因此，他从来不会正面回答他人的质疑，要是有人胆敢质疑他的做法，他就会反过来质疑提问者是否真正爱国。打个比方，我们的反对党同事曾不止一次地就加拿大军队如何转移阿富汗籍被拘留者至阿富汗本土的关押设施的问题，向总理和他的内阁部长提出质疑，但他们每次都会站起身来，指责我们这是在同情塔利班。还有几次，当我们质疑政府为何在犯罪率持续走低的当下，加大监狱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投入时，内阁部长们反过来指责我们对谋杀犯和强奸犯太过软弱。如此无休无止的党派斗争本不是总理唯一的选择，他明明可以寻求和我们反对党合作，鉴于我们在2006年选举中元气大伤，两党合作本来可以顺水推舟。后来有那么几次，我们也确实实现了合作。2007年11月至12月间，乔克里弗核反应堆被迫关停，这使全球许多癌症治疗医院一时间无法获得足够的治疗用放射性同位素，我

们在议会力促有关方面达成妥协，最终成功使核反应堆得以重启，并恢复面向医院的同位素供给。2008年，当我国驻阿富汗军队服役时限即将期满之时，我帮着起草了一份妥协方案，决定将驻军的首要任务从作战转为训练，并明确了最终撤军时间。妥协在这些案例中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在这些议题上有着相同的利益诉求。当时政府也在想尽办法从阿富汗的乱局中撤出，我们也是，而且我们双方都有意不让从一开始就不同意加拿大向阿富汗派驻军的新民主党牵扯进来，以免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这些达成合作的瞬间，是我在议会工作时最为享受的时光。可是，我清晰地记得，总理有一次在质询开始前的间隙单独跑来找我，当时我为了解决医用同位素危机已和总理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他在我耳边轻声说了一段话，大致的意思是告诫我，我已经从这次危机中得到能够得到的所有好处了，不应再在这件事上纠缠不清。当我问他是不是在威胁我的时候，他生硬一笑，转身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在接下来的质询时段，他重新与我兵戎相见，暗示我继续表现出双方往常的敌对状态。

他是一个天性极端好斗的人。狄安正式出任反对党领袖没几个月，哈珀便仗着手上充裕的资金支持，在全国主要商业网络展开了一场以贬低狄安形象为目的的负面宣传攻势。还记得我在党领袖竞选时曾对狄安提出质疑："我们确实没做到，斯特凡"，他回答称当时的领导层也很为难，哈珀便充分利用了我们的这段对话，在所有保守党的宣传广告里都加上了这句话："斯特凡·狄安，他做不了领袖。"一名在位的少数党政府总理在非选举时期向反对党领袖展开这样的攻击，是史无前例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永久选战的苦头。这场攻势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的民调支持率立刻直线下降，这让众议院的保守党籍议员的议席得到了稳固：我们当时还不准备冒险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把国家拖入一场新的大选。总理残酷的党派攻击大获成功，但成功的代价便是迫使众议院的工作氛围逐渐变质，让议会与人民之间的距离进一步加大。

频繁地同总理对质并非易事，但要想故意惹恼他、打乱他的计划、或者给他下套让他犯错，虽然很难，但也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说实话，他不是个一无是处的总理：他顽强、自律、做事毅然决然。他时常给人留下意志坚定的印象，虽然你看到的他或许只是在盘算如何摆脱一个对他不利的政策而已。能将表面的意志坚定和内心完全的投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个令人咋舌的天赋。做了五年他的对手，我不得不佩服他的老谋深算。在时机适合的时候，他主张精简政府机构；当经济萧条来临，他又开始大肆扩张财政赤字。在野时，他曾坚决地反对流产和同性婚姻；上台后，他又开始耍小聪明，故意向公众承认自己已在价值观斗争中败北，因而得以顺理成章地转换立场。他每一次转换立场，都能牢牢地抓住背后那一大群包括民粹主义者、宗教极端分子和右派空想家在内的乌合之众的颈背，把这群人锻造成一个给他投票、让他得以胜选的机器。这确实是个不小的本事。他在众议院也开始变得愈发自信起来，因为他知道背后的议员们都完完全全唯他马首是瞻。

偶尔几次，我在和总理或某位内阁部长对质时占了上风，一走出议事厅便有几位议员同事围拢在我身边，在我背上轻拍一下以表支持。要是我大获全胜，当晚的新闻画面或许还会出现我的身影，而我也会抱着我们而非政府势头正劲的信念而结束这一天。要是我没能给对方以沉痛一击，记者席里的记者和我自己的党团成员便会开始压低声音抱怨我这拳打偏了，让政府这下有机可乘了。每当质询时段结束，我要同从旁听席上下来的选区选民会面时，都能看到他们脸上写满了惊讶，方才问答双方间肆意的侮辱和嘲弄时常让他们感到无法接受。大部分议员早就习惯了议事厅里的各种声响，所以有时只有通过选民的提醒才会意识到质询时段的议事厅有多么刺耳。我的访客们，尤其是女性，时常会在旁听质询时段后不禁对其产生反感。确实，质询进行时，双方的面孔常因互相嘲弄和讥讽而扭曲，整个过程既幼稚又令人不快。如果要我说自己从政的这些年里有什么事是最能彰显政治与人民之间的鸿沟的话，那非人民旁听议会质询时段后的反应莫属

了。对于政治家而言，这是再正常不过的日常工作。对选民而言，这就像是一个失控的幼儿园。政治在公众心目中的遥远、残酷、多变又血腥的斗兽场的印象，或许永远都无法改变。但这也情有可原，因为政治看上去确实如此，至少在有的时候。

可是，一名优秀的政治家应当明确地知道这条鸿沟究竟有多宽，应当知晓在国会山下的民众即便厌恶又警惕一时的政治斗争，也会很快忘却这种感受，重拾此前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如何应对现实政治与普罗大众之间的距离，是对政治家工作艺术的考验。政治家需要在民众对作为一种职业的政治感到厌恶的情况下，进行协调、谋求平衡，争取他们的信任。在你真正成为人民的代表后，你会发现你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向选民证明你并未忘记他们的嘱托而去投入一场对他们无益处可言的生存游戏上。为了打消他们的疑虑，你会尽量多地参加选区内举行的各种社区花园派对、家校联络会、剪彩仪式和学校的颁奖典礼，从而向选民释放信号，表明你并未脱离人民而去臣服于一个异化的政治世界。你之所以可以排出紧凑到不可思议的日程，之所以可以完完全全地放弃自己的私人生活，之所以会夸耀自己每个周末参加了多少场选区活动，都是为了向你的选民彰显你的“存在”（presence），为了证明你只对他们忠诚，并且和在首都上演的纸牌屋划清界限。然而，即便如此，作为民意代表的议员和选民之间的鸿沟仍然不可能被填补得严丝合缝。你和选民既无法打破信息不对称和时空差异的障碍，你们心中顾虑的事情也不完全相同。我们可以大致把所有的政治议题分为两类：一类是只有政治家、某些媒体内部的小团体和关心政治的党派支持者才会关心的议题，另一类在数量上要比前者少得多，却是和普罗大众密切相关的议题。要是弄混了两类议题的差别，你可能会毁了自己。

诚然，众议院是属于人民的，但人民未必总会对众议院内发生的事情那么感兴趣。举例来说，我们曾试图将总理对国会昭然若揭的蔑视公之于众，但并未引起公众的太大兴趣。我们明确指出，哈珀故意

将原本应当区分开来一件件讨论的议案一股脑地全部放到同一个财政预算案里提交议会审议，使整个文件长达数百页纸，让针对这一议案的投票成了对政府的信心投票，这意味着如果众议院最终否决该案，他便会即刻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选举。这类“垃圾议案”（Dumpster bills）强行将许多极其琐碎的法律条款变更捆绑到一起，其中不乏一些理应单独经议会充分讨论的重要事项，导致议会无法就其中的所有事项进行充分的辩论、审阅、评估及修改。归根结底，政府的行为已经严重阻挠了我们作为国家立法者的正常履职。政府的行为让议会骑虎难下，我们要么被政府牵着鼻子走，要么就与政府彻底对着干，我们认为这样明目张胆的行为是对加拿大民主赤裸裸的亵渎。另外，总理至少两次在议会休会期间解散议会的做法同样违背了民主制度的惯常做法。我们自由党人尽最大力量表达我们的不满，为了对抗总理解散议会的做法，大约十万名来自各党派的加拿大人，由自由党牵头，联名请愿抗议总理解散议会，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未能说服更多的普通民众参与到我们的请愿行动中来。选民基本不会理会政治家在当选后的鸣冤叫屈，只会怀疑他们是在无病呻吟，而且选民还会觉得既然他们选了我们作为民意的代表，我们就应该继续撑到下次选举的时候再来向他们汇报。这也是许多奉行代议制民主政体国家的选民们一个共同的理念。[注]所以最后，无论我们如何挺身而出想要捍卫议会的权威，捍卫议会要求政府递交补充资料与文件的权力，捍卫议会应当拥有的辩论、审阅和修改法律的权力，捍卫议会履行议会民主制规定的职责的权力时，公众充其量只会伸个懒腰，对我们视若无睹。对选民而言，其实他们不仅得不到他们应得的民主，而且最后还不得不为自己的政治幻灭埋单，公众得到的是由他们选出的政治家强加到他们身上的民主。

只有一小部分的立法过程能看得出议员作为人民代表的身份。大部分时间，出色的代表们都在自己的家乡“耕耘选区”（working the district）。我的选区办公室临街而设在城市主干道，每天都有大量人流进出。我的选区助理玛丽·凯瑟和她手下的团队时常会把我的一整天

安排得满满当当，让我有机会和当地社区的各种利益攸关方见面，我也因此听到了各种各样组织团体的呼声，包括兰普社区健康中心（LAMP Community Health Centre）、各类妇女庇护所、“职业起航”（JobStart，一家当地的求职培训机构）和每日面包食品银行（Daily Bread Food Bank）等等。与这些组织负责人的会面让我对现代社会中社会安全网络建构的重要性产生了一定的认识。这一网络从结构上看起来摇摇欲坠，由许许多多体量小又缺乏资金来源的组织构成，各个单元在互相竞争的状态下维持着网络的动态平衡，每一个组织都在试图获取更多资金，同时适应不断变化的经营环境和目标客户千差万别的需求。成为一名民意代表就意味着要能够理解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力所能及地为他们筹集更多的资金，并且聆听这些站在第一线的组织，如何帮助移民、失业人员和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奋斗故事。每一次从日常的政治工作中抽出时间来与他们交谈，都会让我对他们产生无上的敬意。正是这一个个意志坚定的个体支撑起了一座现代城市的社会服务网络，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宝贵的职业生涯倾情投入，我们的社会结构才能得到修补和更新。

作为一名人民的代表，还意味着我必须要代表人民和机能不全又冷漠无情的政府机关对抗，这一点也是我从政后的一个主要发现。作为一名公务员的后代，同时又是一名自由党人，刚发现这个问题时，我大吃一惊，但它同时也点醒了我。每当有民众走进我的选区办公室，向我们倾诉他们遇到的各种问题，例如护照签发延期、签证申请被拒、缴税文件丢失等等，我们会立刻拿起电话试着帮他们解决。这就是为什么每一位议员都必须在各自的选区有一支熟悉本市、本省乃至联邦政府官僚机构的团队为其效力的原因。多亏了我背后这支出色的团队，我们才得以在任内解决了上千件选区民众遇到的难题。每当我们为某位乡亲在某个政府机关处解决了一件棘手的难题，对方眼里噙着泪向我们表示感谢。事实上，作为人民的代表，就是时常要扮演民众的咨询师、理财顾问、家庭律师和心理治疗师等各种角色。

建立一个能干的政府始终是自由党人的信念，但我们也时常因为过度迷信我们良好的本意而犯错。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的现状，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政府做事常常过于拖拉、武断且效率低下。一位想要享受政府服务的公民所要求的并不是什么过分的特权，而是其应得的权益，但我却常常从跑来我们办公室求助的公民脸上看到畏惧的神情，政府机关那些如迷宫般复杂的规则已经超出了他们的理解范围。他们手里总会牢牢地抓着一些他们理解不了的文件，口中不断重复着此前某位公务员向他们表述的某些语焉不详的指南。向我们寻求帮助的人中，有一些人确实束手无策，但大多人数人只是对那个声称为其提供服务的政府之行为感到沮丧。

与此同时，选民们常常对于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有着超出我实际能力的过高期待。作为一名反对党议员，我能做的实在有限。在野的我们面对选民的需求，只能低头向执政的保守党内阁或其手下求助，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会高风亮节地出手相助，但也不排除有人拒绝帮助除保守党支持者外的其他选民的情况。我们的团队向政府提出的绝大部分诉求都与移民问题有关。正是在移民问题上，自由党人的理想主义愿景和政府机关的官僚主义现状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加拿大每年都会接收近二十五万的新移民入境，因此常年有着大量的申请积压，我们的公民和移民部（Citizenship and Immigration Canada）㊟似乎已经因此不堪重负。我时常需要接待一些向我提出签证诉求的选民，他们希望能和来自印度、巴基斯坦或中东的亲人在加拿大团聚，同他们一起参加亲人的洗礼、婚礼或葬礼等重大仪式。所有有关的签证申请都由签证官自由裁决，因此有关的签证决定时常显得有些武断，甚至不合情理。我们党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便开始打开国门，欢迎来自多元文化背景的新移民来到加拿大安家，也因此在国内得到了民众的广泛支持。但我们当时却没能简化签证审批中那些令人困惑的繁琐程序，才导致了今日许许多多少数族裔家庭因为签证原因无法实现团聚。对这些群体而言，想要享有多元文化公民身份，不仅十分昂贵，而且程序复杂得令人难以理解。有这样一对印度裔姐妹

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她们两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护士，希望我们能帮助她们把远在印度的双亲接到加拿大安度晚年。起初，她们准备自行为父母申请签证，因此特地回到印度带着两位老人参加体检和移民面试，可是她们此后等了很长一段时间也没盼来父母的签证。最后，还是由我直接出面向移民局局长陈情才让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拿到了签证，如愿来到加拿大和两个欣喜若狂的女儿团聚。可是，到达加拿大一周后，两姐妹的父亲便去世了。从开始申请到最后拿到签证，他们一家花了整整六年时间。如此悲伤的结局确实怪不到任何一个人的头上，但它在政治上给我们的启示却是令人揪心的。后来，两姐妹还给我的同事送来了鲜花，向我们给予的帮助表示感谢。我们这些一向笃信赋权政府（empowering government）的自由党人，实在难以接受政府对公民如此的苛难。政府怎么可以让公民为了一张签证而向其求乞？怎么可以让公民在政府机关门前大排长龙而漠不关心？怎么可以让公民在政府智能电话系统的那头无休无止地等待？又怎么忍心让公民日复一日守在信箱旁等待一张迟来的退休金或失业救济金的支票？在同政府打交道时屡屡遇挫的选民，开始拒政府于千里之外。要是政府不懂得如何带着敬意面对他们的公民，公民自然会觉得离政府越远越好，毕竟他们和政府纠缠越少，需要缴的税也就越少。在这个螺旋下降的过程中，保守党政府才是唯一的政治受益者。他们除了削减政府服务事项以降低税率外，就从未提出过任何实际的解决方案，何况他们所削减的都是政府应当提供的必要服务。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他们确实注意到了民意变化的风向，而我们自由党人却还没有。

2008年9月，已经掌权两年半的哈珀先生认为他此前针对反对党领袖展开的舆论攻势足以动摇原先的民意基础了，因此宣布解散议会并将择日举行大选，以期能够一举组建一个多数党政府。虽说这是总理的特权，但他的这一做法已然打破了他当初对于固定大选日期的承诺。我们曾在竞选时试图将他塑造成一个美国右翼空想家的形象，而他实际上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事务性投机分子，除了对权力的追求，没

有其他固定的立场。在他自己的竞选广告里，他将自己无情好斗的领袖面貌彻底藏了起来，以一个穿着毛衣、热爱冰球、站在壁炉旁满面笑容的慈父形象示人。

大选期间，正值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产、保险业巨头机构客户集团（ICG）崩盘和全球储蓄、养老金和投资出现巨大亏损的多事之秋。此前早已有人发声，对次贷泡沫的危害和房价高居不下的不可持续做出警告，但人们却把它当作了耳旁风。这场危机让包括我们在内的全球所有政治家们大吃一惊。当我们仍在各自首都乐此不疲地玩着政治游戏、搞权力斗争的同时，殊不知，全球经济已亮起了警戒的红灯。

国际金融危机突如其来，全球股市随之暴跌。总理的政治直觉显然误导了他的判断，他竟然建议人们把握时机捡漏，找些便宜的项目投资，这件事后来被人传为笑柄。不幸的是，我们也并没有比他好到哪儿去。危机来临之前，我们便开始提议要征收碳税（carbon tax），这本身是个好政策，但金融市场在一夜间的崩溃让它沦为了一个政治失误。当我在选区内寻求连任时，我的选民们给我上了一堂有关气候变化的政治课。有一次，一位正在将车倒出车库的女士见到我，便摇下车窗对我说："我每周三下午五点都要去冰球练习场接孩子，但我们郊区又没有任何公共交通可以坐。你们自由党人就知道一个劲儿地抬高油价。"对这位女士而言，高碳的生活方式是她的唯一选择，因为没有任何低碳的办法可以解决她的实际需求。而且，她很清楚就算你向她承诺会在她所在的社区兴建一条公交车道，要修到她家门前这条街的尽头至少还得好几年的时间。对于政治家而言，民主政治的继续教育正是在和普罗大众接触的过程中完成的。这位女士的困境让我认识到，要想让人民真正接受碳税，就必须首先为他们找到一个高碳生活方式的低碳替代品，随后才能让人们的生活方式得以顺畅地向低碳转变。2008年10月的选举当天，焦虑又困惑的选民通过选票表明了他们各自的态度。显然，我们没能说服他们接受碳税，自由党在众议院的

议席从103席落到了77席。保守党则从此前的124席上升至143席，但仍然不足以组建多数党政府，因为民众仍然坚信正是总理的失职导致加拿大没能妥善应对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此外，由杰克·莱顿领导的左翼的新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也多赢得了8个议席。加拿大的政治版图正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中进一步地碎片化。

2008年11月，自由党领袖斯特凡·狄安决定直面党在此次大选中的惨败，宣布辞去党领袖的职务，让位于新贤。选举党领袖的党代会将于六个月后的2009年5月在温哥华举行。鉴于党在当时深陷困境，我并未因此感到特别高兴，但我还是在第一时间宣布参选，并着手展开备选工作。这一次，我胜券在握。除了我以外参加党领袖职位角逐的只有李博和一位来自新不伦瑞克省的议员多米尼克·勒布朗（Dominic LeBlanc），他虽然年纪轻轻，却已有了相当丰富的从政经验。

当年11月众议院复会后，总理哈珀又让所有人都吃了一惊，他居然在议会休会期间没有提出任何可以应对眼下这场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他不仅对眼前的经济崩盘无动于衷，而且还借机用一些荒唐可笑的手段大搞政党政治，比如他提出停止向政党提供任何公共资金支持，这分明就是想给反对党已然十分艰难的处境雪上加霜。一国总理理应是一名战略家，但我们的总理却如此好斗，又屡屡做出如此欠考虑的决定，实在令人心寒。接下来的一个月内，他在确保保守党已经坐稳此次大选中新增的议席后，便开始对反对党议员出言不逊，这使他对众议院的控制力岌岌可危。两年里，他第一次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反击机会，但我们的党却缺乏领袖。此时，狄安出人意料地宣布他已经和新民主党的杰克·莱顿和魁北克集团的吉勒斯·都赛佩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准备联合起来推翻保守党政府，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联合政府。狄安只和身边屈指可数的几名亲信谈起过这件事，因此我们都没能提前知晓。一般而言，大选应该在议会通过对政府不信任案之后举行，但鉴于前不久刚刚进行了议会选举，几位意欲联手的反对党领袖因而准备直接寻求总督——即加拿大元首——首肯他们另行

组建政府的提议。如果这几个在野党在众议院的席次加起来足以构成一个多数党政府，那无需选举即可由一个新的自由党——新民主党联合政府来取代现有的保守党政府。尽管新组建的内阁中将不会出现来自魁北克集团的部长，但联合政府的未来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在众议院的支持。此外，多党的联盟协议同时提到了将国家从经济衰退的泥沼中拉出来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措施。狄安宣布这一联盟计划后，即刻收回了此前的辞职申请，转而宣布自己将出任联合政府的临时总理，直到下一次党代会对他正式的党领袖身份再次进行确认。这在加拿大的政治史上是破天荒的头一遭，对我而言也无异于晴天霹雳。尽管我是自由党的副领袖，但我却被所有相关的秘密会谈排除在外。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个绝望的领袖为了求生而不择手段追寻权力的一场政变闹剧。要是狄安能够在国人面前表现得足够机智和得体的话，或许一切都还有可能，但他在全国电视荧屏上的表现却乏善可陈到了极点，甚至有残忍的玩笑称屏幕上的这段录像好比是一段“斩首视频”。

政治家的行为总是那么难以捉摸，这个桥段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位曾经在和魁北克分离分子当面对质时那么有原则的并拥有良好声誉的政治领袖，如今却和一个企图分裂国家的政党领袖联手搞起了密谋。这位曾经写下振聋发聩的政治誓言的领袖人物，如今却难以用简单的语言向选民解释为何要支持这次联盟。这位宪法专家最终也没能明白，尽管这样的联盟在理论上可行，但在现实中却连一丝一毫的合法性也没有。问题不在于联盟本身。如果是在胜者之间联盟，那当然没有问题，英国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在2010年5月组建的联合政府充分证明了个中的可行性，尽管该联合政府此后的执政道路充满荆棘坎坷，但也从未有人就其是否合法提出过任何质疑。(注)然而，对于我们而言，联盟各方都是在大选中落败的在野党。执政党前不久刚刚在众议院赢得了更多议席，但我们却痛失数个宝贵的议席。我们该如何向人民解释我们准备推翻的，正是两个月前刚刚通过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要是我们真的这么做了，总理本人也势必会要求总督再次解散议

会，重新举行议会选举。到时候，我们又该如何说服总督允许我们，而非执政一方，重新组建新政府呢？难道她会跳过选民的授权直接答应我们的请求吗？我们是否有任何机会获得选民的授权，来对抗一个严厉指责我们正在策划政变的政府呢？我们清一色是上次选举的失败者，选民怎么会支持一个几个月前还在互相争斗的政党所组成的联合政府呢？

我和所有明眼人心里都很清楚，除非加拿大各派进步的势力能够拧成一股绳，否则保守党可能还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执掌政权。无论是新民主党，还是魁北克集团都是我们的政治对手，我们在加拿大政界已较量了多年，但我从不把他们当作敌人看待。说实话，如果我们在这次选举中能得到更多席次的话，我很可能会支持与新民主党单独结盟组成联合政府，然而事与愿违。我们仍然需要魁北克集团在众议院中对不信任投票的支持，但要是让我们这个长期致力于国家团结统一的政党的执政命运被一个企图分裂国家的政党左右，我实在无法接受。这些问题我想得很清楚，它们并没有让我太过忧虑。正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接下来应该怎么应对，我反而很享受这场充满戏剧性的联盟风波。

三大在野党几乎所有的议员都已在结盟文件上签字，狄安也坚持要我签字同意。我一开始拒绝签字，他随后以党领袖的身份命令我签字。要知道，拒绝党领袖所下的直接命令很可能成为政党分崩离析的导火索，我和另外一位同事欧文·科特勒（Irwin Cotler）因此成了自由党议会党团中在这份文件上签字的最末两个人。当然，我是在明确表达了我的反对意见后才签下的名字。当时，全党因这份联盟协议闹得兵荒马乱，已然面临四分五裂的危机。李博，我在党领袖角逐中的对手，从政后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新民主党效力，所以对他而言，这份联盟协议显然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他也认为，既然我们已经成功把脚踩到了总理的脖子上，那就不妨多踩几脚。然而，支持李博、狄安和联盟协议的议员数量却在不断减少，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对协议持怀疑态

度。因此，到12月中旬，经过党内数轮激烈的辩论，狄安终于意识到大势已去，拱手认输。多米尼克·勒布朗也宣布退出选举，转而支持我出任党领袖。李博后来也意识到了情势的变化，放弃了这一协议。不久后，在自由党籍参众两院议员的共同见证下，我出任自由党临时领袖，这一任命后来在5月举行的温哥华党代会上被来自基层的党代表们正式确认。

就这样，我在这样一场宪法危机发生的当口最终成为了党领袖。然而，我们面前的这场鏖战才刚拉开帷幕，一场由所有反对党共同提议的信任投票即将举行。12月中旬，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总理向总督提出议会休会请求，并获得了批准，由此避免了被众议院弹劾下台的命运。哈珀这一计成功解救了他的政府。这也让我们得以早些回家庆祝圣诞节，也有了时间好好琢磨眼下的形势。

圣诞期间，新民主党领袖和我私下见了一面，他请求我将执政当局推翻下台，然后与他的党联合执政。直到现在，我还能想起当时杰克·莱顿当时那副渴望执政的表情，还有他说起让我们给“新政治”（a new politics）一个机会时的神情。我告诉他，要想说服我们的党员和新民主党联盟或许有些难度。实际上，还有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要是他口中所谓的“新政治”是在同分离分子的密谋中诞生的话，这又算是什么“新政治”？政治与人民之间的距离已经够远了，一次密谋的政党联合只能让形势变得更加糟糕。我很清楚，要是我通过这种手段当选总理，将来只要我出现在公众场合，就一定会有一群公民群集示威，指责我窃取了总理的宝座。我们正处于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上。或许投机主义在政治中被看成是一种长处，但将这样一场危机作为政治跳板，势必成为我们永生的污点。现在不是考验选民耐心的时候，也不是假设选民和我们一样对当局同仇敌忾的时候。现在是倾听民众呼声的时候：保住我们的工作，停止手上的政治游戏。

我常常会回想起当时的这些情景，也会假想如果我当时答应了杰克·莱顿关于“新政治”的请求的话，现在一切又会变成什么模样。但我心里清楚地知道，我们在众议院的议席数量，就算加起来还是不足以组建多数党政府，这会给之后组建的联合政府带来合法性和稳定性的双重危机。数年之后，又会有一次联盟的机会将立场中立的自由党人和左翼的新民主党人联合起来，让他们得以与长期执政的保守党霸权分庭抗礼。但2008年12月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一个联合政府不能像变戏法一样突然冒出来，然后被强加到加拿大人民的头上，何况议会选举刚刚落幕，人民已经亲手用选票决定让保守党在渥太华占有更多议席，我们显然不能公然悖逆公民的意愿，所以我才拒绝了联合执政的提议。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我拒绝的不仅是一个联合执政的提议，还可能是我此生唯一可以出任我国总理的机会。

---

1. Doris Kearns Goodwin，Team of Rivals：The Political Genius of Abraham Lincoln（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05）.
2. http://www.chu.cam.ac.uk/archives/exhibitions/Ottawa_image.php.
3.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Democracy and Disagreemen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6）.
4. 在加拿大，党鞭是各个政党在政党高层会议中负责维持纪律的成员，督导同政党议员在众议院、参议院和地方立法过程中的出席及表决行为，通常是政党中具有威望和影响力的权威议员。——译者注
5. http://www.hillwatch.com/pprc/quotes/parliament_and_cabinet.aspx.
6. Jane Mansbridge，“A Selection Model of Representation，”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research paper，2008. 另外参见Hanna Pitkin，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67）。
7. 2015年，加拿大公民和移民部正式更名为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Immigration，Refugees and Citizenship Canada）。——译者注
8. https://www.gov.uk/government/publications/the-coalition-documentation. 另外参见P.H.Russell，Two Cheers for Minority Government（Toronto：Montgomery，2008）。

第七章 资格

2009年1月，在电视镜头的注视下，我和电视喜剧人瑞克·默瑟（Rick Mercer）合力将一张床垫从卡车上搬了下来，运进了我和巧兰在斯托诺韦的新家卧室。这里是加拿大反对党领袖的官方宅邸，隐藏在渥太华郊区一片成行的树木之间。李博也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出了把力，电视镜头记录下全过程，当他帮我们把电视机从车上搬下来的时候，大家都笑了。在各种活动和仪式上，我俩总是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亲切和睦，起码向观者展现了一幅君子之争的画面。这些年我们之间发生了太多事，多到已让我们破损的友情再也无法修复的地步，然而，工作上足够专业的他知道我们除了在公众面前表现得一团和气外，别无选择。

我和巧兰此前从未在这样一处尊贵高雅的宅邸生活过。1940年至1945年间，因故土被纳粹占领而被迫流亡至加拿大的荷兰女王曾在此下榻，书房里至今还挂着不少女王孩提时代的照片。荷兰政府为答谢加拿大在战时接纳了他们流亡的王室，特地送来一大批郁金香，因而每年春天，便能看到美丽的郁金香在渥太华的大街小巷竞相绽放。壁炉上方的水粉画里那个英姿飒爽的男子，便是曾经主政加拿大的威尔弗里德·劳雷尔爵士（Sir Wilfrid Laurier），这位相貌堂堂的自由党籍总理，可谓是深谙政治斗争的老手。如今，作为他曾经领导的政党的临时党领袖，我不禁端详起这幅肖像画来，而这位大师仿佛也正从上至下地打量着我。方才坐上党领袖宝座的我如今置身于斯托诺韦的宅邸，让我们夫妻二人感到如在家一般安心。我们确实很喜欢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房子，尤其是那条可以俯瞰后花园又装有纱窗的门廊，当然还有住在底下的那一家子浣熊。夏日夜晚，浣熊一家时常跑到花园里

散步，它们那王者一般不屑一顾的姿态和神情，似乎在控诉我们侵略了它们的地盘，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也确实如此。在任何一个类似加拿大的民主国家中，为政治领袖修建的府邸都应当尽量朴素端庄，尽管如此，斯托诺韦和那些浣熊仍让我们在此的生活十分愉悦。住在这儿的两年半时间里，每当我们经过长途旅行回到斯托诺韦的家中，便会看到在门口迎接我们的乔希·德拉赫、杰里·珀蒂和艾克斯比·卡斯特拉三人和善亲切的面孔，这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安心。

在国会山上，我也搬进了转角处那间更大的办公室。正是在这里，我的父亲曾为金总理做过笔录，也正是在这里，我第一次和我的幕僚们谋兵布阵。1944年，征兵危机爆发，国内一时众说纷纭，金总理此时说的一句话或许与我眼下的心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他说："必要时可征兵，但征兵不是唯一手段。"对我而言也是这样，必要时可联盟，但联盟不是唯一手段。一天早晨，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到访斯托诺韦和我共进早餐，他在餐桌上竭力劝说我与其他反对党联合起来打倒哈珀政府。我面前的这个男人曾在两次大选中蝉联总理，而且他三届任期内执掌的都是多数党政府，他说的话我自然得一字一句听得仔仔细细，但我仍然很讶异，他竟然也没考虑到反对党联盟后组成的联合政府的合法性问题。他似乎没有丝毫疑虑就认定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让加拿大民众接受两个曾经剑拔弩张的政党组成的联盟。我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可此时，我已然开始意识到，对于一个手忙脚乱的政府而言，反对党间形成的联盟显然是一个可以有力钳制他们的政治工具，对我们而言利大于弊。如果总理猜不透议员们到底会给他的预算案投什么票，他势必会提出一个让我们可以欣然接受的预算案。当年1月，我曾受哈珀之邀参加过一个预算讨论会。当我出现在他的办公室时，这位昔日不可一世的领袖如今好似再也无计可施，只能任由自己被曾经犯下的错误激怒，为自己或许熬不过议会即将举行的信任投票而焦虑。当他问我们是否有什么经济对策的时候，我说这是他而不是我们的预算案，他必须为里面的一字一句负责任。我不想同其他反对党联盟，更不想同哈珀联盟。我更希望自由党能够继续坚定地做加拿

大人民欢迎的大红帐篷（the big red tent）[注]，坚持我们在财政政策上的保守和社会议题上的进步。我们的这招奏效了。2009年1月下旬，政府向议会提交了一份含有加拿大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刺激政策的预算案，总计将会有400亿加元的资金被用在建设道路和桥梁等基础设施、开展工作共享计划以降低失业率、提升失业救济额度等项目上。在投票同意这项预算案之前，我们坚持要求政府每季度都要向议会报告该预算案的执行情况，经济刺激计划中每一分一厘的去向都需如实进行汇报。我们这样坚持的原因，是担心执政当局会将基建资金的使用政治化，从而只在他们自己的选区内大兴土木。因此，在这项汇报要求得到政府的同意并有一位内阁部长出面保证资金使用将遵循公开透明原则之后，我们才投下了赞成票。但其他的反对党却无一例外都投下了反对票。此前所说的联盟在一瞬间化为乌有，但至少最初组建该联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政府面对议会发起不信任案的威胁，不得不推行这项救加拿大经济于水火之中的财政赤字方案。

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任后首站出访便选择了加拿大。2009年2月，当奥巴马来到渥太华时，当时这场已纠缠了我们两月有余的联盟危机仍在发酵。我和他在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聊了足足35分钟，他的空军一号就停在玻璃墙背后不远处的柏油碎石路上，我们四周站满了身穿雨衣、戴着黑色墨镜的特勤人员。他一上来就笑着挖苦我说：“我听说你在这里遇到了点麻烦。”他这么说还真是轻描淡写。要是前不久的局势有变，或许现在我就以一国总理的身份和他交谈了。这位刚刚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充满自信和得意，已然手握重权的他，看上去却轻松得让人难以置信。尽管他一上任就不得不面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他却似乎并未因此表现得忧心忡忡。看来他在来之前就已经做好了功课，对加拿大的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不需要任何提示。他总有办法在你面前表现得既友善又职业。当时，美国国会正竭力推动通过“购买美国产品”（Buy America）采购法案，我因此向奥巴马陈述了抵御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从而坚持加美边境保持开放的种种必要性，他当时全神贯注的神情令我至今印象深刻。

那时，奥巴马和我们都在各自国内有着很高的支持率。我们的党在全国民调中表现良好，甚至一度爬到35%至40%的高位，这让我们对拿下下次大选组建新政府很有信心，人民此前目睹了自由党在国家危难之时迫使执政党行正确之事。不久之后，还是在那个冬天，当北美汽车业紧急财政援助案（North America automobile bailouts）的加拿大部分被提交至议会等待裁决之时，我们又一次同政府站在了一边。做出这一决定也并非难事，只要到加拿大所有中部城镇的汽车生产供应商那里看看就知道，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眼睁睁地让这些当地的主要厂商和雇主走向破产。

做决定的感觉很好，做对了决定的感觉更好。在我担任党领袖期间，我很少有犹豫和怀疑的时候，尽管对我而言，领导一个全国性的政党，管理一大批的职员和党团内所有天赋异禀、享有盛誉的参众两院议员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挑战，但我仍然乐在其中。每当政治风向转向我们的时候，我们办公室里的每个人都难掩兴奋之情。党领袖办公室里那支年轻的团队成功地把握住了时机，把我们的党带入了21世纪。此前多年执政的经历让自由党多少有些安于现状，这不仅让我们的竞选造势能力有所退化，我们的筹款机构也逐渐和网络时代的潮流脱节。与此同时，保守党政府却充分利用自身执政党的优势，开始运用高效的网络和直邮服务展开筹款活动。在这一点上，我们甘拜下风。给我们投票的是谁，他们住在哪里，他们又需要什么，我们统统都不知道。就连全国成千上万名党员，我们都不甚熟悉，更不用说选民了。我们在拥有类似的数据以前，就一直这样盲目地运行着。因此，我们派出一队年轻人到华盛顿取经，他们学成后带回来一套奥巴马和美国民主党人用于筹款和管理票仓的软件，这让团队里的“数据猿”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就这样，我们终于拥有了备战大选所需的、足以与他人抗衡的数据武器。

虽然总理仍然在位，但经过联盟危机的他早已元气大伤。尽管他成功地让公众认为反对党的这次联盟无异于一场政变，但无论他如何

垂死挣扎，都已无法改变他在媒体和公众面前玩火自焚、咎由自取的形象了——这场危机本就是由他之前那些傲慢无情的党派攻击和应对经济危机不利的无能导致的。我们此前在预算案和汽车业紧急财政援助案上投下赞成票，已经充分证明我们党准备好和总理共同合作将加拿大拖出经济衰退的泥沼，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摒弃党派偏见，共同应对当下的困境。我曾在一次会议上告诉总理，如果他希望我们能在议会中与他合作，就必须让他的人停止对我们无休无止的攻击。他用他那双冷眼盯着我看了许久，什么也没说，但回过头去再看，我大致猜到了他当时在想什么。他所领导的政府刚从面临倒台的危机中走出来，他背后的党团势力也一定因为他对局势缺乏基本的判断而人心涣散，此刻，他必须向众人证明，一切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事实上，他不仅没有停止对我们的攻击，反而加大了攻击的力度。5月初，在温哥华召开的党代会正式确认了我的党领袖身份之后仅十天，保守党人便发起了针对我们的首轮攻击宣传。其中两则后来被证实为加拿大历史上非大选时期发布的规模最大的单个宣传广告，上头的广告词后来也成了街头巷尾人尽皆知的句子。要是你当时也在加拿大，或许这两句话也早已让你烂熟于心：“叶礼庭，只是过客”（Michael Ignatieff, Just Visiting），以及“叶礼庭，不是为你才回国”（Michael Ignatieff, He Didn’t Come Back For You）。[注]

从2009年5月开始，直到两年后大选结束，他们在各处播放这些广告，甚至不惜砸下重金在收视最高的节目中播放它们。就连奥斯卡颁奖典礼的直播间隙，观众们都不得不看到我在广告中出现的面孔，而我每次打开电视准备享受“超级碗”[注]比赛的时候，都不免会听到关于我“只是过客”的广告词。他们的舆论攻击其实是钻了加拿大选举法的一个空子，而这个空子早就应该被填上了。选举法对宣布举行联邦选举后各政党的竞选开支上限有着严格的规定，但却没有在非选举时期做出类似的规定。一般而言，两次选举之间的这段时间，加拿大政府都会专注于社会治理，没时间来特地攻击某位反对党领袖。但自从永

久选战的新政治气候被搬上台面以来，治理就意味着选举活动。他们攻击的效果立竿见影。我们的支持率开始一路下滑。对于团结在我周围最为紧密的党员而言，我总能有机会在他们面前为自己辩解，但在党的外围，一阵异常的死寂却突如其来。没人再愿意听我解释。我好像真的变成了过客。

我的对手显然深谙政治攻击的精髓：他们知道要集中火力打击我最强有力的地方，从而让我在优势尽失、弱势尽显的状态下自取灭亡。对我来说，我能吸引加拿大民众支持的亮点无外乎我局外人的身份。我曾经出走大千世界探索自我、最终回归故土想要为国效力的故事，在保守党人嘴里，竟变成了一个本质完全不同的阴谋：我只是一个来投机的背包客，一个没有固定立场的精英主义者，我的回归为的不是加拿大人民，而是为我自己。要知道，在他们这个攻击广告投放之前，我已经赢得了两次选举，但这对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他们觉得什么都不重要。声称我只是过客，不仅是在质疑我对国家的忠诚，更是在影射我是个把政治当作消遣的精英主义势利鬼。他们的攻击广告聪明地将对我阶级和公民身份的双重质疑黏合在了一起，仅凭这一句话便足以毁了我的整个政治生涯。

照美国人的话来讲，我这是被“快艇”（swift-boated）了。2004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曾有一群“越战”老兵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攻击，质疑克里年轻时作为海军上尉在越南湄公河地区担任快艇指挥官的服役记录。[注]因为在越南服役的出色表现而被授勋的克里，登上国会山从政后却成了坚定的反战分子。当初让克里成为反战运动英雄的那篇在国会的证词，我仍然清晰地记得，因为当初我正身处哈佛。正是因为这篇证词，他才得以在马萨诸塞州走上仕途，但这却让不少老兵心生怨恨。2004年，这群对克里怀恨在心的老兵在一位共和党亿万富翁的资助下，针对当时正在角逐总统宝座的克里曾经的“快船”经历展开舆论攻击。这场攻击效果显著，以致“快船”一词后来真的成为了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常用动词。后

来当克里到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报到”（report for duty）时，他仍想把曾经的服役记录当作竞选总统的一个筹码，但是这时他已基本没有胜算了。当时，我和一部分人一样，不理解他为什么不对这些攻击做出回应，因为回应并不是什么难事。他本可以提出质疑，比如对方为什么要特地拿他的服役记录出来说三道四，毕竟他是真的在越南参加过战斗，而他的对手小布什只不过是仗着他父亲的影响力加入了空军国民警卫队（Air National Guard），开着飞机在德克萨斯上空装模作样地绕绕圈子就轻松地赚来了一段服役的经历。可是，克里从未回应那些攻击。如今，我也会把这些针对克里和我的“快艇”广告放给我的学生们看。我开始意识到为何这些广告会让克里不得不保持沉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广告中有一定的事实成分，所以才充满了杀伤力，并且让人难以反驳。在针对克里的广告里就有一大段他在国会作证的画面，他在台上竭力控诉和谴责“越战”中美国在丛林中的军事行动，包括所谓的搜索并歼灭任务、滥杀无辜和放火烧毁平民村庄等行为。要是他想将老兵们在攻击广告里对他的种种指责驳斥回去，他就必须变回曾经那个激情洋溢、反复重申着反“越战”言论的年轻人。他或许会这样说——我曾是那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也仍然存在在我的心底。我为自己当时那么说感到骄傲，而且我时至今日仍然对此深信不疑。如果你不准备投票给我，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但我绝不会为了得到你的选票就收回我当年就“越战”发表的任何言论。还记得2008年春天，奥巴马就牧师赖特（Reverend Wright）[注]的口无遮拦出面回应，他的候选人资格本来正因此面临危机，但他最终却成功地化险为夷。[注]克里对攻击广告的回应本可以像奥巴马回应赖特事件的演讲一样，成为一场教科书式的自我辩护，但他却没这么做。奥巴马因为牧师赖特勃然大怒，也最终脱离了那个他也曾属于其中的非洲裔美国人常去的教堂。他在回应这场争议的时候，成功地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种族问题本身，质疑为何经过了数十年的民权运动，种族问题在美国仍然是这么一个令人痛心、引来分歧的话题。由此，他成功站到了引导全美种族议题的制高点上，也因此把握住了成为总统的良机。“快

艇”攻击其实也给了克里一个同样的机会，一个让他可以引导全美反思“越战”的好机会，但在这场对政治艺术的终极考验中，克里败下阵来。

我曾经在心里反复回忆克里和快艇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因为就算在加拿大政坛这个与美国相比量级小得多的舞台上，对手一句“只是过客”的攻击同样给我带来了和克里曾面对的同样挑战。和快艇广告一样，“只是过客”确实具有足以令人确信的事实成分，因为我无法否认自己在回国从政前已经侨居国外30年的事实。最要命的是，针对我的攻击广告里还截取了一段2004年我在美国接受采访的视频，我在其中说道，“我们”必须想明白自己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才能避免“我们”在任何情况下对被关押人员实施虐待。当你为了说服观众时，可能一不留神就脱口说出“我们”来，可殊不知你开口的瞬间就犯了个大错。然而，讽刺的是，我始终都知道自己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美国人，这也正是我选择回到加拿大的原因。但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是我自己说的话害了自己，也害了我的团队，大家的士气因为这件事受到了不小的打击。虽然有党团内的其他同事为了安抚我还一个劲地谴责广告内容有失偏颇，可他们作为专业的政治家自然看得清形势，我也知道他们一定觉得我受到的这一击足以致命。

放着对手的攻击不回应越久，它造成的伤害就越大。要是你觉得回击会让对手的攻击“增辉”（dignify），所以拒绝回应的话，那便无异于在这场战斗中举白旗。政治斗争与人的尊严无关。如果你不为自己辩护，人们自然会认为你要么是正如对手所攻击的那样罪恶，要么是软弱到连奋起反抗的勇气都没有。毕竟，如果你连站起来捍卫自己的勇气也没有，你也肯定没本事去保护你的人民。如此一来，你很容易就会失去选民的支持。

对我们而言，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开展一场回击，就算我们有，我们又该怎么说？我深爱着我的祖国？要想反驳攻击宣传对你的

指责，就得一一驳斥其中对你的所有否定，但这样做便正中了敌人的下怀，你势必会输了这场仗。除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别无选择。2009年夏天，我做的每场演讲无不在反击总理对我的种种指责。难道贵为总理就可以有权决定谁才是优秀的加拿大公民而谁又不是吗？对于近三百万旅居海外的加拿大公民，包括其中近一百万住在美国的公民而言，难道他们就不如生活在加拿大本土的公民更“加拿大”吗？难道人们真的会认为只有那些从不愿踏出国门的加拿大人才是好的加拿大人吗？我坚信我们必须丢掉这种狭隘的地区优越感，我是在为一种更丰富、更国际化的公民意识而奋斗，我是在为下一代加拿大人而奋斗。我时常遇到这样的加拿大年轻人，他们或是我的学生，或在我的辅选团队里帮忙，或是我的朋友。有一天下午，巧兰和我正在多伦多的皮尔逊机场候机，在短短五分钟之内，我们竟然分别遇到四个上前来和我们打招呼的年轻人。第一位准备启程前往孟加拉国为当地农村妇女提供小额贷款，第二位在肯尼亚当地一个农业灌溉项目中任水处理工程师，第三位将要去巴西参加一个热带雨林保护项目，最后一位正准备飞往新加坡为一家商业银行工作。他们让我看到了我所爱的加拿大，我不希望他们将来有一天回到家乡竞选公职时，会像我现在一样被迫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而辩解。保守党用这种方式攻击我，实际上也是在攻击任何像我一样曾出国生活最后又回到了家乡的公民。可这里就是我的家乡，真该死。

然而，任凭我如何将这个问题放大到更多人身上，也还是无济于事。人们依然觉得我“只是过客”。既然媒体不愿意听我的故事，我们的党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我打一场反击战，那我不得不曲线救国，想些其他的办法来让人民听到我的辩解。我们改装了一辆巴士，命名为“自由号快车”（the Liberal Express），2010年整个夏天，巧兰、我以及一小支队伍坐着这辆车遍访了全国所有的省份和领地。我在各种新奇的场地同大家交谈：一旁有几只猪正肃穆庄严地踱步的农田里，有渔民正将虾笼从水里捞出来的码头上，葡萄正在成熟的农庄里，或是咖啡店门前的停车场上。

置身这些地方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让我无比享受。成为一名政治家最棒的地方便在于你可以体验国民们缤纷的日常生活：在小县城里逛集市，观看撞车比赛或者牛仔竞技会，在龙虾节或在家庭后院烤玉米、开烧烤派对，或者在宗教节日前往犹太教堂、印度教、佛教或锡克教庙宇以及清真寺和基督教教堂。乘着“自由号快车”遍访全国的那个夏天，我尝试了各种有趣的事，我做过棉花糖、尝过印度咖喱角、给汉堡翻过面、开过发令枪，还在游行里骑了马、在球场上掷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球。在同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过程中，任何人都可以加入我们的队伍，这种感觉非常美妙。这个夏天也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关于政治和政治家在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位置。在各种由志愿者和社区团体组织的庆祝活动上，政治家必须知道自己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当地的人民希望我们能在舞台上出现，正是因为我们作为人民和当地社群代表的身份，但他们绝不会希望我们把活动搞得过于“政治化”。我们可以和大家“互致问候”，但绝不能在这些场合做任何类似竞选演讲或政党攻击的事情。这些经历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远比政治重要，远比激烈的政党斗争重要。这是因为抱团取暖是人的本性。比起单打独斗，人们更乐于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携手并进。毕竟，一人拾柴火不旺，众人拾柴火焰才高。

我很享受这场游历全国的旅程，尤其是因为，这趟旅程让我得以像1968年皮埃尔·特鲁多带着我见识全国风土人情时一样，把广袤的祖国介绍给我年轻的团队。很多生活在东岸的加拿大人或许一生都没到过不列颠哥伦比亚，我手下不少年轻的幕僚就是如此。随着“自由号快车”的飞驰，各地壮阔的美景时常在车窗外呼啸而过，每当这时，他们的脸上总是写满了惊奇，而我也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了青年时的自己。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次我们到访不列颠哥伦比亚的耶鲁小镇，这个傍着铁轨的小镇一共只生活着250位居民，他们听闻消息后竟全部跑来听我在群山环绕的山阴处演讲。正当我向大家诉说着我的曾祖父是如何在1872年穿越耶鲁小镇，小镇旁的这条铁轨又是在何种情况下被铺设起来的，而我们今日又该怎样团结一心重建全国的铁路系

统时，一台柴油机车拉着整整90车的矿石从我们身旁缓慢驶过。火车的汽笛声在山谷间回荡，我最后说的几句话彻底被汽笛声淹没了，但我却觉得这声音让这整场演讲变得更加圆满了。2010年8月，“自由号快车”载着我们一行人来到加拿大大西洋沿岸的布雷顿角岛（Cape Breton Island），参加在巴德克（Baddeck）举行的党团会议。当时，即便是党团内原本对我持怀疑态度的同事也不得不承认，我为了扭转不利局势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我们在这趟旅程中的每一次诉说都收获了民众诚挚的倾听，这让我从政以来头一次感觉到，人们真正把我当成了自己人。然而，无论我们亲身拜访了多少国人，也敌不过一个在全国每台电视里反复播放的攻击广告的效果。那年夏天，我们结识了许多朋友，但我们惨淡的民调仍然没有丝毫的改善，这不得不归功于我们的总理。他不会就我口中的话攻击我，他攻击的是我说话的权利。他否认了我在这片土地上从政的资格。

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某种资格的标准，值得我们细究一番，因为资格俨然已成为现代政治最首要的攻击对象。人们不再会就候选人的理念或立场纠缠不清，而是直接对他们的为人提出质疑。

“当事人资格”（Standing）本是一个法律概念，指当事人在法庭上享有某些特定权利。只有法官能够决定当事人是否适格，而他们之所以需要明确当事人是否适格的目的，便在于掌控审判室内的所有活动，并在法律和政治之间划清界限。[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用这个词来对个人在某种形式上的权威表示尊重。比如，专家在我们眼中具有某些资格是因为他们的专业知识，而专业人士具有某些资格是因为他们受到的专业训练。又比如，一个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的朋友在我们眼里同样具有某种资格，所以我们才会耐心倾听他们的故事。主观上给某人以某种资格，不是为了彰显差异，而是为了表现平等和尊重。

任何人初涉政治时，最首要的任务无外乎确保自己的资格不受质疑，这样才能有权在各种议题上发表观点并受人关注。当然，这样做并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当选，因为对手的资格可能更加稳固，可如果你不具备资格，你势必连参选的机会都得不到。理论上，每一位公民都有从政的资格，因为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法律赋予的竞选公职的权利。然而，资格不等同于权利，资格是需要你从选民那里一点一点地争取的。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它确是一种特权。而且，资格还是一种不可让渡的权威。过去的社会地位、专业资质和能力，甚至是成功经验都不会让你天然地享受这种资格。我们身边都有许多品行出众的人，但出众的品行并不代表他们就能获得全国选民的认可。相反，品行存疑的人也有可能坐拥选民支持，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比尔·克林顿或许就是个不错的例子。此外，享有资格也不能和被人喜爱画上等号。想想那些成功的政治家，像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虽然并没有受到人民的百般爱戴，但就算再不情愿，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他具有执政资格。或许你会觉得一个人越受欢迎就越有资格，但已经有太多名流、歌星、篮球明星和电视节目主持人向我们亲身证明，受欢迎程度不一定能转化为政治上的成功。又或许有人会认为金钱能带来资格，可是看看那些时不时跳上台参选的亿万富翁的失败案例就知道，这点也不成立，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注]在总统竞选中的失败便是一个最近的例证。另外，有高学历也不能确保你就有资格为人民代言。诚然，教育上的成功确实代表着一种荣誉，然而，我们却时常目睹某些拥有高学历的精英也被迫面临无法将教育上的成就转化为从政资格的困境。原因很简单：高学历本身便是一种特权，而选民往往厌恶特权。你必须亲手从人民那里争取你的从政资格，而高学历帮不上太大的忙。可是，这条难能可贵的原则却引出了一条悖论。就算没有体面的学历、出众的品行、民众的爱戴、名气、学历或者厚实的钱包，你仍然有可能当选公职，但要是被人剥夺了从政的资格，便无异于此生与公职无缘。鉴于以上这些规则，我们能选出那么多有本事的政治家实属奇迹。

曾几何时，能让有权势的人物或组织为你背书确实可以给你带来从政的资格。但如今，这种认可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在过去，工会对候选人的支持意义非凡，但今日的工会早已不比当年那么有影响力。比起听从工会领导的指示把选票投给某位特定的候选人，现在的工会成员更倾向于基于自己的偏好做出选择。此外，过去妇女团体也会出面为某位候选人背书，但今天的女性似乎更希望能在投票时保有自主权。在我从政的那些年里，曾经接待过各式各样来自移民团体的访客，他们自称是某个团体的权力经纪人，向我承诺会动员自己所在的团体成员将所有的选票悉数投给我，以此从我这里换取一些优待。我始终暗暗怀疑他们只是在装腔作势罢了，因为很可能他们对同一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力。类似地，环保团体、新闻媒体和报纸社论的版面也会时常对某位候选人表示支持，但事实上这些组织的背书并不会给候选人的从政资格带来什么实际的增益。

在不少民主政体里，比如巴西和墨西哥，握有确认候选人资格大权的仍旧是政党，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政党的正式批准，任何人都不得参选。而在我们这样的民主政体中，无党派人士也可以参加选举，虽然他们大多难以获取选民的信赖。尽管政党对候选人资格的把控能力正在每况愈下，但在决定候选人名单时最具发言权的仍然是政党。以往，个人往往因为家庭、宗教或地区归属的原因不得不通过投票时的选择来彰显其对所属党派的忠诚，但如今，人们更乐于从自我偏好出发决定把票投给谁。对我而言，我必须认清这个事实：我们的党在我上任党领袖前已经连续20年以缓慢的速度不断流失英才。现在，宣称自己是自由党党员的公民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少，这一点本身便表现出了选民的投票决定正向个人化转变的趋势，而这势必将进一步增加选举过程的不稳定性。由于党员通过投票向党组织表忠心的意愿大为降低，政党动员民众将票投给自己党派的候选人的能力也已被大幅度地削弱。现在，我们党的候选人只有靠自己才有可能吸引足够的选票。至于如何吸引民众的支持，这便是见仁见智了。奥巴马在2008年

和2012年的两次参选，都有量身定制的选举策略帮衬，而这些策略对2016年参选总统的候选人而言显然不再适用，一切必须从零开始。(注)

和我一样首次参选的候选人，很快就会意识到政党的决定、权威的背书和我们自己那据说令人望而生畏的简历并不会让选民们天然地认为我们有资格为他们代言。你要是以为资格也是一种天然的权利，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想让人民认可你的资格，就必须走到街上和民众面对面交流，就必须一家一户地去敲门，就必须一个接一个地和选民打电话。

当选民在心里判断你是否有资格为他们代言时，政党、邻居和家人都可能会对他们产生影响。然而，如今的人们正越来越习惯于坐在电脑或电视屏幕前独自做出决定，这不仅没有增强选民们自主判断的能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自主决定权：对于那些愿意一掷千金购买广告时段的广告主而言，他们对选民的影响力正与日俱增，这也是为什么那些针对我的攻击广告可以有那么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于孤身一人坐在屏幕前的选民而言，他们只能看到广告里对我恶言抨击的一面之词，要是他们身边再没有站起来为我辩护的人，这些选民对我的印象也就基本定型了。面对保守党人不遗余力的抨击，孤立无援的我们本想寻求某些第三方的帮助，让他们作为调解人出面向选民解释情况，但我们的请求被无一例外地婉拒了。这些第三方机构本身也面临民众基础薄弱、资金不足的问题，手中资源实在有限，因此难以替我们进行反击。所有的工会组织、妇女团体和大学里的时事评论员都表示不想卷入这场争斗，认为我最好还是自己站出来为自己辩护。我很理解他们的想法，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负面宣传对于我们的民主政治的亵渎有多么严重。

低迷的民调数据加剧了攻击广告的负面效应，而且正日益成为决定你是否有资格为人民代言的关键因素。要知道，在你的民调支持率骤降的同时，不管你对民众说什么，人们都只会当作耳旁风。不久

后，攻击广告的负面效应已然尽显，惨不忍睹的民调几乎等于判了我们死刑，政治记者们也都开始在报道里把我形容为行尸走肉般的存在。而我则下定决心要拼死反抗，我竭力地想要证明那些关于我的政治生涯已经画上句号的传闻全是谣言，但这注定是一场鏖战。

选民们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着怎样的作用？他们如何判断候选人是不是有资格为他们代言？要是把选民的决定归结为被政治广告和民调机构绑架的产物，便太过草率了。要是简单地以为投票过程已经降格为一种特殊形式的“冲动消费”，也同样很不合适。诚然，确实有不少政治幕僚都曾试图这样说服他们所服务的政客，操控选民的投票行为就像广告主可以左右消费者要不要买一块肥皂那样简单。然而，如此粗暴地把政治选择和消费者选择做类比，我实在不敢苟同。这不仅是因为选民往往比大部分政客和销售专家要来得聪明，更是因为选民心里时常会赋予投票这件事一个特殊的意义，而这种赋予意义的心理却不会在他们买裙子或裤子的时候出现。投票的那一刻，是展现你归属于某个政治团体的时刻，你在那一刻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信仰，也加入了一场决定国家前途方向的集体行动。相比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投票更是一个表现政治态度的良机。大多数选民都知道自己一个人的选择并不会对最终的结局造成多大的影响，但他们仍会坚持参与投票，这正是因为他们相信在民主政治中，政治参与至关重要。[注]还记得，在2012的美国大选中，许多州的选民都不得不排上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完成投票。他们渴望自己的呼声能被听见，渴望自己能在这场总统竞选中表明立场，要是你不能感同身受，你当然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行为。对于那些参与了投票的选民而言，投票的过程无异于一种社会行为，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就自己的选择向邻居和朋友做出解释。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有必要向任何人辩解自己为什么要买这块肥皂或那身衣服，但为什么要选某位候选人则与之不同。而且，他们知道只有在某些方面做出解释才有可能说服他人。你可以告诉别人说，你是因为喜欢它的颜色才买了这身衣服，但如果你说你是因为某位候选人的长相而把票投给了他，恐怕很难服众。选民认为自己需要就自己

的选择向他人说明原因，正是这一主观上认定的义务，将投票的过程和冲动消费区分开来。我说上述这些话的目的便在于阐明这一点：解释投票选择的义务是让选举过程变得理性的关键。注

有太多败选的政治家习惯于把自己的失败怪到选民的头上。败选的政治家会告诉你，他们既不理解为什么选民没有选择他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的立场没有通过选举的考验。我也在选举中失败过，我当然也可以像他们一样，把一切都怪罪到不理性的选民身上。然而，这样做无异于抱薪救焚，只不过是在逃避责任。

短短五年间，我参加了三次竞选，也逐渐理解了选民的投票逻辑。他们深知，国家正面临的绝不是什么简单的问题，如果可以很容易就得到解决，那也不必拖到现在。他们会继而推测认为，任何候选人提出的对策都不可能是一招见效的灵丹妙药，而且在众多对策面前，他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哪个对策可能更胜一筹。所以，对他们而言，理性的做法是将关注点从悬而未决或实在难以一时解决的议题，转移到那些他们有信心自行判断的议题上来。正如认知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的研究结果所示，当人们遇到认知困难时，便会自然将注意力从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上，转移到那些我们直觉认为简单的问题上来。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相信自己可以自主地判断一个人是否值得信赖，这也因此成为选民对候选人的基本评估标准。注为何在政治的舞台上政治家对现实议题的看法不及他们的个性重要？候选人的资格问题又为何会在选举时备受关注？对这两个问题的理性解释是，选民们在决定谁值得倾听、谁又值得信任方面都十分擅长。而在决定谁最值得信赖的过程中，选民们更看重的是谁更像自己。一位公民在判断另一位公民是否可以作为自己的代表，为自己的利益代言的时候，最关注的是这另一位公民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选民们都乐于选一个熟悉自己的人上台，而候选人为了表现自己对选民的熟悉，也会尽量向选民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是你们中的一分子。然而，选民们还会继续追问：“这个人真像他自己

说的那样吗？”正是在这样的责难下，才会有人不遗余力地翻出某个候选人曾经发表过的所有言论，并竭力从中找出能证明其心口不一的证据，再将这些证据做成宣传广告广为传播，从而对这位候选人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虽然选民不一定会相信这些宣传广告的一面之词，但他们会因此开始质疑这位在广告中被抨击的政治家是否真的值得信任。于我而言，正是那句“只是过客”的广告词才让选民们开始质疑我是否真的是我口中的那个人，而另一句“他不是为你才回国”则意在动员选民对我回国的动机提出质疑。如果一个政治家无法说服选民自己是为了人民的福祉才从政，他也确实没资格从政。要是一条讯息编辑好了却没有填上收件人，自然不会有人得以知晓这条讯息的内容是什么。

巴拉克·奥巴马首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也曾受到过对手无情的攻击，但他的回应却让所有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都发现他巧夺申诉主导权的才能。2008年春天，他在费城所做的那场以种族为题的演讲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那就是一场关于资格的演讲——奥巴马由此成功地捍卫了自己为非洲裔美国人发声的资格，也表达了对于美国白人因在平权法案中被忽视的愤慨的理解。正是这场演讲，奠定了他日后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的资格基础。他就职后布满荆棘的仕途说明，即便是在位的政治人物也无法保证就能享有人民的拥戴。甫一上任，奥巴马便饱受“出生阴谋论者”的困扰，屡屡被人怀疑自己并非在美国出生，因此不得不公布自己在夏威夷出生的出生证明。2012年大选时，又有对手想方设法地就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对他百般刁难，但这一次，选民对奥巴马的集体声援成功地压倒了竞争对手的质疑，从此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对于任何意欲参选美国总统的人而言，种族、性别和性取向的门槛都已不复存在。美国和其他受其鼓舞的民主国家由此朝着马丁·路德·金所梦想的那个遥远国度迈进了一步。在那个国度里，人们不是以他们身上的标签，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受人评价。尽管奥巴马的当选为美国的种族平等带来了巨大的胜利，但那个遥远的国度仍然遥远。尽管许多民主社会已将各种各样的歧视视作非法行为，但在这些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以阶级、教育和公民身份为

武器来剥夺他人从政资格、动员公民相互对立的现象仍然存在。然而，值得庆幸的是，选民仍然是这些争斗的最终仲裁者。只要我们的直觉还能执拗地提醒我们——资格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是需要一点点亲手争取的特权——我们的民主就还有希望。正如亚伯拉罕·林肯所言："人民是最公正的，我们为什么不对这点抱有最坚定的信心呢？难道在这世上还有什么别的值得我们寄予同等甚至更大的希望吗？"注

与此同时，在这个政治完整性几乎已被资格争斗消耗殆尽的当下，我们又不得不蒿目时艰。在一个健康的民主政体里，候选人不会质疑对手参选的权利，也不会因为对方的公民身份、爱国热情、从政动机甚至诚意而对他百般刁难，他们唯一关心的是对方今后是否会有足够的能力、经验、远见、政纲和想法来展开治理。而我们如今所处的，是一个正在退化的政治环境。政治家之间为了避免在具体议题上展开辩论，为了避免观念上的自由交流而不遗余力地互相攻击，因为一旦成功剥夺了对手的政治资格，也就无须再去反驳他口中说了些什么。因此，政治家们才会一味地诋毁对方。

我们明明可以做得更好。此后，我会主张禁止在非选举时期开展党派宣传。就算要进行党派攻击，也请放过我们可怜的选民们，让我们到议会来进行辩论。此外，我们还要借鉴诽谤法来惩罚用恶意谎言中伤他人的行为。归根结底，全然负面的政治行为对任何人都不利。任何想要在危机时期团结起整个国家的政治家，一旦恶言诋毁其政治对手，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辜负了人民的信任，而这信任正是团结和鼓舞人心所必须彰显的力量。如果你是通过卑鄙的手段才在选举中胜出的，那你上台后也不太可能有什么好的表现。没有人希望我们的民主沦为每一场选举都是关于候选人适格与否的全民公投，也没有人希望我们的民主只能被一些恶言恶语的攻击宣传所左右。要是资格成了政治关心的唯一话题，那我们在选举时也就不必讨论任何社会亟待解决的议题了，人们也无需通过选举来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了。我曾参

加过的三场选举，无一例外全部充斥着资格问题的争辩，从未提及任何同国家前途有关的事。而且，令人震惊的是，在我从政的五年半的时间里，没有一位对手曾就我的观点、政纲或者施政计划提出质疑。或许他们太忙了，忙到没空来攻击我。我无意在此抱怨什么，我也永远不会后悔自己曾经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名誉。我只是觉得，这样争斗下去，我们国家的政治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

1. 大帐篷（big tent）指政党或政党联盟试图吸纳及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从而吸引更多选民的一种现象。一般以红色代表加拿大自由党。——译者注

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eVJ3eSN6MBM.

3. 超级碗（Super Bowl）是美国国家美式足球联盟（也称为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年度冠军赛，胜者被称为“世界冠军”。——译者注

4.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ngjUkPbGwAg. 另外参见Drew Westen，The Political Brain：The Role of Emotion in Deciding the Fate of the Nation（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2），ch.2。

5. 杰里迈亚·赖特（Jeremiah Wright）曾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牧师。在奥巴马首次竞选总统时，赖特曾公开发表一些带有种族色彩的煽动性言论，引起各方争议。——译者注

6. Barack Obama，“Towards a More Perfect Union” speech，Philadelphia Constitution Hall，March 2008，http://www.youtube.com/watch？v=zrp-v2tHaDo.

7. 美国法律中关于“当事人资格”的关键判决有以下五个：Frothingham v. Mellon，262 U.S. 447（1923）；Fairchild v. Hughes，258 U.S. 126（1922）；Bond v. United States，529 U.S. 334（2000）；Allen v. Wright，468 U.S. at 757（1984）以及Lujan v. Defenders of Wildlife，504 U.S. at 562（1992）。感谢布伦特·凯特尔斯（Brent Kettles）和迈克·帕尔（Mike Pal）在“当事人资格”、美国选举法和加拿大在上述领域与美国的差异等问题上向我提出的有益意见与建议。加拿大法律中关于“当事人资格”的关键判决为：Canadian Council of Churches v. Canada（Minister of Employment and Immigration），[1992] I S.C.R. 236。

8. 威拉德·米特·罗姆尼（Willard Mitt Romney），美国政治家、企业家，曾任马萨诸塞州第70任州长。2012年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当年的选举中败于时任总统奥巴马。——译者注

9. Sasha Issenberg，The Victory Lab（New York：Crown，2012）；Thomas Byrne Edsall，The Age of Austerity：How Scarcity Will Remake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

Doubleday，2012）.

10. 也有人曾经提出与之相反的观点，参见Russell Hardin，How Do You Know？The Economics of Ordinary Knowledg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11. 关于这一话题，我曾在2013年1月4日，于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理性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Rationality，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的埃德娜·乌尔曼·马格丽特讲堂（the Edna Ullmann Margalit Lecture）上在讲座《政治中的理性》（Rationality in Politics）中有进一步的论述。在此，我想特别感谢阿维夏伊·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和摩西·哈尔伯塔（Moshe Halbertal）两位就这一话题向我提的意见。

12. Drew Westen，The Political Brain（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George Lakoff，The Political Mind（New York：Viking，2008）.另外参见Daniel Kahneman，Thinking Fast and Slow（New York：Doubleday，2012）。

13. 亚伯拉罕·林肯的首次就职演说，1861年3月4日，http://www.nationalcenter.org/LincolnFirstInaugural.html。

第八章 敌人和对手

诚然，对手否认了我在自己祖国从政的资格确实令人愤慨，可是说实话，我自己也犯了不少错。就拿带领党团在2009年1月给政府预算案投赞成票这件事来说，我们党事后如同一个买错了东西的消费者一般懊恼。当时的我们刚刚拒绝了同其他反对党联盟的提议，又不情不愿地和政府站到了同一边，而这正是中立政党在野时不得不忍受的痛处。为了摆脱这一尴尬的处境，2009年9月，我授权在众议院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试图扳倒当权的哈珀政府，然而这一次我又失策了。2月份的时候，我们还同政府站在一边，到了9月我们却又翻脸不认人，准备打倒政府，这样的做法确实互相矛盾，怪不得其他两位反对党的领袖杰克·莱顿和吉勒斯·都赛佩见势都一反过去和政府对着干的常态，开始乐呵呵地力挺当局，只为了看我身陷尴尬的笑话。对于选民们而言，他们本就厌恶那些喜欢玩政治游戏、立场又不坚定的政客，我看上去两样都占了，理所应当为我犯下的错误付出代价。

这场溃败发生后，我将办公室主任伊恩·戴维和其他大部分幕僚悉数换成了党内深谙反对党工作精髓的专家。这又是一次不甚明智的人事变动，尽管我当时非常清楚我必须这么做，但变动初期，仍有不少人因此对我心生愤恨。为求自保的我牺牲了当初辅佐我出任党领袖的一队老将，他们既是在为自己的错误买单，也是在为我个人的错误买单。就这样，我失去了原本最为忠诚的追随者，再也无法确定身后是否还会有人时刻保护我，那时的我如此孤独。看着民调支持率一路猛跌，我和整个党团都陷入了悲惨的境地。

除了上述的战术失误，我们还面临着更深层次的困境。当初，我们在政府提交的预算案上投了赞成票，也就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在经济

议题上制衡政府的权利。虽然我们本可以对外声称，如果没有我们的施压，政府不可能拿出这份经济刺激方案；我们也可以提醒人们，是自由党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积极作为才让我国当时岌岌可危的银行和财政体系得以为继，但选民很少记得你过去的功绩，他们更在乎的是你明天将如何继续为他们服务。正是这一点让我们感到处境艰难。我们曾试着和政府就一些边缘的政策领域辩争，比如现行的失业救济金制度里荒谬的地区差异，但全国90%的受雇人口似乎并不在乎剩下那10%的失业人口是否正因为找不到工作而度日如年。我每到一处，尤其是加拿大中部的制造业重镇，都会遇到许多因经济萧条而受影响的民众，生活在骤降的订单量、一路走高的美元汇率和高失业率这三重阴影下，他们正是经济危机最大的受害者。然而，政府却设法使国人相信加拿大的经济仍然比美国经济要坚挺，以此安抚人心并让人民将一切功劳归结到政府身上。为了确保人民能看到自己的功劳，政府甚至在全国每一处建筑工地的门口都贴上了“经济行动计划”（Economic Action Plan）的标志。诚然，通过重申事实来让选民相信一切功劳属于你，确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不可少的天赋。尽管很不情愿，但我不得不佩服哈珀总理的计谋又一次得逞了。我抱着怀疑的态度目睹了他是如何通过重申事实为自己揽功的，也目睹了他是如何为了粉饰太平，掩盖了社会的不平等和阴暗面，从而在国人眼前营造出一片祥和景象的全过程。换言之，哈珀把自己包装成了解决我们国家所有问题的唯一救星。

难道我们就成不了救星？我们的党在执政时曾主张建立大政府，而在如今萧条艰苦的经济形势下，我们也在设法寻找新的出路。曾经在财政管理上的成功，至今让我们的施政风格以开支巨大闻名。然而，无数家庭内部面临的经济不确定因素与日俱增，选民们也都希望能够早日解脱沉重的经济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深层次的挑战，我将蒙特利尔市内各界数百位主要的专家学者召集起来，组织了一次会议，并同期在线上进行网络直播，吸引了上千名网络观众的参与。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次打开党常年紧闭的大门，开诚布公地向现场的学者和专

家请教他们是如何看待自由党的公众形象的。[注]他们中有的人说话虽然刺耳，但直指痛点。加拿大著名外交官罗伯特·福勒（Robert Fowler）就在会上批评称，我们的党已经失去了灵魂，我们不再为任何事任何人愤愤不平，因为过去多年的执政已经彻底腐蚀了我们。虽然我无法同意他的观点，但我很高兴他能如此坦诚。重新改造我们的政党文化就意味着我们要谦虚地听取别人对我们的真实看法。

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对于经济艰苦时期政府应当承担的必要职责有了更为明晰的认识。我在会上对所有与会者说，有些事情政府可以做，有些事情政府或许可以做，还有几样核心的事情政府不得不做。首先，政府必须保护人民免受系统性风险和市场失灵的过度影响。在这里，个人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应当予以区分。在一个好的社会里，人们必须自己承担生命、财产和思想观念上的风险，如果成功，那当然是一件好事，但如果失败了，那应当承担责任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政府，这便是所谓的个人风险。系统性风险则有所不同，它带来的损害是个人能力所无法解决和修复的，这次的全球金融危机正是如此，它蚕食了全球上百万无辜居民的存款和养老金，迫使上百万居民失去工作。面对这一危机，政府应当成为抵御失控了的全球市场经济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政府应当严格管控市场风险，并让风险的制造者承担起应有的责任，以免让无辜的纳税人和公民去承担损失。其次，政府应当保证能为人民提供可靠的社会安全网络，让人民在面临任何可能的经济风暴时都能有所依靠。虽然政府无须对个人风险担责，但有义务让人民不在恐惧中生活——对于收入不稳定的恐惧、对于陷入贫困的恐惧、对于巨额亏损和身陷赤贫的恐惧。最后，政府需要坚守岗位，为每一位公民争取平等的机会。理论上，在条件如此艰苦的当下，我们不能损失任何一个可以创造财富的劳动力，然而实际上，全国仍有成千上万的人口生活在失业之中。我们必须坚持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领域进行投资以盘活经济，而且我们完全不必扩大预算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当下借贷成本低廉，而且我们的赤字水平仍处于可控范围之内。以上这些对于政府作为的积极设想建立在这样一个

信念之上，即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全球经济环境中，要想获取经济上的成功，就必须为所有公民打开更多的窗口，让他们得以拥抱更多的机遇。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我们为了宣传上述的设想和理念四处奔波，并在各个地方市政厅里与当地的民众分享我们的政策理念，我觉得我们收到了不错的反馈。

我有一位在媒体经营多年的老友曾对我说，反对党领袖是政界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份差事。因为他不仅需要永无止境地揣摩总理的心思，还要始终面对媒体、本党党团和公众的监督，他们恰巧是最吹毛求疵、最难以驾驭的三个群体。我从来不会在私底下同任何记者通气，面对媒体的发问，我也总会以实相告，避免表现出任何个人偏好，而且尽量不发表任何未经深思熟虑的言论，以免祸从口出，给自己带来麻烦。我和大部分记者的合作都很愉快，但对某些半夜里给我在英国伦敦生活的前妻打电话并试着从她嘴里套出我不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之类的话的记者而言，我嘴里说不出任何好话。我也一向厌恶另一些特地跑到我们位于法国南部的住处蹲守的记者，他们原本希望看到一座富丽堂皇的城堡，从而在报道里把我描述成一个骄奢淫逸的外国侨民，但他们眼前这座简朴的房子却让他们希望落空。另外，更有甚者通过伪造照片谎称我曾和一群美国特种部队官兵在一架美国直升机前微笑合影，这种行为令人嗤之以鼻。我记录下上述这几件事，就是为了警醒人们千万不要低估了一部分媒体无所顾忌的程度，他们甚至可以心甘情愿地沦为政党之间互相攻击的工具。在和媒体打交道的过程中，我逐渐习惯了自己的私人生活无时无刻不被外界关注的常态，但我仍然会在大部分时候设法避免让巧兰和我的孩子生活在镁光灯下。另外，我也学会了在一个双重世界中适应政治生活：一个是真实的世界，需要我和其中的公民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总是那么彬彬有礼、风度翩翩；另一个是虚拟的网络世界，在那里任何事都可能发生。同样一个人，当着我的面他是断然不敢侮辱我的，但一旦到了博客和推特那个肆无忌惮的世界里，他却会想都不想地就参与到各种对我富有想象力的责骂和诽谤之中，这样的事情总让我有惊无喜。媒体

总是一如既往地在互联网对传统媒体产业经营模式的冲击面前忧心忡忡，但当他们关注反对党的动态时，他们对我们的态度多少还算公正。还有那些新闻日报的记者们，每次党团会议一结束，他们便会立马把麦克风塞到你的面前，但他们的工作很专业，我印象里他们不曾做过类似断章取义地理解我的言论或在私底下做秘密交易的事情。倒是那些专栏作家和报章评论员可以轻易地将人打倒，我也做过一样的工作，所以我知道一个坐在台下的观众要想嘲笑场上的选手有多简单。可殊不知，这却可能给场上的选手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为了广泛接触公众，我和我的团队决定绕过媒体的束缚，直接奔赴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社区中心和高中体育馆巡回即兴演讲。这是个高风险的计划，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在转角那个手上拿着一捆纸、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男子会冲到麦克风前面说什么话。然而，既然这项战略已清楚明白地对外公布了，我就应该做好随时倾听公民们的诉求并向他们学习的准备。当时，我也正想摆脱那种照本宣科的讲话，想要活得更“危险”一些。我几乎每周都要参加一次事先毫无准备的即兴问答，从台下形形色色的人民口中，我听到了他们最真实的心声，认识到了国家最真实的面貌，感受到了人民和祖国共同跳动的脉搏。每一场演讲、每一场问答都是一次民主的盛宴，但这却占据了不少我本应在众议院的工作时间，这让新民主党人得以乘虚而入，对外宣称我没有按照职责来议会上班。然而，我始终觉得这几乎每周一次与民众的会面是必须的，我相信这才是填补政治家和公民之间的鸿沟的最有效办法。

至于和议会党团的相处，起初让我觉得很为难。我的同事们的自尊心本就很强，被迫下野让他们备受挫折，他们每个人都急于向我大倒苦水。在任何有关民调的传闻面前都脆弱不堪的他们，时常会克制不住将某些机密泄露给蹲守在外的政治记者。过了一段时间，我才开始懂得欣赏党团成员们高超的政治艺术——这群来自全国各地的男女议员，大多有着比我长得多的政治履历，他们富有幽默感，似乎对宿

命论笃信无疑，但却始终相信好消息就在下个街角等着他们。这些都是终身职业者才会有的特质。每周三，我们的议会党团都会在议会铁路委员会会议室里碰面。这间屋子有着高挑又壮观的天花板，一旁巨大的壁画描绘的是1917年4月结束了维米岭战役（Battle of Vimy Ridge）注的英雄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在回家路上的场景。似乎只有当我们在野时，才更能辨认出画中那些颜色灰暗、满身泥垢的人物。每次两小时的讨论，时常有同事在他人发言时自顾自地看报纸、玩手机、窃窃私语或者互相打趣，这或许是因为我们的会场，就像其他任何党派开会一样，总是免不了出现些大话空话，可是只要有人接过麦克风后直入主题，随即开启一个极为重要的议题，所有人的注意力便会立刻集中到那人的身上。起初，每周三和党团开会还是件令我恐惧的事情，但逐渐地，我开始对党团会议上参众议员们向我传递的信息愈发依赖起来，像是自己选区的选民最近在热议什么话题、在议会大厅从其他党派的议员口中听到了什么，或者记者们在私下又在议论着什么。我们之中也有那么几个可恶的内奸会时不时故意地将党团内部的消息泄露出去，我们试过各种威逼利诱的手段，也没能把这几个泄密的人找出来。总体而言，我的党团还是忠诚于我的，也从未有人起身反抗我的领导。就这样，我开始明白自己多么倚重他们。每周三的会议最后，我都会起身对方才的讨论做一番总结，随后像其他任何团队的领袖一样告诫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团结必胜，分裂必败。

和我们对立的政府交手，常让我们感到怒不可遏，但多亏了共同的愤怒，我们才得以团结一心。曾有人打趣地说，他们给人的印象，比起是一个政府，倒更像是一个摩托车黑帮。哈珀先生始终坚信最好的防卫就是主动出击，这一假定在他看来不容置疑。因此，他才会紧紧抓着众议院不放，无时无刻不在挤兑反对党籍的议员们，并且不遗余力地想尽各种方法来维护自身的党派利益。

我们曾一再要求政府告知议会他们用于购买F-35战斗机的真实花费，毕竟这是加拿大历史上涉及金额最高的一件采购案。我们党团的

两位议员马克·加尔诺（Marc Garneau）和多米尼克·勒布朗，在调查了美国国会发布的超支报告后，一遍又一遍地质问我们的政府，何时才能告诉国人每一架飞机的单价，但他们从来得不到政府坦率的回应。政府的闪烁其辞间接证明了他们为国家做了桩不划算的买卖。另一位党团成员马克·霍兰（Mark Holland）也曾屡次逼问政府，为何在2010年多伦多举行八国集团（G8）与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期间，政府竟然在安保事项上花费超过10亿加元。讽刺的是，正是在这场峰会上，与会各国领导人决定推出经济刺激政策，而且，哈珀先生还带领与会首脑提醒西方公众做好准备，迎接财政紧缩的到来。哈珀政府在此次峰会举行期间造成了公共财政的极度浪费，其安保部署也已公然侵犯了基本的公民自由权利，他们必须为此承担责任。我们发现，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被浪费的数百万加元税收中，还有一部分被用到了与峰会举办地相距甚远的某些保守党选区，没有任何和峰会沾边的理由可以解释这些花费。我们的党团成员杰勒德·肯尼迪（Gerard Kennedy）则进一步揭露了这些公共资金是如何从2009年由我们投票通过的经济刺激预算被挪用至保守党选区的全过程。又一次，金钱被用在了为政党政治服务的目的上。换言之，在我们履行反对党职责的同时，政府唯一的作为便是拖延、否认和掩饰。要是总理和政府总是这样向议会隐瞒一些关键信息的话，我们的民主政体必然无法正常运行。最终，众议院议长做出裁定，认为政府拒绝向议会提供关于二十国集团峰会开销的相关材料是蔑视议会的行为。(注)这个对保守党蔑视行为的裁决在加拿大议会史上还是头一遭。

此外，为了迫使政府公布有关加拿大部队转移被关押人员至阿富汗本土的安全和情报机构的信息，我们也向政府发动了一场类似的攻击。我们的阿富汗盟友因虐囚的习惯而举世闻名，而在知情的情况下将被关押人员送回阿富汗接受虐待显然有违《日内瓦公约》。因此，乌贾尔·杜桑吉（Ujjal Dosanjh）、李博和我连续数月要求政府严格履行被关押人员转移协议，以在保全我们的士兵们的荣誉的同时，让被关押人员的安全获得保障。然而，政府却拿国家安全做幌子，编造了

许多令人怀疑的理由，不让我们有任何接触所需文件的可能。当我们随后退一步做出妥协时，他们又开始编造了新的谎言。最后，议长彼得·米利肯决定支持我们，裁决政府又一次蔑视议会，迫使其将相关文件交至一个特殊议会委员会审阅。

或许你会以为政府蔑视议会、蔑视民主的行为势必会伤害到公民们的爱国之心，从而引起议会外的愤怒，可是你错了。当我们试着将我们岌岌可危的民主现状和政府那套变了质的党派偏见公之于众的时候，大部分国人只会满不在乎地朝我们耸耸肩。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大多数选民对议会系统的了解少之又少，也鲜有耐心听我做出任何关于滥用民主的指控，更不用说他们对议会改革的提议有多少兴趣了。掌权的政府比我们更能认识到这一事实，所以才会无耻地利用公众对议会犬儒主义的态度，以党派攻击为由避开了我们的所有指责。

然而，在我担任议员期间，有一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先前认为众议院与公民之间已竖起一座高墙的想法并不完全正确，因为仍有公民在迫切地期盼议会能回归到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议会的位置上来。那便是政府在议会举行的向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受害者郑重道歉的仪式。这类学校在19世纪末以同化印第安儿童为目的建立，由天主教或新教教堂按合约管理。然而，可耻的是，当时在这类学校就读的儿童却在校园里饱受性侵、虐待和殴打的折磨，此后终生都不得不活在这段经历的阴影之中。20世纪80年代时，此类学校已被悉数关闭，但每当我到访任何原住民社区，我们仍能体会到这段可怕的回忆给受害者的身心带来了多么巨大的伤痛。有一次，我和巧兰到访位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弗雷泽河（Fraser River）岸边的斯多罗原住民社区（Stó:lō nation），一位老人断断续续地向我们讲述了她当年在寄宿学校的遭遇，她最后无奈地耸耸肩，总结道："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中的任何人会把孩子送出去接受教育？"连续好几届的政府，包括我们都曾试图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直到哈珀总理任内，经过反复磋商，政府最终制定出向寄宿学校受害者提供的财政赔偿方案，并决定在2008年6月于

众议院举行仪式郑重向原住民道歉。仪式上，各原住民民族的代表在众议院中央的主走道上落座，楼上的旁听席也坐满了来自全国各个原住民团体的民众，他们中的许多人穿着各自部族最隆重的礼服。仪式开始后，总理和数位原住民领袖相继发言，虽然我记不清他们当时分别说了什么，但我却很清晰地记得旁听席上的民众身体前倾、全神贯注、神情激动的场景。当仪式结束后，我和不少原住民家庭从议会大厦来到门口的草坪，围坐在一起听他们讲述方才这一仪式对他们的意义：这是对他们身份的承认，也是对一个崭新的开始的承诺。加拿大原住民长期以来对于自身政治参与身份的矛盾心理，让这场庄严肃穆的仪式既令人动容，又同时让人感到心酸。原住民们直到1960年才被允许参加联邦选举投票，时至今日，他们在全国性选举中的活跃程度仍然远远不及各自部族的选举。可在当时那个场合，人数众多的原住民却向我们主动申明其希望自身的历史伤痛可以在议会得到承认的心愿，这让我们这些早已习惯在此搞残酷政党斗争的议员们猛然陷入深思：议会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天的道歉还有一个讽刺之处在此值得一提。2008年6月，政府在道歉时承诺给原住民们一个崭新的开始，但是此后这一承诺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落实。加拿大原住民和所有国人仍在等待之前在他们面前言之凿凿的政治家能够早日落实当时做出的承诺。

除了那一天外的其他时候，议员们聚集在一起的工作似乎只会拉开公民和政治家之间的距离。党派性（partisanship）正是这一切的根源。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政党差异的存在正是政治的精髓。加入一个政党，就意味着加盟一个团队，选择一位领袖，发表你的政治观点，然后大步向前和对面的敌人作战。党派性便意味着政党教条第一，个人判断第二。你一旦加入了一个政党，对党忠诚就成为了压倒其他一切的最为重要的道德核心，政治定位的信息泡沫将会充斥你的生活。[注]你将彻底与对立的政党决裂，不仅和他们划清界限，还会和他们在任何你反对的议题上势不两立，你的生活将被党派性重新定义，你也会从此对这样的生活习以为常。正如我之前所说的，我在从

政期间没有任何来自对立政党的朋友，我们彼此之间从来不会在政府办公楼的长椅上一起吃饭或喝茶，甚至连一句话都不会说。要是你被人发现在议会健身房的跑步机上和对立政党的某个人聊天，霎时间，议事厅内便会谣言四起，称你正准备加盟其他政党。现在回头去看当时那段经历，简直疯狂至极。要是在当时的少数党政府中，自由党人能和新民主党人走得再近一点，联盟的提议也不会那么快被枪毙，虽然当时，和对手交好确实让我觉得很不舒服。曾有前辈告诉我，在过去，如果议事日程被迫推迟，对立党派的党员也会一起喝酒吃饭，而这些党际和睦的表现则会加强议事厅里辩论双方间以礼相待的秩序。如今，议会里的党派性却从过去的群雄乱斗降格为了恶毒的人身攻击。对政治家来说，党派性并不意味着放纵无度和混乱无序的政治，“区分”（differentiation）才是党派性的本质。人民有权在不同选项之间做选择，政治家的工作则是要将这些选项的内容用清晰明了、毫无矫饰的语言展现在人民面前。如果想把选民从一片混沌中拉出来，就必须用戏剧化的手段、黑白分明的方式展现这些选择。如果政治家忘了自己的党派属性，无法坚持自己这一方的立场，甚至开始变成一棵墙头草两头倒的话，那他势必只是个愚人，做不了政治家。

但是，在外界民众的眼里，党派偏见却是荼毒政治的罪魁祸首。党派间的激烈交手似乎和他们以及他们的利益沾不上边。在许多选民看来，政党政治只是政治特权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上演的伪善的戏码。每当我们政治家在剪彩、献堂典礼和其他公众活动上介绍我们的同事时，总是会极尽能事地恭维、吹捧对方，让现场的观众不禁怀疑自己是否正置身于一场政治家洋洋自得的大弥撒的现场。为匾牌揭幕、为建筑奠基之后，政治家还会和众人一样争先恐后地站到合影镜头前，生怕自己无法在第二天的当地报纸上出现。正是这些可悲的情形给选民留下了负面的印象，怪不得他们只能摇摇头说道：“他们做这些都只是为了自己而已。”

选民也会直白地告诉你他们对虚伪的党派偏见有多厌恶。他们无法相信政治家说的话，因为似乎就连政治家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那套说辞。当然，选民们这样的想法并不错。只是比起诚实，党派性更看重的是党员忠诚的品质，所以政治家有时才会牺牲对自我信念的坚守，选择重复党派的教条。这也就是为什么任何有过从政经历的人都或多或少做过“虚假广告”的原因。可是，这么做时常是必要的。1919年，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场至今仍难以超越的以政治为题的演讲中说道，那些选择遵循诚实高于忠诚原则的“以政治为业者”，实际上是在践行一种“信念伦理”[注]（an ethic of ultimate ends）。[注]总会有人尊崇这种伦理，但他们的政治生涯往往都较为短暂。照韦伯的说法，与“信念伦理”相对立的是“责任伦理”（an ethic of responsibility），后者更为关注的是“我对谁负责”的责任问题。如果你的答案是选民的话，那你必然要将他们的利益置于你自己的良心之上，否则你只能一事无成。

我曾遇到过许多认为政治应以信念伦理为纲的选民，尤其是年轻人。我认为，良心确实很重要，但如果是在要夺取执政权的背景下，政党的团结统一则比个人的良心更为紧要。没有执政权，我们做不了任何事。可就算有了执政权，你能做的事情也会有一个明确的边界。遗忘真相会让你付出你无法承受的代价，你也可能会因此沦为一介草夫。这种错误，大多数政治家都不会明知故犯。你会试着保持自己本真的面目，可是在政治迫使你做出各种妥协的时候，要保全自己的本真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我和我的幕僚常会在一些问题上争论不休，比如面对敌人持续不断的猛烈火力，我们是该继续坚持正确而困难的方式，还是用一种不上台面却非常有效的方式予以反击。说实话，我们有时甚至会一头栽到泥水里，和身旁的对手来一场殊死搏斗。不用说也知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身上不免和对手一样沾满了烂泥。

即便如此，指责政治家是为了眼前的利益丢弃原则的犬儒主义者，这样的指控也并不是事实。作为党领袖，我会坚持我认为正确的

立场，尽管有时这会让我们付出痛失议席的代价。比如，我认为站出来反对石棉出口便是一件正确的事，因为滥用石棉将带来致命的严重后果，虽然这么做牺牲了不少我们在那些石棉储量丰富的城镇的议席，像是魁北克石棉县（Asbestos）。我们也坚信，捍卫枪支管控、反对保守党企图解除管控的做法也是正确的，尽管这一立场让我们失去了不少北部或偏远地区的议席。有一次，来自育空领地（Yukon）的议员、我的好朋友拉里·巴格内尔（Larry Bagnell）在我的劝说下终于同意支持我们在控枪上的立场，最后眼中噙着泪为我们投下了支持票，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么做的代价可能就是自己正坐着的这个议席。后来的情况也确实如此。此外，拒绝延长强制最低服刑期限也是我们认为正确的立场。在犯罪议题上，我们坚持证据政治（politics of evidence）应先于畏惧政治（politics of fear），虽然我们也因此流失了不少选票。所以，即使党派性是政治的精髓所在，政党利益也并非永远都是政党的唯一信条。说真的，如果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唯政党利益马首是瞻的话，我们或许要比现在成功得多。

从政的经历教会我，要想有所作为，就绝不能躲在纯粹道德的庇荫下。但是，要是你丢掉了所有原则，也就无异于丢掉了自己一开始投身政治的初衷。这样的困境既是政治生活的本质，也是政治之所以激动人心的原因。要想有所作为，难免会让自己感到为难。有时候，我觉得那些对于政治生活里一些必要妥协都不耐烦的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有些眼高手低，他们对政治家的厌恶也只不过是他们为了逃避自己身体力行地参与政治的借口。

选民时常无法理解的一个更深层次的困境是，对于那些真的想要夺取权力的政治家而言，他们不得不同时兼顾两种伦理。正如要喂饱猎犬就必须喂给它们足够的肉食一样，要想巩固自己的选民基础，政治家就必须扛起党派性的大旗。然而与此同时，政治家又必须挣脱党派性的束缚去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这些摇摆不定的选民最需要的并非让你为他们发声，而是你和他们的沟通。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既

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又能战场下以理服人。正如一名伟大的苏格兰政坛老手所言：“一个人要是无法同时驾驭两匹烈马，就无权在这残暴的马戏团工作。”(注)

如果把政党偏见仅仅看作一个马戏团演员在同时驾驭两匹烈马的戏码，那观众最差的评价也不过是这场表演烂透了。可是，对选民们而言，呈现在他们眼前的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党派性既让我们这个已然出现分裂的社会不断走向更深的分裂，也将对手变成了敌人。对手可以被打败，但敌人必须被摧毁。和对手过招，妥协是一个可能的选项，并且今天的对手也可能变成明天的盟友。和敌人过招，消灭对方是唯一的选项。从政时，我为“忠诚于女王陛下的反对党”（Her Majesty’s Loyal Opposition）效力，“忠诚”一词便代表了反对党在民主政体中的合法地位，所以政府不应质疑反对党人是否对国家忠诚。然而，我所面对的政府却不厌其烦地在这一点上怀疑我们，他们显然把我们看作了敌人而非对手。劝说是民主政治的支柱。通过劝说，你或许能将今天的对手争取为明天的盟友。但在我们如今的政治里，劝说已然奄奄一息。在和我们一样遵循议会民主制、设置共和制立法机构的国家里，议员的投票选择早在正式投票前就已经决定，议员跨越议事厅走道到对立党派的阵营里去说服对方的场景因此也不可能出现。政党在各自的教条中早已剔除了说服他人改变立场的必要，因此议员们也没有任何动力在辩论时以礼相待。当民主辩论中不再存在劝服一说，双方的意见交换也就失去了意义，所谓的辩论不免沦为赤裸裸的政治恶斗。想必任何选民在目睹两名政客在一个原本空荡荡的议事厅里指着对方的鼻子厉声辱骂后，都会对民主大失所望。可是，类似的场景在当今世界的许多立法机构已成为常态。随着立法机构的权力逐步衰退，行政和官僚体系的权力持续累积，议院内部的辩论开始变得既令人不快，又缺乏实际意义。立法民主在节节衰退而党派偏见却有增无减的双重现象，确实让民主人士有理由感到担忧，因为这两者合在一起便会削弱民主政体的一个关键作用：防止将对手变成敌人。

化解这一困境的关键便在于文明（civility），而这里所说的文明除了礼貌（politeness）以外，还有着更深刻的内涵。文明的内涵在于，你会认可对手和你一样忠诚于国家，就像他和你具有同样的信念一样。认可并不意味着排除对手之间的剑拔弩张，也不代表对手间偶尔的一两下重击就罪不可恕。它来源于人们对民主的一个共同认识：实际上，民主是对手间的政治。然而在现实情况中，敌人间的政治正愈发主导着我们。我们身处在一场扭曲的游戏中，游戏中的政治规则处处效仿战争规则来制定。这场游戏的目的不在于要打败对手，而在于剥夺敌人的参战资格，从而彻底地摧毁对方。我们都要小心谨慎地处理任何只能逞一时威风、轻率不负责任的政治言辞，否则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卡尔·冯·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但政治并非战争的延续。[注]政治是战争之外的另一种选择。我们都关心政治，想要维护政治，也都想让政治时刻保持朝气蓬勃，正是因为政治的目的便在于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

我们的保守党对手咄咄逼人的姿态并非首例，但这确是他们连续13年在野的沉痛经历催生的结果。把加拿大的保守党放到美国政治的语境下看待，便相当于美国的共和党，我们的保守党不仅从美国共和党那里借来了一整套关于负面攻击的攻略，而且还全盘接受了共和党将政治看作战争，将对手看作敌人的意识形态。把政治比作战争的做法，暗含着一些严重的隐患，比如让“不留活口”（take no prisoners）的做法得以合法化。而且，这种比喻还会让负面宣传这种歪门邪道的政治手段找到自我辩解的途径。不管负面宣传多么有效，它却可能让普罗大众从此远离政治，让人民和从政阶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让政治领袖愈发难以动员、鼓舞和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且，负面宣传更会荼毒政治的本质，扼杀治理者和被治理者之间的互信，让善治政府所仰赖的信任根基荡然无存。

把必须打败的对手看作必须摧毁的敌人的同时，在大多数民主国家立法机构中普遍存在的妥协和协议，变成了叛变和变节。一旦妥协

被定性为背信弃义的不义之举，那任何民主体系都无法继续正常运转。㊟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政治家能有资本永生永世和别人为敌。只要他在从事民主要求他所从事的工作，有一天他总会需要把对手拉拢过来，成为自己的盟友。

当然，妥协应是有度的，政治领袖必须清楚高尚的妥协和可耻的妥协之间那条看上去有些模糊的边界究竟在哪里。㊟政治家在原则问题上应当坚守立场，应该知道不是所有原则都可以在交易中作为条件。在某些时候，对手会就一些有损你方关键利益的事情提出要求，还有些时候，他们的举动甚至会让你不禁怀疑他们是否尊重游戏规则本身，在这种时候，妥协就等于姑息养奸。

直到2011年初，保守党政府的新预算案才终于现身，此时，议会再次投票支持当局执掌政权显然已不再可能。之前，议长已经两次裁决政府蔑视议会，这在加拿大历史上前所未有。如果我们这次支持通过他们的预算案，便无异于姑息纵容。眼下必须举行一场大选，不管这个时间点对我们而言是否合适。

2011年3月，总理终于宣布将重新举行议会选举。此时，在我内心深处，那个每一位政治家都应寻得的平静角落告诉我，我已做好了准备。我从政的学徒期必须在此告一段落，眼下是时候秀出自己的真功夫了。记忆里，接下来35天的选战是我政治生涯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我们有一架飞机和一支陆空双栖的团队，或许是因为我把后勤工作都交给了一支我信得过的队伍，我们的竞选活动才会运转得如此高效。最关键的是，我炽热的政治信仰化为了我们手上的政纲，让每一位公民都能拥有公平的机会正是它的精髓。我们将致力于确保生活在原住民保留地的克里族（Cree）孩子能够真正地读完社区大学，在医院走廊里苦等了六个小时的妇女能够早些看上医生，工薪家庭的孩子们都能负担得起大学教育，正受阿尔茨海默症折磨的家庭也都能得到看护。一旦当选，我们将逐步取消面向私营企业和持有股票期权的富

裕人士的税收优惠政策，增加财政收入，从而兑现上述承诺。我们认为，无论人们的收入来源为何，只要是个人收入，就都应被公平地征税，何况那些富裕人士已从此前的税收优惠政策中获益6.5亿加元。我们这么做并不是为了惩罚那些成功人士，而是为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我们在渥太华的一个体操馆内和众多热情的人民一道，通过网络直播向全国宣布了这一政纲。选战打响之初的几个礼拜，我们大家的情绪都很高涨。那是我政治生涯中唯一一段让我感到自己能够完全掌控自己想要传递的讯息、手下的团队和自己命运的时光。如今，当我翻阅当时一位年轻的摄影师乔治斯·亚历山大（Georges Alexander）在竞选期间为我们拍的照片时，我才发现自己在每一张照片里都是笑脸盈盈的——站在我们竞选专用飞机的旋梯高处向人们挥手致意时，一头扎入人头攒动的礼堂同人们一一握手时，手里握着麦克风大步走上或走下舞台时，我始终面朝着眼前热情的人民，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看着这些照片，想必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一切最后又是如何结束的。

竞选期间的每一天都会以一次集会收尾。每一次集会前，我都会先在休息室里做些暖身运动，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还会像个拳手一样前后跳跃，以此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我知道，这和你预想的场景不太一样。当时，我很清楚政治是一个对身体要求多高的工作，也很清楚加速血液流动有多重要。只有这样，我才能让自己的身体跟上节奏，才能在礼堂的活动中保持兴奋。当我在后台听到礼堂里开始人声鼎沸的时候，我一般都会和巧兰单独待在一起，先大喝一口水，再试着让自己兴奋起来。音乐一响起，我们便会迈入所谓的“爱之通道”（the tunnel of love），走在我前面的一支先遣队会弯着腰先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两边手拿照相机的人们随之退后几步，然后再目送我一路走上台阶，拿起话筒朝众人挥手致意。我的眼前是数百张，有时是数千张欢呼雀跃的面孔，而且我每次都会注意到那些肩上骑着孩子的年轻父母，因为他们的孩子就像是飘在人海表面一样惹眼。

人群里最前面的是那些坐在轮椅上的人们，看护他们的人就站在他们身后。人群中间那些探着头想看得更清楚些的，是我们的志愿者、向家家户户上门游说的工作人员、电话拉票员，还有那些对我们的政党运行不可或缺的基层党员：已经退休的女士、穿着风衣的老先生、当地的大学生、锡克族出租车司机们、印度教徒卡车司机们以及在酒店工作的华裔或菲律宾裔同胞。面朝大家，我有时会说：看看你身边，再看看我们大家，用心感受你们的力量，此刻我们整个国家都聚集在这里。集会的场地可能是哥伦布骑士礼堂，或者退伍军人礼堂，也可能是百年纪念厅、波兰俱乐部、意大利卡萨俱乐部，有时甚至是哈利酒吧。其他时候，我们会到高中的体育馆，或者天花板低矮的酒店宴会厅里集会，穿着白色衬衫、戴着领结的酒店服务生也会时常站在人群最后听我们讲话。这些都是老派政治的做法。尽管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正在人群末端发着推特，但站在最前面临时讲台上的我却仍然穿着老式的礼服大衣。我们是在维系一个伟大的传统，还是在代表这样的传统向观众谢幕?

只要我站在台上，身后总会有一面旗帜，甚至在一些面积较大的场地，舞台前会设置一条伸向观众席的走道，这既能让台下的观众离我更近些，也能让我得以和更多民众握手致意。在许许多多个美好的夜晚，我都能感受到台下的人们不只是在听我说话，他们也是在给自己加油鼓劲。我们之间好似在共同谋划一个伟大的事业，好像是在为了共同征服下一座高峰而互助互利。那时，我已不再需要讲台的辅助，可以脱下夹克衫，摆脱专业术语，不再试着表现得聪明机智，而去试着在与民众交流时触碰自己信念里质朴的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集中精神、全神贯注地真心交流，让思想和观点在彼此间畅通无阻。一天晚上，我们在一个北方城市的礼堂里集会，现场和往常一样人头攒动。就在我谈起政府挑衅的党派攻击行径和对制度的蔑视时，我突然想到一句歌词，来自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的《我的废墟之城》（“My City of Ruins”）。起来反抗（Rise up），我说。起来反抗，人群中有人回应道。很快，每个人都开始这么说。

起来反抗。后来，这样的呼喊和回应成了我们每场集会的必经程序。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以为自己把握住了某种趋势。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巩固自身的选民基础，点燃他们的热情，这样他们才会在我们需要他们的时候挺身而出，或是给我们开一张支票、帮我们接电话，或是在选举当天替我们挨家挨户地说服人们出门投票。当时，我和选民间的互动十分频繁，频繁到我已经可以认出人群中一些时常出现的面孔，我会站在台阶上举起手指向他们，他们也会向我招手回应，每一次集会结束后，他们还会围到我身边。我能感觉得到，他们相信我们一定会赢。他们这么觉得的时候，我也这么觉得。

有一次，我到访蒙特利尔一家名为《新闻》的报社，向他们阐释我们的政治纲领。莉西安·加尼翁（Lysiane Gagnon），这位影响力卓著的专栏作家，在我发言完毕后用一种威严的口吻对我说："但是，叶礼庭先生，政治不是做社会工作。"我们的政纲并不等同于社会工作，我们认为，在我们的人民身上投资才是让我们可以走在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国际巨头前的制胜法宝。我们的整体设想是：全力以赴打击不平等，确保没有人被落下，这样我们才能一起前行。而且我们相信，我们有能力影响未来而不被未来左右，我们有能力团结人民而非分裂人民，我们也有能力将一个比现在更好的国家交到我们子孙后代的手上。

就连那些从没参加过政治集会的人也特地跑来加入我们的集会。还记得在一个北部城镇，我记得是萨德伯里（Sudbury），我刚讲完我们在居家护理上的计划，就有一位又高又瘦、穿着牛仔裤、戴着牛仔帽的六十岁左右的男士站起身来，告诉身边的人们说，他开了三十年的卡车，而现在他却不得不放弃这份工作，因为他的妻子开始记不得任何事情了。除了他，没有人能看着他的妻子，不让她在不知不觉间走出家门。"我相信，你的计划能帮得了我。"他说完后便坐了下来。

这是我整个政治生涯里获得的分量最重的一份肯定。我之所以想要出任总理，正是为了和这位男士一样的人民。

我们的专机上还有一众跟着我们四处奔波的媒体记者。每一天，我们都会和他们交谈，回答他们的问题。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在他们面前出丑，没有说或做什么会注定让我败选的话或事。其中一位年轻的记者后来告诉我，我们的竞选活动正是她当初进入媒体行业想要报道的那种政治活动。当时的总理总是把媒体拦在警戒线外，牢牢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让他们感到既恐惧又沮丧。他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但在竞选活动里却十分软弱。更加令我震惊的是，他在竞选期间的讲话不仅没有任何积极的、鼓舞人心的成分，而且还试图用一个接一个骇人听闻的凶兆警告人民，如果他们无法继续执政，对经济崩盘的恐慌、犯罪、移民、外国人、侨民和陌生人，以及对未来的恐惧等危机就会降临。这些危言耸听的话让我实在提不起精神来认真回应，虽然我应该这么做。他们当然知道怎么利用人们愤怒的情绪来攻击我，还特地为此做了一支广告来讥讽我的教育背景。如今，要是你只有一个大学文凭，很可能会面临失业，但这不是他们想要告诉人们的重点。在那些从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面前，他们把我们描绘成自由党的精英主义者，而在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民面前，他们又把我们塑造成贪图税收的伪君子。人民的愤怒确实是能够痛击我们的一张好牌，况且在我们这个如此不平等的社会里，愤怒是一种四处游走的情绪，只要对手肯花重金在这上面做文章，就几乎可以用它来攻击任何一个人。我并无意发动针对那些"财富和工作机会的创造者"的阶级斗争，但我确实认为我们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正一步步走向颓靡，他们应当得到帮助。所谓的自由政治，不就是相信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就能击退绝望和恐惧的信念吗？为了照顾一个失去行动能力的亲人，一家人就必须走向破产是不应该的。一个家庭因为失业、疾病和高昂的药物支出从此一蹶不振也是不应该的。更不应该的是，仍有那么多民众觉得受到优质教育对他们而言只是天方夜谭。"一个好的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便意味着，所有好的事物对于任何人而言，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能

得到。自由政治存在的意义便在于，人们可以免于生活在恐惧之中，这才是我们主张的精髓。我相信，我们正在引起人民的共鸣，至少那些曾在生活中感受过这种恐惧的人民，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边。

我错了。不管我们多么真挚地笃信以上这些理念，对局势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如今回想起当时熙熙攘攘的人潮和那一个个美好的夜晚，我才发现，原来我们只不过是在自言自语罢了。我们的政党早就成了一个回音室：我们听到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声音。曾经，我赌人们会矢志不渝地忠于我们，会记得我们做过什么，会和我们团结一心。我赌错了。政治上的忠诚已不再是一种传统：它只是一种偏好，一种可以变得比眨眼还快的偏好。我本以为我们总人口中三分之一的人民会支持我们，只要能给他们一个像样的理由，他们就一定会把票投给我们。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支持者只占了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不到。

我们原以为，打选战得要拿得出政策和政纲，得有组织架构和候选人名单，至少我们得露个脸，即便我们知道自己在某些选区的获胜概率微乎其微。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党推举的某位候选人最终输给了一位来自新民主党的年轻女士，这位女士本以为自己没什么机会胜选，所以还在竞选期间到拉斯维加斯度了一段时间的假。

我对任何事的理解，都过于停留在它们的字面意义上。我以为我在参加一场竞选，在录制一场真人秀。我以为要靠内容取胜，要综合考虑政纲里的每一部分才行。我们这么做了，他们没有，可选民不在乎。我们就好像各自身处一个平行宇宙，我们在自己的宇宙里，我们的对手在他们的宇宙里，而选民们在第三个平行宇宙里。谁能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把触手伸到选民的世界里占据他们90秒的注意力，就是胜者。我们所有人最多只能占据选民90秒的时间。我们的对手第一个走进了选民的世界，而且砸下百万重金把这90秒填得满满当当，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人们：我只是过客，我不是为了他们才回国。一个竞

选活动永久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他们显然比我们更早意识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我们在2011年3月才加入选战，他们比我们整整早了两年。

选举前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碰巧遇见了一位议会党团的同事，斯科特·布里松（Scott Brison），他当时仍在竭力保住自己在新斯科舍省乡间选区的议席。他告诉我，他不断遇到自己的支持者这样对他说，虽然自己很想一如往常地把票投给他，但却无法消除对于我“美国人”身份的顾虑。这就是电视广告的效果。

命运女神对最终出炉的结果也有着决定性的话语权。大选前一整年，新民主党领袖杰克·莱顿都在和前列腺癌勇敢地搏斗。我最后一次在众议院大厅见到他的时候，他的髋骨刚骨折不久，因此整个人脸色苍白，汗流浃背，不得不撑着拐杖才能走动，但他仍然勇敢地笑着。选举初期，谣言四起，称他身体里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他后来亲自出面向媒体和公众澄清，称自己健康状况良好。竞选开始后，他每天都会坚持完成行程。而且，他开始逐渐敞露心扉，让人们看到了他内心洋溢着的魅力、活力、幽默和热情。竞选后期，他开始朝支持者挥舞自己的拐杖，而底下支持他的队伍也愈发壮大起来，越来越多的民众被他充满勇气、永不言败和乐观生活（joie de vivre）的品质所吸引。他在众议院多年为国效力的经历逐步为人们所熟知，似乎有一种魔法在默默地发挥着作用，把他从一个普通的政治家变成了所有加拿大人都最喜欢的“杰克”。对于所有曾与癌症殊死搏斗过的人而言，“杰克”就是希望的象征。这一转变对他的参选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我毫无贬低他的意思，但我不得不说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必须要归功于他手法娴熟的政治诡计。在魁北克，他赌上自己在蒙特利尔的家族根基，赢得了当地民众对新民主党的大规模支持。他在魁北克声称，如果魁北克想要寻求独立，他可以接受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但在其他地方，他却说简单多数的投票方式必须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向选民争辩道，像他这样在一个地区这么说，在另一个地区却那么说的做法绝不可取，尤其是对国家统一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议

题而言。但选民仍然朝着杰克蜂拥而去，我们说的话他们一个字也没听进去。

我不确定我是什么时候才发现大势已离我们远去的。当然，我的办公室主任彼得·多诺洛肯定知道我们在隔夜民调的表现，但他既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无论如何，现在再想改变我们的战略已经太晚了，而且我也太过享受在那些人头攒动的礼堂里向支持者宣讲的乐趣了。我记得当时自己终于意识到那两场分别用英语和法语进行的电视辩论对我而言其实毫无益处。当时，排练和预演这两场辩论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以至于我们都没能在上场前制定出一个基本的战略来。毕竟，这两场辩论是我唯一可以告诉国人我并非只是过客的机会，也是我唯一可以向他们展现魅力和亲和力的机会。然而，我却只顾着没完没了地反击哈珀先生，或许在选民眼里，他们看到的不过是又一个气愤的派系政客罢了。杰克·莱顿此前已经历过三次全国辩论，他更明白该如何应付对手。在辩论现场，他的脸上时常挂着笑容，也会安静地等待合适的时机来加入论战。当我在批评哈珀的做法是在侮辱我们的民主时，他突然跳进来，拿出我在议会的考勤记录，教育我说如果我想竞选一个更高级别的公职的话，那我起码应该在工作的地方现身才行。他知道我当时是在全国各地的城镇同选民接触，但他仍然毫不客气地抡起拳头朝我打了过来。关于这些辩论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当总理在辩论结束后回到就在我们边上的休息室时，他们的屋子里响起了一阵欢呼。杰克对我的批评，在保守党人听来无异于一曲优美的乐章。透过隔墙传来的一阵阵发自肺腑的欢呼，已将方才辩论的真实情况悉数告诉了我。

5月1日，我们在多伦多一家酒店的套房里等待选举结果出炉。鉴于之前的形势，我们心里已然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接下来会发什么，也没有任何一个专家能够预料得到最后的结局。先是魁北克变了天。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魁北克集团竟在自己的主场惨败，连党领袖吉勒斯·都赛佩也丢了在自己选区的议席。大量魁北克民族主

义者都把票投给了杰克·莱顿的新民主党。无论是支持魁北克独立的选民，还是支持联邦主义国家统一的选民，大家显然仍未淡忘90年代自由党的财政丑闻，后者大量将选票投给了杰克的政党。大选前几周，新民主党在魁北克境内预料之中的大势，也引来了不少担忧新民主党会异军突起的民众的反对。然而，这些对新民主党人心存疑虑的选民也并没有把选票投给我们，而是投给了保守党。在此后一个接一个的选区里，更多原本应该投给自由党的选票流入了另外两个政党手里——新民主党的得票数激增，这导致忧心新民主党的选民转而支持保守党，使原本应当属于我们的选票不断流向保守党。我们原先的议席开始像保龄球一样被接二连三地打倒在地。我和一群大惊失色的工作人员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着屏幕上的计票结果，亲眼目睹了我们这个政党一个世纪以来苦心经营的政治地位在一夜间的彻底崩塌。夜还未深，我便知道这次我连自己的议席也保不住了。

那天凌晨，先前集结在酒店宴会厅里的支持者渐次散去，只留下一小群惊魂未定、神情忧郁的选民。我面对着他们，站在讲台上，向过去五年来曾经支持过我的人们表示感谢。你没办法为这种场合的发言做准备，我唯一记得自己说了的话是——失败是位伟大的老师，我会尽己所能地吸取所有教训。

这次失败无疑是对我的一次否定。如果仅仅是如此，或许我还能接受，但事实上这远不止否定我自己那么简单，这还是对许多优秀、忠诚的议员的否定，对许多出色的候选人的否定，更是对这个国家一个世纪以来坚守的政治传统的否定。我深知，就算只是简单地消化这个结果，也要花费我们很长的一段时间。巧兰和我一路穿过已经空无一人的宴会厅，跨过仿佛写满了败选的满地碎屑，兀自走回我们的房间。一路上，我仍然不敢相信刚才发生了什么，但我同时也很平静。所以这就是政治吧，我心想。要是你不曾懂得政治会让你变得一无所有，你也就从未真正读懂过政治。

第二天清晨的那一刻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因为它展现了政治的另一个侧面。当时我们已离开了酒店的房间，正穿过大厅准备坐上前往机场的巴士，我们却在酒店门外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人包着头巾，是一家汽车公司的老板，五年前我从政的第一个礼拜就曾拜访过他公司的调度室。从一开始，他就是我们坚定的支持者，直到如今这最后一刻，戴着另一条漂亮的头巾、优雅如初的他仍然坚定地站在我们身边。只是这一次，巴杰特·西坎德的脸上挂满了泪痕。

---

1. http://www.liberal.ca/newsroom/news-release/speakers-announced-for-canadaat-150-rising-to-the-challenge/.

2. 维米岭战役发生在1917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部战线的一次战役，也是加拿大军队第一次独立参与的战争。这场战役以加拿大从德国手中夺过维米岭的控制权结束，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协约国的士气。——译者注

3. http://www.scribd.com/doc/50397233/Speaker-s-ruling-BRISON-PrivilegeProduction-of-Document. 加拿大一家本土的基金会——萨马拉（Samara）——已将加拿大的民主治理情况列入其工作的中心议题。参见http://www.samaracanada.com。

4. Nancy Rosenblum， On the Side of the Angels： An Appreciation of Parties and Partisanship（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5. 或译作“意图伦理”“心志伦理”。——译者注

6. Max Weber，“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 W. Mills， eds.， From Max Web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p. 77-128.

7. Jimmie Maxton，引用自Bernard Crick，In Defense of Politics（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2），p. 138。

8.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Michael Howard and Peter Pare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

9. Amy Gutmann and Dennis Thompson， The Spirit of Compromise： Why Governing Demands It and Campaigning Undermines I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Arthur Isak Applbaum，Ethics for Adversaries：The Morality of Roles in Public and Professional Lif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10. Avishai Margalit， On Compromise and Rotten Compromis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

第九章 听出租车司机怎么说

就这样，巧兰和我回到了斯托诺韦，心情沉郁地开始打包行李。这让我想起曾看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上那个穿着工作服的男人们在唐宁街10号的后门口，把行李抬上搬家卡车。照片摄于1979年，那一年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刚在选举里败给了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搬家卡车的到来，就和一位国家领袖宣誓就职一样，象征着至高无上的人民主权开始行使权力。现在，帮我们搬家的卡车正在后门等着我们，车上的工人叫我们快点打包东西。这个慢慢被清空的房子曾让我们感到过家一般的温暖，如今我不得不从书架上把我的书一本本地抽出来。一旁画像上的劳雷尔，这位史上最伟大的总理，仿佛始终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我。在我之前，自由党历史上只有两位党领袖最终未能出任总理。现在，我成了第三个。

一天前，我还有一架专机、一众保镖、上百名工作人员、一辆专车、一位司机、一位主厨和一位管家随时恭候我回家，最关键的是，昨天的我还有政治未来。仅一天之隔，属于我的未来就已烟消云散了。现在的我不仅面临失业，就连退休金也领不了。一般而言，任议员满六年就能领退休金，可我的任期离符合要求还差了五个半月。所以，我一边将行李装箱，一边打着电话想给自己找个工作。最后还是一位与我相识了三十年的老友罗布·普里查德（Rob Prichard）出面救了急。在他分别给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Massey College）院长约翰·弗雷泽、多伦多大学校长戴维·内勒和蒙克全球事务学院（Munk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主任贾尼丝·格罗斯·斯坦（Janice Gross Stein）打了三通电话后，我又得以重新回到过去的生活，做一名人权和政治学领

域的教书匠。而对于我那些败选的同事而言，要重新开始新生活就不像我那么容易了。

我已经整整五年没有自己开过车了，所以我败选后的第二天就去更新了驾照。那天他们帮我拍了张照片，现在连我自己都快认不出那上面是谁了。照片上的人愁眉苦脸、眼神失焦，脸上写满了消沉和忧郁。

清理了我在国会山办公室的桌子后，我便出门向仍然心有余悸的议会党团告别，而现在我们的党团只剩下原先一半的成员了。安慰败选的同事同样让人感到沉重，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那么出色，甚至为了党的利益牺牲了自己的议席，他们中还有人和我一样仍在挣扎着消化这场惨败。有人发誓要“卷土重来”，但你看得出就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话。其他人则很平静地接受这次失败，就好像这只是自己人生中不得不翻过去的一个篇章而已。至于那些被我称为“冰场老鼠”（rink rats）[注]的同事们，他们打心底里喜欢这份在众议院的工作，因此不免在告别时悲伤难耐，我看了也觉得于心不忍，尤其因为我感到是自己的失误酿成了这次滑铁卢，我应该为他们的命运负责。这次失败就像一次自然灾害，像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吹倒了森林里的每一棵树。大部分党团同事对我的不幸表示了同情和慰问，那些心里苦不堪言的同事则在一旁一言不发。当天不止一个人上前对我说，我打了一场漂亮的选战。没有任何人对我表示责怪，因为我已经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失去议席的代价。巧兰陪我参加了最后一次党团会议，当有党团同事发现她独自坐在一边用手捂着脸哭泣时，大家纷纷站起身来，为她热烈地鼓掌。这是她应得的，毕竟在这条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的路上，没人比她更加辛劳。随后，我向党团做了最后一次发言。结束后，我向所有的朋友们表示了我由衷的感谢，没有提到我的政敌一句。最后，我牵着巧兰的手，最后一次迈出了议会的大门。

之后的几个礼拜，我才开始体会到败选这一现实的真正意味。原来，没有什么工作比前政治家（ex-politician）更加属于过去了，尤其是败选了的前政治家。因为再也不会有什么人给你打电话了。我之前在职时，偶尔会有些拒绝接受当下状态的前政治家让我感到困扰，所以当时我就发誓，要是我败选了，我至少不会对自己的继任者妄加评论、随便批评，不管这位继任者是谁。如果你的政治生涯已经确凿无疑地画上了一个句点，那你最好还是尽快接受这个事实比较好。既然选民们已经决定了我的命运，那现在我的任务就是接受他们的裁决，然后继续向前。

当然，所有这些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我还在竭力摆脱败选的伤痛时，我逐渐意识到，人在失败后都会面临这样一个灵魂层面的挑战：如何找回先前的资格。对我来说，当初为了从政，我舍弃了自己作为一名写作者和思想家的资格。如今，败选了的我又失去了做一名政治家的资格。败选不仅剥夺了我作为政治家的地位，也否定了我作为写作者和思想家的身份，因此，无论是在先前从政时的同事那里，还是在如今大学校园里的新同事那里，我的处境都很难堪。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对别人还有任何价值可言。

庆幸的是，这个自怨自艾的阶段很快就结束了，因为败选其实也有我从未预料到的令人惊喜的一面。过去五年，我一直生活在公众的视野里，见到任何人都希望能俘获他们的支持，得到他们的选票。数不清的陌生人对我的看法，就这样成了我生活中仰赖的全部。如今，他们已决定了我的未来。可让我无比惊讶的是，在我败选后，仍然会有这么多陌生人出手相助。选举结果出炉后，党总部的邮箱里涌入了许许多多感谢我多年为民服务的电子邮件，总部的工作人员把它们一一打印出来装订成册，送给了我。我所到之处，都会有民众上前来向我道喜，就好像我是个刚刚战胜病魔的勇士一样。“请继续努力”，许多人这么对我说。“干得好”，另外一些人开车从我旁边经过时透过车

窗大声对我说。我想他们中有些人可能错以为我是刚刚在真人秀电视节目里被淘汰出局的参赛选手，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是。

我曾以为，人们都会在我走上坡路的时候称赞我，而在我走下坡路的时候对我指指点点，但我在败选后的生活却并非如此。大选后一周，我出门去干洗店拿洗好的衣服，在返回我们在多伦多的公寓的路上，经过一个消防站，门口有一众消防员正在休息，等待出勤。他们见到我后都纷纷围拢了过来，向我表示慰问。“一场硬仗，”他们中有人说道。我回应道：“不会比灭火更难啦。”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在我们公寓楼对面的干洗店里，在平板电脑上看着韩剧的米歇尔来自越南，她是我们的好朋友，只要是我们送去干洗的衣服，她似乎从来都只收我们低于原价的费用。那天见到我，她也从收银台后走出来，给了我一个拥抱。还有一位锡克族卡车司机开着混凝土搅拌车从我旁边经过时，朝我热情地挥了挥手。这些友好的陌生人的态度让我明白了一件事，在政治里，不管政治家再怎么糟糕，媒体再怎么咄咄逼人，其实人民都能处之泰然。当这么多善良的陌生人上前告诉我他们把票投给了我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原谅了我，不会再向我追究我们为何会败选了。

当然，你自己还是会因为败选感到自责。你会为自己没能过上理想的生活感到悲伤，也会为自己再也没机会施展宏图伟略而感到忧戚。现在，我终于想明白自己是为了谁才从政的了，可我再也没机会为他们做些什么了。你会因此伤感不已，正如我当时所经历的一样，各种难过的情绪会不禁涌上心头，然而，渐渐地，这些情绪都会在你的生活里烟消云散。你会发现，能够自主安排时间的感觉真好，能够重新有时间好好读书的感觉真好，能够尽兴地听一场音乐会的感觉真好。败选不仅让你重获自由，也让你开始洞彻事理。当你在最不期待自由的时候重获自由，你会惊讶地发现此时自己已经能释然面对失败。

我重新开始阅读。随着阅读的深入，此前在乏味的政治生活中慢慢被消磨殆尽的求知欲再一次开始萌动。败选后的三周内，我便开始为秋季学期的课程备课。坐在梅西学院的办公室里，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政治生涯和我即将再次教授的政治理论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

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全世界的课堂上布置给学生阅读的政治理论，大都不是那些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人写的，而是剩下的失败者写的。2000年来，西塞罗（Cicero）笔下的《论责任》（*On Duties*）与《论演说家》（*On Rhetoric*）是任何修习政治的学生都必读的书目，但这两本巨著的作者却曾在写给朋友的信里这样说道："我曾坐在甲板上，手握可以操纵整个国家的船舵，而今就连船的底舱都快没我的栖身之地了。"[注]当时说这话的西塞罗，这位罗马共和国的杰出捍卫者和曾经的执政官，或许并不知道自己很快就将在后三头同盟下属的屠刀下毙命。至于马基雅维利，他在1512年被废黜一切职务，随后被投入监狱，遭到严刑拷打，出狱回乡后才开始写作。尽管后来他因被排斥和否定而郁悒成疾，但他终究还是写就了《君主论》和《论李维》（*Discourses*）两部著作，成为过去500年来政治课堂上的另一必修内容。如今，当我读起他彼时写给朋友弗朗切斯科·韦托里（Francesco Vettori）的信件时，我是那样感同身受。他在信里描绘了一个落败政治家的生活，白天在庄园里捕鸟，去森林砍柴，到客栈里去向朋友们发发牢骚，晚上回到家，在四壁图书的围绕下，穿上他的宫廷服，投入早已消逝的古罗马经典中去，聊以自慰。[注]另外一位在政治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大人物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始终都生活在世人这样的批评之中：作为政治家的他，远不及作为思想家的他来得出色。他在1790年所写的《反思法国大革命》（*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对于人们的革命热情做了最为深刻的保守主义评述，但却被诗人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在一首令人难忘的反讽小诗里嘲弄了一番。[注]

他，为无垠的宇宙而生，却收束自己的思想

为党派利益放弃探寻人类生存的意义

纵然博览群书，到头来还是得声嘶力竭地

求汤米·汤曾德投他一票

为了确保美国修宪能够得到公众的支持，詹姆斯·麦迪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合著的《联邦党人文集》（*The Federalist Papers*）至今仍是历史上最为成功和生动的政治宣传手册。然而，麦迪逊在位时却并非一位成功的总统。1812年战争期间，作为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曾从白宫出逃的总统，他遥望着被英军肆意蹂躏的首都，只能忍气吞声。至于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他笔下的《论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是历史上视民主为举世向往之文化归宿的最为伟大的政治观察笔记。可是，整个19世纪40年代，他都只是法国国会一个不起眼的众议员，终日只能写些挖苦议员同事愚蠢发言的小文。1848年革命后，他曾短暂地进入内阁担任部长，直到1851年被迫屈辱地离开政界。[注]或许是世上最为杰出的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1865年至1868年在英国出任议员期间，曾对他的议员同事在立法上的无能感到愤恨恼火，可是，他在第二次参选时就落败了。[注]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是位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在1919年议会选举时，他甚至都没能得到民主党的候选人资格提名。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他饱尝了屈辱与失败的痛楚。但他作为一名理论家，我们每一年仍要求学生阅读他的著作。

为何在理论上敏锐过人的政治学者时常会在实践上失利？这个现象倒是有助于我们了解从政究竟需要哪些独特的天分。在理论研究上不计成败的率直、缜密、意志力，以及对独创性的敏锐探寻——这些都是理论追求道路上宝贵的品质，同时也成了政治实践中累赘的劣

势。要想在政界获得成功，谨慎和掩饰才是最重要的制胜法宝。这一点说明，上述的理论家之所以大都在实践上失利，正是因为他们没能按照党派纪律的指示缄默不言，或是没能在应该阿谀奉承的时候张口说话。另外，理论家也可能缺乏以下这些让成功的政治家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高尚品质：适应性强，做事灵活，及时抓住命运女神赐予的好运气，对时移势易的敏锐直觉，对变化中的真相的敏感，以及领导众人、施展魅力和鼓舞人心的高尚才能。

思想家三天两头贬低实干家，殊不知这么做对他们并没什么好处。据说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曾在评价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时说，这人只有二等的才智，却有一等的气质。霍姆斯这么说确实有些傲慢。(注)罗斯福本人曾很高兴地承认，自己除了是一个基督徒和民主党人之外，不信奉任何政治理论。确实，也没有任何理论家可以像他那样，既能使一个现代的自由国度重获新生，又能让深陷大萧条的人们重拾对于政治的信心。同样地，那些天生的实干家也会时不时对那些更善思辨者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以实干家们才会喜欢说，“能者做事，不能者教书”。但他们说这话时恐怕是忘了，历史书都是那些教书匠们写的。

如果你认为我觉得自己能和上述这些思想家们相提并论，你一定不会对我有什么好的评价。事实上，不管是我的实际经历，还是我的思想成果，都远远无法与他们比肩，我只不过是在力所能及之处寻求一些安慰罢了。我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是，政治上的失败也会赋予人某种权威，当然不同于成功给人带来的认可，但却是对自己亲身经历的权威。这些政治上的失败者已经为自己的获知付出了代价，既然他们已用现实生活中实实在在的财富作为吸取教训的代价，那他们就有权发言。

这些写作者在另一个方面又是启迪人心的。他们所经历的无一例外都是一些特殊的历史阶段——即将走到穷途末路的罗马共和国，落入独裁者手中的佛罗伦萨共和国，肇建伊始的美利坚共和国，路易·菲利浦（Louis Philippe）统治下百业凋敝的法国，王室全盛时期的英国议会，1918年后民主便胎死腹中的德国——并将这些特殊的阶段上升到对于政治本质的一般性的反思。他们知道所有的政治都具有地域性的——和我们所说的一样——是由架构起政治斗争的制度和历史背景塑造的，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也在试图揭示政治最核心的奥秘，探寻这种人类最高尚同时又最错综复杂的活动的根基。感谢他们基于自身的经历提炼出普遍理论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些曾在政治一线效力过的人们得以理解他们曾经历的种种遭遇。对那些打算从政的新手而言，这些伟大的写作者可以不加掩饰地让他们看到政治游戏的真实面貌，只要那些新手愿意倾听，总能有所收获。

败选后又过了几周，我特地跑去向彼得·芒克（Peter Munk）致谢。这位富商曾慷慨地资助我参选，后来却又毫不犹豫地把自己那票投给了我的对手。像他这么友好的老兄为数不多了。如今随着党派偏见愈演愈烈，能够同时为不同政党慷慨解囊的人越来越少了，但他是个罕见的例外。在午餐桌上，他向我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他亲手创办的克莱尔顿公司是如何走向破产的故事。当时破产清算结束后，他走在金融区的大街小巷，感觉自己成了所有人的众矢之的。后来，他又再次起家，比从前赚的还要多得多，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失败是什么滋味。败选后的好几个礼拜里，我从许许多多成功人士那里收到了大量如何走出失败阴影的建议。“写部浪漫小说，”房产开发商埃尔维奥·德尔赞托建议说，“赚点钱来做些改变。”曾在担任安大略省省长时受到重挫的戴维·彼得森对我说，败选有这样一个好处，你重新拥有了叫别人滚开的权利。彼得森是“好好活着就是对敌人最好的报复”这句话活生生的证明，虽然他也承认，自己花了好几年才终于把失败的痛楚“排解”干净。“激烈的体育锻炼很有效，”他说，“比如砍柴、清理灌木丛、帮你自己建个小木屋什么的。”另一个朋友说，至少我能写一本好

书了。他以为他这么说的时候是在安慰我，但我告诉他，我当初并不是为了写本好书才从政的。

让我记得最牢、也是促使我真的想要写下这一切的，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说的一番话。当时我刚坐进他的车里，他就拉下后视镜，想凑近些看清我的脸。

“你是我心里想的那个人吗？”

“我是。”我说。

“我把票投给你了。”

“幸好还有人给我投票了。”

他随后耸耸肩说：“这就是政治啦。”

他就好像是在说：“看，世界本就如此。你以前不知道，你现在总知道了吧。”在随后的交谈里，我才得知他来自黎巴嫩，已经在加拿大生活了20年。他不仅对自己这个新祖国的民主政治有着出租车司机普遍都有的独到见解，而且回忆起故乡黎巴嫩的宗教政治，也不时透露出讥讽的态度。我逐渐发现，在他的认知中，“政治”这个词所代表的正是那个可以塑造生命形态的、混合了意志和机遇的奇怪组合。打个比方，某个城市如何授予出租车奖章，是政治；独裁者如何继续统治他那民不聊生的国家，也是政治；黎巴嫩是如何被内战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同样是政治；还有，正如他所说的，好心、无辜的百姓是如何被暴打的，这同样也是政治。当我付了车钱向他告别后，我心中升起了一股强烈的欲望想要记录下这种政治，这种残酷的游戏，这种命运和意志充满戏剧性的相遇，还有这种恶毒与高尚共存的状态，因为我和他一样为之着迷。

8月22日，距离获得此生最大的一次政治胜利才三个月不到，杰克·莱顿便因癌症在家中与世长辞，享年61岁。我和巧兰，还有其他上千人，在多伦多罗伊·汤姆森音乐厅（Roy Thomson Hall）参加了他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穿过大街小巷步行回家。一路上尽是悲伤的人群，挣扎着面对命运这般尖锐的讽刺。我记得我当时曾与一位女士有过一段对话，她想向我解释为什么媒体不应该在杰克参选期间批评他没能披露自己真实的健康状态。“我也是个癌症的幸存者，”她说，“要想熬过去，你只能说你不得不说的，你也只能信你不得不信的。这和政治没关系。”我只能表示同意。

8月下旬，我去看了红袜队（Red Sox）和蓝鸟队（Blue Jays）在多伦多罗杰斯中心（Rogers Centre）的比赛。我喜欢看棒球，我母亲也是。在我小的时候，我和母亲最享受的欢乐时光就是在我家那台黑白电视上看棒球比赛。就连比赛里那些枯燥无味的部分，我也同样喜欢，因为它让我有了更多遐想的机会。随着脚边的啤酒罐和热狗包装纸越积越多，我开始意识到，和政治最相近的正是体育比赛。两者都有不同的队伍参赛，都会在更衣室里互相打趣，被球打到时都一样疼。问题是，我们总称政治是场比赛，可它并不是。政治里没有裁判，规则是双方边打边定的，你没法抗议对方犯规或者越位，因为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比赛则不同，你必须按规则来。在政治里，你只管打球就是了，因为只有胜者有权更改规则。

这让我想起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里写的一个桥段。当时，安德烈公爵正在准备迎接博罗季诺战役的到来，他在上战场前曾比较过打仗和下棋的区别。在象棋里，象永远比卒大，但在战场上，仅仅一个排的士兵也可能击退对方一个连的兵力。[注]换言之，战争是没有规则的——只有战略。只有这些无法预测的元素——意志、勇气和机遇——能够决定战果。这些似乎也适用于政治，一种将技巧、意志力、运气和机会高度融合的产物。

到了傍晚，天色渐暗，一层阴影开始笼罩整个场地。我坐在看台上，反思失败在棒球和政治中的意义。“所有的政治生涯最后都会在泪水里终结”，有人曾这样说道。体育比赛也是一样。所有运动员在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时，无论多么懊悔，都必须接受自身的肌肉记忆、敏锐直觉和内心的战火正在不知不觉间消逝的事实。然而，失败并不只存在于所有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结里，它也是那些成功瞬间的一部分。对那些历史上最杰出的棒球手而言，他们每打出十个球，一般也只有三个能够上垒。当天比赛的最后一局，我开始关注那些击球失败的球手们的表现。他们会默默地回到球员席，不会在意周围嘈杂的观众，也不会把头盔扔到一边，而是沉浸到自己的世界中去，在脑海里调整姿势，为下一次上场打出一个绝好的全垒打做准备。这些技术纯熟的棒球选手们工作时的自律，让我十分钦佩。等到比赛结束，看台上的人群逐渐散去，我回想起了那个我输掉选战的夜晚，当时我站在讲台上面对一众神色忧伤的支持者讲话时，不断有人在我眼前离去，消失在门外深沉的夜色里。在我的政治生涯里，我自始至终都知道，台下的人群中或者电视前的观众间，一定有着那样一位年轻的少年或少女在看着我的时候，会这样想：我也可以变成他。那个年轻人仍然还在。我希望他或她还会这么想：他没能做到的事，我会做到。如今，我真诚地希望能够给予他们我所有的鼓励。我没做到，但你可以。

我想起退休了的政治家埃莉诺·卡普兰曾经对我说的一句真理：你永远不会脱离政治。或许你已经被送回到看台上，但你仍然在观赛。我如今便身处看台，看着和我同处一个年代的人上场，各自站到各自的位置上。同时，我也在静候一位天赋异禀的好手出现。我笔下的所有文字，都是为了那些曾经对我报以希望又目睹我失败的年轻男女而写的。我希望，在属于他们的时机来临时，我写的这些文字可以在他们的成功路上，助他们一臂之力。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思考我到底是为了谁在做政治。如今，我知道了。我也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理解

政治到底是什么。如今，我也明白了，这两个问题正是我最后想谈的。

---

1. “冰场老鼠”指非常热爱冰球，为了能得到打球的机会而坚持在球场打工的年轻人。——译者注

2. Marcus Tullius Cicero，How to Run a Country：An Ancient Guide for Modern Leaders，ed. and intro. by Philip Freem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2），p. xi.

3. Niccolo Machiavelli，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ed. and transl. David Wootton（Cambridge：Hackett，1994），pp. 1-4.

4. Edmund Burke，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burke/.

5. Alexis de Tocqueville，Lettres choisies，Souvenirs，1814-1859（Paris：Gallimard，2003）.

6. John Stuart Mill，“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 V. in J. S. Mill，On Liberty and Other Essays，ed. John Gr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7. 参见Louis Menand，“How the Deal Went Down”，New Yorker，March 4，2013。另外参见Isaiah Berlin，“President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i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An Anthology of Essays，ed. 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7），pp. 628-637。

8. Leo Tolstoy，War and Peace，transl. Richard Pevear and Larissa Volokhonsky（New York：Vintage，2007），Book 10，ch. XXV：

“不过大家都说战争就像下棋。”他说。

“是的，”安德烈公爵答道，“但是有点区别，下棋每走一步，你可以随便想，下棋不受时间的限制，另外还有一点区别，那就是马永远比卒子强，两个卒子比一个卒子强，而在战争中，一个营有时比一个师还强，有时反倒不如一个连。没有人能弄清楚军队的相对力量。相信我，”他说，“倘若说参谋部的布署具有决定性的作用，那么，我就在那儿从事部署工作了，但是我没有那样做，而荣幸地到团里服务，和这些先生们共事，我认为明天的战斗的确取决于我们，而不是取决于他们……胜利从来不取决于将来，也不取决于阵地，也不取决于武装，甚至不取决于数量；尤其是不取决于阵地。”

“那么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士气——我的，他的，”他指着季莫欣说，“每个士兵的士气。”

第十章 召唤

读罢我的故事，或许你会下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政治这个肮脏的游戏和你没有丝毫的关联。我希望，你在读完这本书后能有所改观：政治是一场高尚的争斗，它所要求的自律、明判与内韧远比你以为自己拥有的要多得多。政治的高贵之处在于，你会为了自身坚守的信念而竭力辩护，也会为了维护整个民族公共生活的最高道德而动员他人与你携手奋斗。政治的考验之处在于，你既要试着改变必须改变的事物，又要保留必须保留的东西，还要知道两者的差异在哪里。

从政以前，或许曾有前辈告诫你要事事小心，切勿说或做那些对前途无益的事。他们也会告诫你不要累积心理包袱。当初，我就是背着很多包袱进入政界的，它们让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比起时刻戒备的生活，还是早些付清代价为好。时刻戒备的生活并非真正的生活。如果你把谨慎当作自己的信条，你的勇气就会在你需要崭露锋芒的时候离你而去。所以，除了谨慎，政治还对你有更多的要求。

你无法提前预知前路会遭遇什么，但说真的，缺乏预知未来的能力倒也是上天对生命的一种恩赐。不要害怕冒险，也不要害怕失败。如果你能把自己从失败等于耻辱的执念里解放出来，你就不会被失败击垮，也不会被成功惯坏。当然，你仍然应当竭力争取成功，不为失败找寻任何借口，可是比成败更重要的，是要学会宠辱不惊。当你踏足政界，你总能控制那些只取决于你自身的变量——你的勇气、意志、决心和幽默感——但你却注定无法控制其余那些会发挥作用的外生变量。既然所有的政治生涯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命运女神决定的，你就没有理由在命运不济时怨天尤人。不要误认为你能控制得了自己的命运，那不过是狂妄罢了。

拥抱政治生涯就意味着摆脱你过去天真的一面。它意味着，就算你尚不知晓做某件事情的代价是什么，你也必须在知晓之前心甘情愿把代价付清。它还意味着，你要认清自己，要坚持你从政的初衷不动摇。除非你能让那些选你上台的选民们相信你是在为他们而战，否则你不可能成功。如果你不是为了他们而战，你一开始就不该从政。或许，你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在为谁从政，因为只有在和陌生人上百次的会面后，你才会逐渐地把他们的事业当成是自己的一样，去为之奋斗。他们从此会成为你效力的对象，你也必须在他们面前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成为人民的代表，这种代表与被代表的关系将会永远地改变你自己，它也同时会给你带来丰厚的回报。如果他们信任你，他们自会与你同甘共苦。

人民对你的忠诚不是与生俱来的，而需要你每天去努力地争取的。你要坚持言行一致，要向他们证明你始终和他们站在一边，这样才能争取来他们的忠诚。如果你能让他们笃信你的资格，那就算他们有所异议也仍会拥护你的立场。如果他们相信你是在真心实意地坚守自己的信念的话，那他们也会放心地追随你的领导。

公民分辨得出谁需要的是肯定，谁需要的是尊重。你不必总受人民拥戴也能成功。你的人民不必非得喜欢你，但他们必须尊重你，他们必须感受得到你的正直，相信你在为他们拼搏。

你的对手还会试着给你下定义，他们一旦成功就意味着你会被打倒，因此你必须掌控好你自己的故事。你要说的这个故事，应该是关于你理想中的社区和国家的，应该是能将你的命运和他们的命运、你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你的事业和他们的事业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故事。你需要把你准备推行的政策和你个人的背景揉到一起，让整体的叙述足够有说服力才行。你要说的故事无外乎如何巩固人们的公共生活，如何与人民团结一心去对抗那些包括不平等、忌妒、分裂和仇恨在内不断让我们的社会四分五裂的力量，以及如何捍卫所有寻求进步

的政治都需要坚守的永恒的立场——我们必须共享命运，公正待人。一个关于命运共同体和正义共同体的故事必定是属于整个国家的，必定来源于所有让我们精诚团结、忠于人民、忠于体制的共同经验。这个故事还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生活应该比现在的更好。

对抗是政治的本质，你必须要拿出一个战士的气势才能在对抗中获得优势。人民是不会同一个连为自己辩护都做不到的人站在一道的。当然，被别人攻击势必是痛苦的，但你真的不必把它放在心上。长大成人的过程本就是一个学着不让任何事情往心里去的过程——你当然应当想尽方法捍卫自己的荣誉与尊严，但永远别让他人的人身攻击触碰到你内在的自我。别让对手的圈套得逞了。在任何时候，你都必须坚守自己的资格，捍卫自己发表意见的权利。

在政治的格斗场上，你损失了多少就会赢得多少，但一个明智的政治家会知道什么时候出拳才光明磊落，什么时候出拳是乘人之危。或许选民会把票投给那些穷凶极恶的政客，但他们不会喜欢那些人。你从政是为了赢得人们的尊重，而不是畏惧。

你不会想做一个头脑简单的人，但你也同样不会想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而且，你也不会屈服于那些说选民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在乎他们想要什么的嘲讽。你必须对人民的判断保持信心，不管他们是不是把票投给了你，不管你对他们的信心经受了多少考验。如果你对公民基本的理性都不抱任何希望，想必你也不会有推动民主体制运作所需要的信念。只有当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人民的判断，民主体制的道德优势才能得以显现。有时，接受他们的裁决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但除了他们，这世上就没有其他裁判了。

为了享受政治并且让政治更完善，你必须相信你是在为每一个人服务，不管他们有没有投票给你。就算政治现实迫使你必须选择让某个集团的利益凌驾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之上，你也永远不能忘记，正是因为你做出的这个选择才让一方付出了利益受损的代价。要想做一

个出色的政治家，就必须为选你上台的人民负责，也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我们的年代，这份对人民的信念正在经受考验。全世界一半国家的政权都在政治上奉行寡头专制，在经济上遵循市场原则。这些国家都认为自己的政体，相较于我们这些自由社会所奉行的充满党派偏见、分裂又笨拙的民主政治，要来得更优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假定，民主会在这场政体之争里赢得最终的胜利。而且，我们也无法保证历史会站在自由的一方，更无法确信民主最终可以打败它的这些对手。从这样一个国际视角来看，政治家不仅要承担在本国捍卫民主的职责，更要承担起在全世界维护民主价值的重任。你之所以身处这个舞台，正是因为民主最需要维护的，不在于言而在于行，不在于空泛的理论而在于实际的行动。

你不仅是民主的监护人，也是你与人民之间信任关系的监护人，更是你祖国奉行的制度的监护人。如果你有机会在立法机构为国效力的话，试着记住你第一天上班时那种奇妙的感受，因为当你一坐进属于自己的议席时就会意识到，这一切正是因为许许多多普通人投给你的选票才得以可能。另外，也试着记住，你不会比这个国家的制度更聪明。这些制度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对于传统、规则，甚至是一些愚蠢的规则的尊重，既是对人民主权的尊重，也是对让我们生活在自由之中的民主的尊重。尊重制度意味着你将承担起永远不把对手看作敌人的义务。政治不是战争——它是我们唯一可以仰赖的代替战争的选择。缺失了尊重对手的文化，民主将无法运作。在政治里，你既要对自己、对党派、对投票给你的人民忠诚，你也要对你的国家忠诚。针对不同对象的忠诚之间确实会出现矛盾，但在你真正遇到这些矛盾之前，你必须明白，有时你必须将对国家的忠诚放在第一位。

在整理这些不同的忠诚的过程中，对政治本身表达适当的敬意是有益的。我们常把政治看作一场游戏，可世上恐怕没有任何游戏会像政治一样严肃。毕竟我们都是法律的制定者，可能有一天我们就必须投票决定，要不要把年轻的男女士兵们送上战场，让他们直面死亡。当它的结果可以严重到这种地步，它当然不是一场简单的游戏而已。

政治不是一场“丑人多作怪”的戏码。曾和我共事过的政治家们都不是为了博人眼球或者变得小有名气才从政的。他们无不希望能以某种形式为人民服务，再以是否曾为本选区的选民做了什么实事为标准来评判自己的表现。这才是关键的杆秤，才是鞭策自己保持诚实的戒尺。

政治也不是一种职业，因为它不像一般职业那样存在可被教授的标准和技巧。政治是没有技巧可言的：它并非科学，而是一种克里斯玛式的艺术，取决于一个人的游说能力、雄辩能力，以及血性的毅力，而这些都只能在生活中慢慢领悟，没有任何学校或者咨询师可以教你。从工作的稳定性上来看，政治也不是一种职业。你的政治生涯可以在顷刻间被颠覆，因此你必须要确保你在从政前就有一个可以让你在踏出政界后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谋生方式。知道自己能经得起失败的打击，才是你能坚守清正廉明的最好保证。

1919年1月，马克斯·韦伯在革命浪潮下的慕尼黑，为当地担惊受怕的学生做了一场演讲。“一战”战败后，德国频现街头暴力，而那些学生们虽然置身其中但仍在努力不让自己迷失方向。韦伯在讲话中区分了两种人，一种人靠政治生存，另一种为政治而生存。只有那些为政治而生存的人才能听见政治的召唤。他在演讲最后对学生说的那段话值得我们在此重温：

> 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条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除非你

执著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但只有领袖才能做这样的事，他不但应是领袖，还得是十分平常的意义上的英雄。即便是那些既非领袖又非英雄的人，也必须使自己具有一颗强韧的心，以便能够承受自己全部希望的破灭。他们现在必须做到这一点，不然的话，他们甚至连今天可能做到的事也做不成。一个人得确信，即使这个世界在他看来愚陋不堪，根本不值得他为之献身，他仍能无悔无怨；尽管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仍能够说："等着瞧吧！"只有做到了这一步，才能说他听到了政治的"召唤"。(注)

我会劝你把政治看作一种上天的召唤。这个词常为神父、修女和一些神秘主义者所用，但用它来形容一个如政治这般罪恶又世俗的工作却也有些吸引人的地方。它准确地把握住了政治最困难的地方——在背负世俗和罪恶的同时，坚守忠诚和无畏。你在为他人服务的过程中成就了你自负的理想。你希望你能通过工作上的行善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这个过程里，你会为了追寻本应干干净净的目标而把自己的手弄脏，因为你在用人类的恶习——狡猾和无情——在为高尚的道德——正义和尊严——服务。你所服务的对象——人民——是人世间剩下的唯一具有神性的，因此你必须学习遵从他们的裁决。这些裁决理解起来或许很痛苦也很艰难，但除此之外，在我们的公共生活中便没有其他什么可以让我们如此信仰的东西了。

犬儒主义者会对这种视野下的政治不以为然，觉得它不过是一种妄自尊大的错觉，但对我这样曾亲身投入政治的人而言，它便是真理。通过展望政治的理想形态，它让你得以理解政治在当下的真实境况。召唤本身自然是无法触及的，那些听到召唤的人也知道自己配不上如此的召唤，可他们仍会受其鼓舞。所以，把政治看作一种启明星一般鼓舞我们前行、不断前行的召唤吧。我们中回应了这一召唤的人都应明白，成功或失败远远没有我们已然做出回应这一简单的事实更重要。我们现在所希冀的，是将来能有比我们更坚决、更勇敢、更忠诚的人也来回应这一召唤。这本书正是为了这样的年轻人所写的。

---

1. Max Weber，“Politik als Beruf” ［“Politics as a Vocation”］， in H. H. Gerth and C.W. Mills，eds.，From Max Webe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p. 128. 另外参见Max Weber，Political Writings，ed. Peter Lassman and Ronald Speir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Fritz Ringer，Max Weber：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Terry Maley，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al in Max Weber’s Thought（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2011）。（此处译文参考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117页。——译者注）